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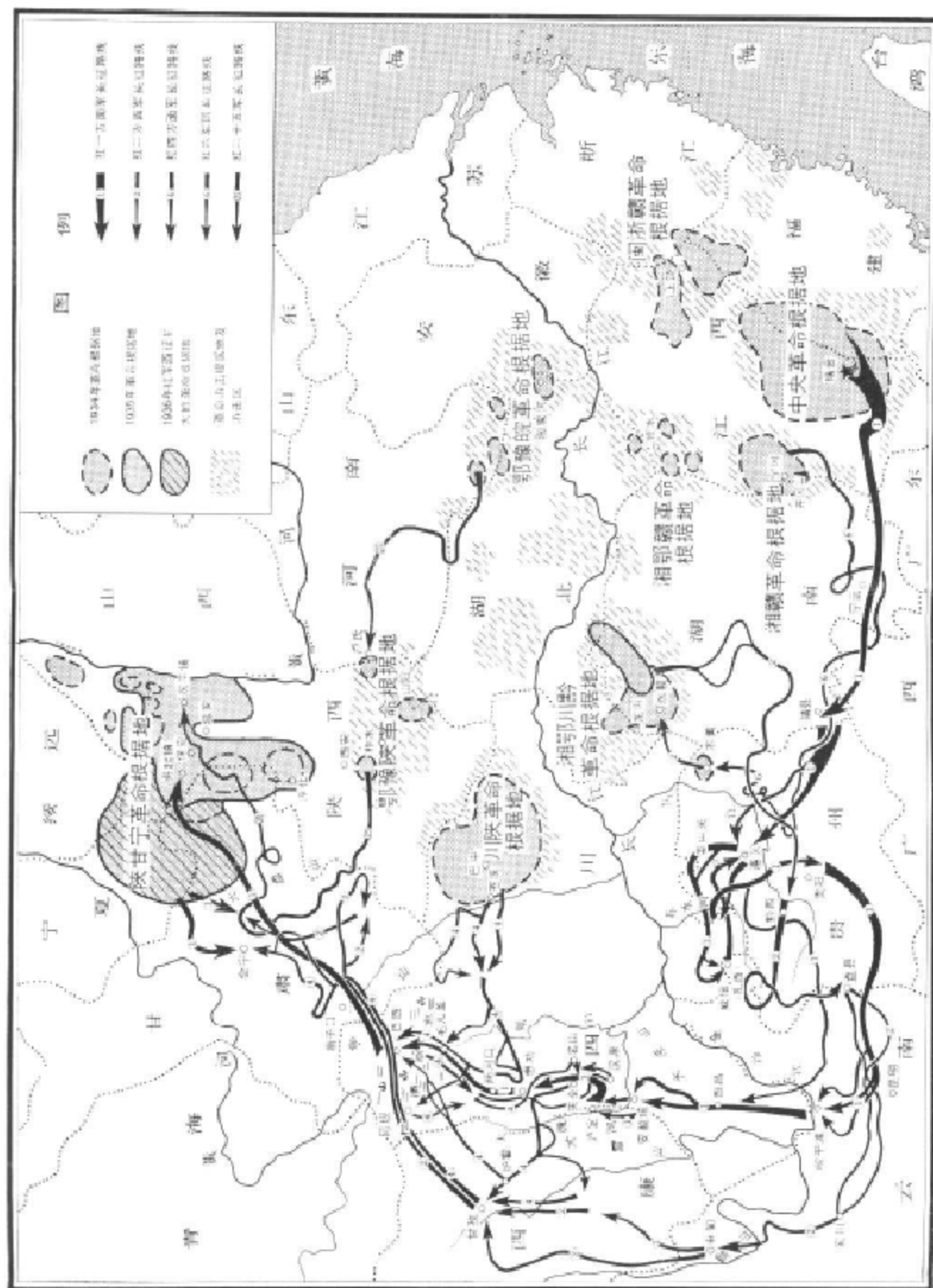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一九三六年)

斯诺摄



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同志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合影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目 录

引 言.....	1
一、再见吧! 瑞金!	13
二、突破四道封锁线	19
三、跨过五岭最高峰	27
四、西入贵州	33
五、遵义.....	39
六、四渡赤水	46
七、“金沙水拍云崖暖”.....	54
八、“大渡桥横铁索寒”.....	64
九、“欢迎!”“欢迎!” 一夹金山下一, 四方苗军会师.....	78
十、在千里雪山中	86
十一、毛儿盖	92
十二、分裂主义者罪恶重重	99
十三、过草地	104
十四、坚决北上	111
十五、进入甘南	121
十六、在西北高原上与敌周旋	128
十七、“不到长城非好汉”.....	133

07 B1 / 07

十八、“欢迎!”“欢迎!”“欢迎!”

——红军三大主力军大会师.....142

十九、分裂主义者对革命的危害149

二十、历史的结论155

后 记158

引 言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在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更严重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国外来的压迫与剥削，使国内原来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齐激化。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接连发生。国内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连绵不断，有的虽然还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实质上是农民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些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仅仅几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由于领导集团内部分裂，加上反动王朝勾结了外国反动势力联合进行残酷镇压，致使革命遭到失败。此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继续维持着对旧中国的血腥统治。国计民生从此更加江河日下。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各派系没有能统一中国，而各自投靠帝国主义国家割据一地，使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形成军阀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非常软弱，没有大的作为。而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创立到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发展到黄河流域的六、七年内，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初步运用，由于全党同志的英勇奋斗，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党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掌握党中央领导权的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②，“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③。对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片面强调联合，对他们的反动倾向不敢作坚决的斗争，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结果，掌握军队的大资产阶级一叛变，轰轰烈烈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就失败了。

同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死抱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陈旧观点，只要资产阶级与国民党，而不要农民。坚持“左”倾错误的张国焘则只要工人运动，也不要农民。他们都污蔑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

在党的创建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同志就开始注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一九二〇年开始，毛泽东就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了许多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从革命战略的高度，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关系，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指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9页。

方针。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方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阐明了农民革命的伟大意义，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以及培养农运干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把革命红旗高高地插在井冈山上，建立起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当时，林彪这样的动摇分子曾经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并用实践证明了，“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①的“奇事”。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指引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的无比正确。

毛泽东同志同时反对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流寇思想，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一种只想打大城市。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制度，使根据地逐渐巩固与扩大起来。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总结了当时游击战争的经验，还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就开始制订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作战原则，后来在一九三〇年反对敌人对江西根据地的第一次“围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剿”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悬挂着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右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左联），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军事思想。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由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根据这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打破了敌人的几次“围剿”。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用了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也只用了三个月，打破第四次“围剿”只用了三星期。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从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之后，就以反对“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为名，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根据地党代表大会（瑞金）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党的领导职务，又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宁都）撤销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工作，迫使他离开红军。一九三三年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里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仍然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灵活机动的伏击战，结果两战两胜，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制定的。这些特点是：

1. 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2. 敌人的强大；3. 红军的弱小；4. 共产党的

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些都是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就是根据这样的客观现实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因而是稳操胜券的。

而博古同志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由于白区工作的错误，一九三二年冬、三三年春，被迫陆续退到了苏区，但始终对他们错误的恶果没有吸取必要的教训，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特别在军事上把原来的一些空洞口号弄得更具体、更荒谬了。他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敌人方面倒是吸取了过去四次失败的经验，第五次的围攻不但大大增加了兵力，而且改变了战略战术，不但使用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而且从帝国主义国家求得了精神上的与物质上的援助。

蒋介石集团于第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动了一百万兵力，对全国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以五十万人对中央红军重点进攻。敌人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而我们的“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死抱着他们的教条，所谓“正规原则”，实际上是主观主义，脱离了实际。他们在敌人进攻初期，要“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两个拳头打人”，于是去打敌战区的巩固阵地——黎川以北的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的另一巩固阵地资溪桥，又不胜。在进攻失败后，“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就被敌人的优势兵力与堡垒主义所惊吓，退回根据地，转而采取了单纯防御方针。他们分兵把守、节节防御，与敌人的堡垒对峙，等待敌人伸出“乌龟壳”，然后实行“短促突击”，希望在很短距离内歼灭敌人。他们吹捧“短

促突击”为应急良方，实际上这是同敌人拚消耗，打没有希望的消耗战，而且敌人缩回“乌龟壳”，就打不着敌人。

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陷于被动，疲于奔命，而敌人日益进逼，根据地逐渐缩小。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也使我军民日益困难。这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抗日反蒋”的运动，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迫使蒋介石从围攻中央红军的军队中调走大量兵力。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①，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左”倾错误执行者仍迷信“短促突击”，不用此计，坐失这一良好时机，眼看着蒋介石摧毁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又回过头来加紧围攻中央根据地，使危机日益严重。

到了一九三四年九月，反“围剿”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然已经不利于出浙江，但是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而加以消灭。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建议又被拒绝。直到形势更加险恶时，才完全被迫突围，但又表现得非常仓卒，有如匆匆搬家，不是有条不紊的转移作战，而是夺路突围，变成了逃跑主义。于是，原来高谈“不丧失寸土”的，结局是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成为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

革命根据地，“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19页。

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①。没有这样的基地，一切战略任务就没有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②。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为建立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接着他又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创建与发展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根据地的群众也从亲身的经验中认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总是以自己的血汗与生命来保卫革命根据地。反动派则总是用尽全力来进攻与包围革命根据地，企图把它消灭掉。所以革命根据地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而这又决定于我们的军事和其他方面是否正确。王明“左”倾错误使得一个强大的胜利发展中的革命根据地被断送，数百万革命群众又受尽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屠杀与压迫。

当我们开始向西突围时，西线的敌人有如遇上了洪水决堤，狼狈逃窜，证明了敌人内部矛盾多，不是不能消灭的。但我们的作战部队掩护着庞大的后方机关与坛坛罐罐，不能施展威力，而且昼夜奔走，疲劳减员，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没有消灭大量敌人，自己倒是有了损失。特别在敌人依靠湘江部署好了的第四道封锁线前面，我们的笨拙的作战指挥使我军遭受到空前的惨重损失。

这时江西方面的敌人已经陆续赶上，并且估计我们要搬到湖南西北部与红军二军团、六军团会合。敌人按这一估计部署了大量兵力等待我们去自投罗网。又是毛泽东同志在通道县提出了避开敌人的圈套，改向敌人空虚的贵州前进。我们的“左”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7页。

倾错误执行者这时在惨重失败之后，已经拿不定主意，加上群情十分愤激，只好同意改道贵州。在乘虚直入，夺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之后，中央在遵义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左”倾错误执行者受到批判，在广大干部与群众的压力下，会议终于首先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结束了“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减员到约三万人。出发当时就没有宣布前进目标，没有政治工作，红军面临的情况使大家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十分担心。毛泽东同志重新领导，使军心大振。

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部队稍加休整之后，立即掌握主动权，采取进攻作战方针，就在回师遵义中，一举歼灭蒋军与贵州军阀部队二十个团，我军声威大振。接着，毛泽东等同志又指挥部队三渡、四渡赤水，迷惑敌人，忽南忽北，声东击西，迅速迂回，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追击与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然后乘胜抢渡大渡河，跨过夹金山同红军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革命高潮。翻过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后，又决定分兵左右两路北上。但过了草地后，到了阿坝，张国焘公然露出了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

由于张国焘擅自电令右路军南下，中央只得把一、二军团编为抗日先遣支队，继续北上，夺取了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到甘肃南部，通过几道封锁线后，于十月二十九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现为吴旗镇）。毛泽东同志随即带领支队赶到南面的直罗镇，会合陕北红军，并指挥歼灭了东北军的一个师与

一个团，保卫了陕北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接着，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东征抗日，大大地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

张国焘在危害中央的阴谋破产后，悍然率领原四方面军全部与原一方面军已编到左路军的五、九军团向南退却，再过草地，翻雪山。中央几次去电责令北上，根本无效。他并且自称“中央”、自任“主席”。但是他回到天全、芦山以后，经过同敌人屡拼消耗，力量大大削弱，终于被迫撤到道孚、甘孜一带。

这时，二、六军团由川鄂湘黔边的根据地出发（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经过湖南省的新化等县，经贵州、云南、四川数省远征，历尽千辛万苦，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与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再加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识破了张国焘的错误，也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宣告破产。他被迫取消伪“中央”，重新与二、六军团（已改称红二方面军）北上。这两大主力军经过草地，进入甘肃。当时，中央已派原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向甘肃西征，接应二、四方面军，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终于在会宁大会师，并且很快在山城堡打了胜仗，歼灭了胡宗南的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并发展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从此以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抗日战争，并且在延安建立了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接着，我们又打倒了蒋介石南京反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第136页。

政府，终于建立了独立的、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顾起来，如果在长征初期没有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中央红军连同二、六军团就有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而遭到覆没的危险；如果在长征后期没有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四方面军就会被全部断送掉；如果是上述那样，就根本没有长征的胜利，而没有长征的胜利，中国就只能继续成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所以，长征的胜利是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又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并粉碎了他的分裂阴谋才取得的。所以，长征的伟大胜利，以及从这一胜利开展的中国革命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的丰功伟绩的辉煌记录。

* * *

为了把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部真正的革命英雄史诗按实际发展过程扼要写出，我从长征四十周年的前夜开始写这个回忆录。我反复学习了毛泽东著作的有关部分，并搜集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但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无情的岁月把许多印象冲淡得模糊不清，我只得参考从前发表过的战友们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是早一些时候根据记忆写成的，也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是可靠的和比较可靠的。此外，我还尽量访问了一些可能找到的老同志，请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某些具体情况。这样的老同志也不多了，有的在我访问过之后，可惜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初稿写成后，还感谢许多老同志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和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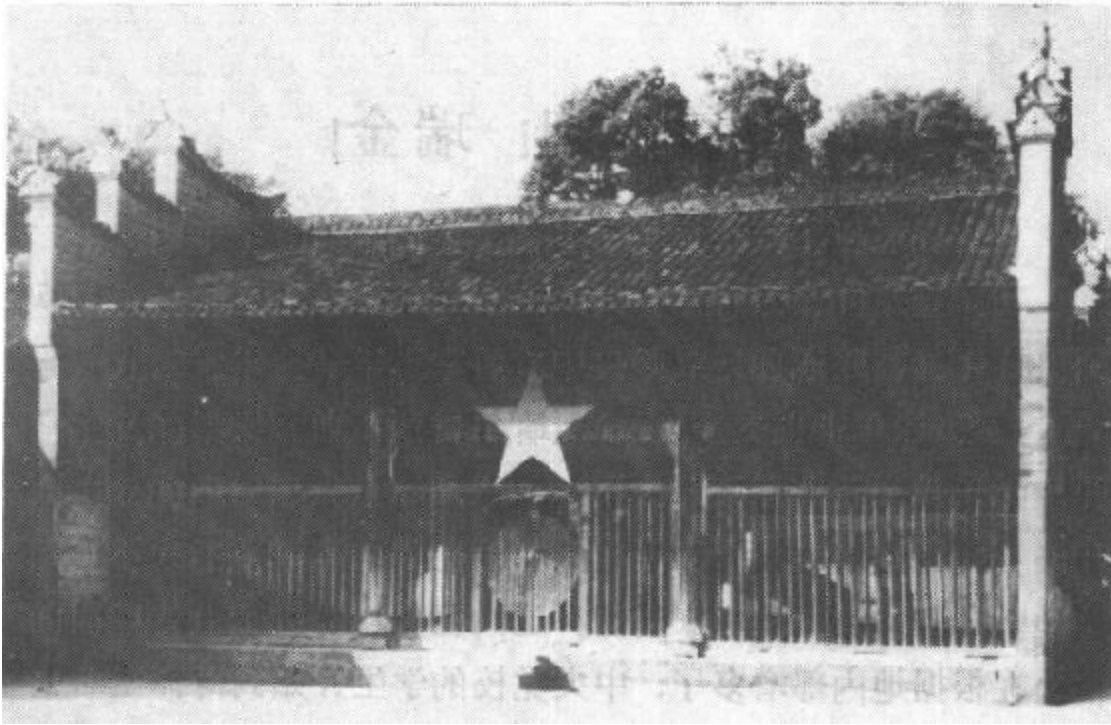
我通过这一切办法尽力使我的写作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切实，以便使这部原来的英雄史诗比较亲切动人，尽可能把长征

英雄们的一往无前的豪情壮志，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所领导的光辉业绩，用文字再现出来。这个目的决不是容易达到的。我在写作方面当然还有很多缺点，我所亲身经历的现实也是非常有限的。好在，长征这真正的英雄史诗本身是十分动人的，是有充分的感染力的。这部史诗对于我们的后代是极其重要的革命传统教材，它将教育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地继承长征的革命传统，不断地加以发扬光大，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道路永远前进。

一、再见吧！瑞金！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经进行一年了。在这革命根据地的四周，战争正激烈地继续着。在中心地区，在瑞金，情况也逐渐紧张起来。尽管中央机关仍照常工作，群众的生产与支援前线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机关与学校的“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仍热烈地坚持着，帮助红军家属们种地。但是，渐渐地敌人飞机的活动在根据地内部增多了，中央党校的学生开始到树林里面去隐蔽，以便坚持学习。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如机关与群众都缺盐吃，红军从前线送些盐回来，有如至宝。总之，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渐缩小了，战火越来越逼近中心区了。

国民党反动派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来，坚持反革命内战方针，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这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之下，被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不甘心于多次惨败，变得更加疯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入国土，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胡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从一九三三年秋季开始部署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回他孤注一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搜罗了五十万以上的兵力，还请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将军塞克特来出谋划策，采取了步步为营、用层层碉堡围困根据地的方针，并对根据地



这是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其所属军事、外交、土地、财政、劳动、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察等部均在此办公。周围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饿死根据地的军民。

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剥夺了毛泽东中央苏区党的领导职务。接着，他们又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毛泽东离开红军，专做政府工作。“左”倾错误的领导，使白区党的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了中央苏区后，又进一步地在中央苏区推行他们的“左”倾错误，并且把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们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即高谈阔论，说什么这次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因而他们高喊“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寸土”。总之，他们把外国经验神圣化，从教条主义的军事观点出发，要打一场“正规战”。

当时，前线上的红军指战员是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的。他们经过了过去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总是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如高虎脑战斗，我军在广阔的战线上，英勇地同国民党二十个师的强敌打阵地防御战，在敌人的飞机大炮前，战士们用轻武器，土造手榴弹，打得敌人尸横遍地，狼狈撤退。我们伤亡也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下短短的一行，而指战员个个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他们每一个人都深刻地了解，他们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战斗，这个目标是一定要达到的。

后方军民也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这个战斗的口号下，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一次扩大红军运动，就扩大了红军八万人。赤卫军与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担架队直接配合前线作战，昼夜不停。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们搞好生产。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红军的粮食与其他物质需要得到很好的解决。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卫后方安全。各种后方工作，在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做得极其出色。许多从其他苏区来的同志，根据亲身的感受，盛赞这真是模范的后方工作。

虽然我们具有这许多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统治，我们没有能取得反“围剿”的决定性胜利。一年之内，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了。国民党反动派扬言要抽干池水，捉尽活

鱼。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王明错误的执行者还在高喊“一省数省的首要胜利”，但下边的干部面对现实，渐渐不安起来，同志们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来，但是他连六届五中全会都未能出席，被剥夺了发言权，并且正背着所谓“游击主义”与“富农路线”的“罪名”。

有的人暗地里嘀咕着“该行动了”，干部中越来越频繁地谈起“行动”来了，当然不敢公开议论。秋风吹到五岭的时候，渐渐有家属从机关挑着担子回本村来，她们说，“他要走了”。不久，中央组织部开始到有关单位找干部谈话，制订干部名册。有的干部陆续被调走了。病员从中央医院回本单位了。渐渐干部们相遇的时候，互相问答：

“你走吗？”

“走嘛！”或者说“还不一定。”

“中央机关何老^①留下来了，据说是因为身体不行。”

“董老调卫生部当政治部主任了，当然走罗。徐老^②也到卫生部了，给他准备了一匹马，不过还没找到饲养员。”

“毛泽覃不走了，贺鑫跟他一块坚持工作。”

“当然罗，是同志嫂嘛。”

“宣传部的老廖也留下来了。”

我因为跟部队行动惯了，让我走了，不过暂时编在休养连。

.....

看来真正开始行动了。一朝醒来，路上开始有了路标，如写着“长江”或“黄河”的纸条摆在地上。大概夜间过了部队，行军很肃静，没有惊醒群众。这样的路标一天天多起来了。这是

① 指何叔衡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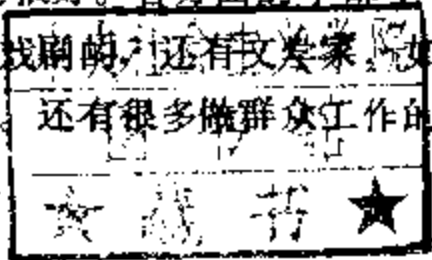
② 指董必武同志与徐特立同志。

成千上万的红色战士们英勇地走上征途，去打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坚强决心的表示，也是他们留给后方同志们的告别誓词。当地群众起来看到这些向西指引的路标，不由得抬头远望，想起子弟们已经前去杀敌，但愿早日胜利归来。有的拾起一张路条，拿在手里向西遥望，久久不能离去。

难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个天高气爽的早晨，准备参加中央纵队休养连的干部被通知，于午饭后在中央机关附近的一个村外集合。日刚过午，就开始有人来到村头，人逐渐增多。不久就有人按名册编成班排，让各就自己的位置。每个人都根据事先的通知带了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另外，每人在腰带上挂一个茶缸子或磁饭碗。编好队后，每人被发给一支红缨枪。休养连相当整齐地集合起来了，大家互相看看，都是些年老体弱的干部，或者刚从医院出来的人。这里边年纪最大的有谢觉哉同志，他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带了一匹马来。女同志有蔡畅同志，当时已叫蔡大姐。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其他同志们。各个方面的干部共百数十人，国家保卫局的老谢，自称是连指导员，向大家讲了一些注意事项，检查了大家的携带品。

太阳已开始西斜，中央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发同志来到大家面前。这个海员出身的国家保卫局长，六届中央委员，平日比较严肃，但有时也喜欢讲几句笑话。他在休养连对面的一块石板上坐了下来，并显得比较严肃，但他把大家看了一眼之后，露出笑容来，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

“我们这个连很好。各方面的干部全都有，男的、女的，有音乐家、有搞戏剧的，还有文学家，如果演个节目，不用到别的单位去借用。还有很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各行各业都不



愁没人做群众工作，真是应有尽有。哈哈哈哈哈……”

他一面看着连里的每一个同志，一面说笑，把人家都逗笑了。本来大家的心情都是比较沉重的，经他这么一说，都比较轻松了。

已经大约午后五点了。休养连开始行进，一路纵队，一个紧跟一个。地面上有了“红星”的路标，我们按这个路标向西前进。

乡间的小道上已经几乎没有行人了。一两个地方干部匆忙地向村子走去。有的农家妇女在门口倚着门，注视着行进中的队伍，好象在送我们远行，有什么话要说。有时几个小孩在路边站着，指手划脚，似乎在低声议论这个队伍是往哪里去的。

步子逐渐加快，经过了几个熟悉的村子，村落中间，暮烟缓缓地飘着。在暮色苍茫中，偶尔有机关的工作人员走出来看看过路的队伍。我们虽然互相不认识，都默默无言，但我们看看他们，似乎告诉他们：我们坚决到外线去消灭敌人，而他们的眼光露出来的表情似乎在说：祝你们胜利！我们的情绪虽然一直高涨，但是一想到同这些熟悉的地方离别的时候，都不免有一种激动的惜别的心情。大家迈着稳健的步子，紧跟着前进，不时地望望逐渐在向夜幕消逝的山影与村庄，心中不断地暗暗嘀咕着：“再见吧，瑞金！再见吧！”

二、突破四道封锁线

近九万工农革命大军浩浩荡荡，分为五路，猛扑西线敌人。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江西的信丰与安远间，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道封锁线，横扫全线碉堡。这一带原由广东军阀的军队扼守，反动派官兵纷纷逃命，沿途丢下了无数的武器弹药、军用品、食物以及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文件等。有一个敌军师长，据说前夜就闻风先逃走了。这一带是所谓“赤白交界”地区，群众对我们早有认识，红军一到，就放着鞭炮，热烈欢迎。我们后续部队到达时，小孩们欢欢喜喜地拉着我们去看敌人的“乌龟壳”。它们大部分已经被群众彻底破坏，个别角落里还冒着烟，小孩们总是边骂边捅，见到青天白日军帽总要踩它几脚。群众对反动组织“铲共团”更是痛恨到了极点，哭诉它们过去欺压群众的罪行。我们长期在革命根据地里生活的人，特别是红军战士，亲自见到或听到反动派的种种罪行，莫不义愤填膺，激起更强烈的革命斗志。群众把红军看做自己人，帮我们做饭，补衣服，给我们带路，抬伤病员。

蒋介石多年来惨淡经营的西线碉堡群被工农红军突破，使反动派大为震惊，急忙从调集重兵企图从后面追击，在前面堵住我们。但一时布置不起来，而红军已大步前进，直指湖南。这时红军突出重围，真是如虎添翼，勇往直前。我们沿江西、广东边界运动，一般没遇到较大的敌军，几处小的敌军不敢阻挡，

一触即溃。有时遇到民团，这些地主爪牙闻到机关枪声，就鸟兽般地逃散。我们有时占领了民团的总部，而敌人扼守要地的正规军还来电话，问“到了共军吗？”我们的指挥员给他回答：“没有到敌人呀！”

我们从根据地内出发起，总是夜行军多，使敌人无法侦察我军的动向。但有几天我们白天在五岭的崇山中行进，山高林密，风景绝佳，急行军也不觉劳顿。敌机虽然天天来寻找我们，但总是白费气力。广东军阀和湖南军阀在广东境内的城口与湖南境内的汝城之间构成了第二道封锁线。但敌人保命要紧，十一月八日几乎没有经过太大的战斗，这道封锁线就被我们突破了，我们缴获了不少的武器与各种军用物资。

我们在湖南境内向西挺进。由于原来“围剿”福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军队大部还没跟上来，只有少数敌军尾追我们，而湖南的反动军队企图堵击我们，怕被我们消灭，又不敢逼近，所以，我们好几天没遇到什么劲敌，就进到了湖南军阀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十一月中旬占领了粤汉公路线上的宜章县城。我们的一个师，冒着雨，横扫着小股敌人，一直追到宜章城边。当我们准备拂晓攻城的时候，附近的修路工人与贫苦农民，热情地前来帮助我们挖坑道，扎梯子，准备消灭敌人。但是，城内的敌人却在夜间进行了最后一次抢劫，半夜弃城逃跑了。天刚亮的时候，城门大开，城内的群众涌出城来，欢迎我军进城。他们报告敌人恐慌万状，诉说敌人穷凶极恶，把什么都抢走了。红军进城以后，没收了豪绅地主的财物，召开了一个好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把从豪绅地主家里搬来的、堆得高高的各种东西，分给了当地的劳苦群众，全城到处沸腾起来，大家高高兴兴地拿了东西回去。

这一带本来是几年前“朱毛红军”来回活动过的地区，群众对共产党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并且有些本地人参加了红军，所以，这次红军再来，群众沿途烧茶送水，热烈欢迎，并诉说了当年红军退出湘南时，反动派欺压敲诈劳动人民的各种罪行，好象遇到了亲人，很自然地大吐苦水，说个没完没了。那时候，武汉广州间的铁路线上的湖南广东边界一段还没修通，正在开辟路基，修路的工人很多。这些人都是受尽了反动派的苛捐杂税的折磨，远离家乡的破产农民，他们逃来这里找工做，一股一股地住在用松树架成的棚子里边。他们整天流汗流血，但是连个人的生活都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寄钱养家，有的人想回家都弄不到路费。红军一来，就召开了一系列的工人大会，宣传了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散发了粮食、猪肉、衣服等物资，对那些想回家的发了足够的路费。大街上、棚子内外，很快就涌来了工人和贫民群众，安静地倾听我们的宣传员讲话。每个红军战士都遇到群众的亲切招呼。我们的政工人员号召大家参加红军，去打倒反动派，马上就有很多工人响应。他们大声地说：

“同志！我参加！”

“同志！我也参加！”

这样，红军马上就扩大了一批新战士。他们又自动地去带来了一些朋友，使得我们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就扩大了几百名新战士。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被编入了红军的队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继续向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原来在江西福建“围剿”我们的部分军队，已开始跟在我们后边，尾追我们，还有一些部队赶来堵截我们，他们白天行车，走大道。而我们多是夜间行军，在山中小道迂回前进，加上大搬家式的行动方针，带了

许多军工方面的机器与印刷机器等笨重物资，以及其他辎重，机关又十分庞大，以致运动迟缓，爬山越岭极端困难，弄得部队非常疲乏。当时我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正在湖南贵州边境加强活动。蒋介石害怕我们会合起来，声势更大，就命令湖南军阀的军队向南阻击我们，广西派军阀的军队也在湖南广西边境堵截我们。尾追的部队更加逼近，敌机更加活跃。

当我们向道州城急进的时候，有一天，敌机又在空中耀武扬威，飞到我们头上盘旋。大概他们发现了一个目标，这些混蛋欺我们没有重武器，竟低飞向我们的一个单位袭来。我们的战士们怒不可遏，组织好火力，一齐射击，瞬息间一架敌人飞机发出怪声，往地面直冲下来，在四周刮起一阵大风，就栽在路边的草坪上。我们的战士们一齐欢呼：“混蛋，看你的好下场！”大家端着白晃晃的刺刀，向那架敌机杀奔过去。

两个敌人面如土色，跪在飞机的残骸旁边，不停地磕头，哀叫：

“老总！不要杀我呀，饶我一条狗命吧！”

看了这种摇尾乞怜的样子，战士们差一点要笑出声来。有的正要给他们一顿饱拳，政治工作干部来了，他说：

“不要那样怕，我们不杀你们，杀了你们有什么用？”

吓得象两只木鸡的敌机驾驶员这时才清醒过来，千谢万谢地表示：

“如蒙大恩真不杀我们，我们痛改前非，愿效犬马之劳，以报不杀之恩。”

这架敌机是从南昌起飞来袭击红军的第709号战斗机，两名驾驶员，一个广东人，一个江西人。这次缴获两挺轻机枪，

五千多发子弹，还有一些军用品。又得多谢“运输队长”蒋介石了。

附近一带的群众热烈地祝贺红军，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一个白胡子老头，翘起大姆指，哈哈大笑。

从这以后，敌机很少敢低飞了。

由于情况严重，大约半个月左右，我们不分晴雨，不分昼夜，连续急行军。一个作战部队，为了抢占湖南的道州城，曾疾行二百里，先敌占领了道州城，阻击了南下的敌军，掩护了其他部队西进。有一夜，我们几支部队分三路打着火把，向道州方向行进，好象三条长长的火龙蜿蜒急走，在漆黑无边的大地上，演出了一场光芒四射的火炬万人舞。

我们在道州附近渡过了潇水，红旗直指湘江。这时候，敌人从四面八方来尾追、堵击我们，敌军兵力多达三十至四十万，空中还有敌机不断扫射与轰炸。敌人是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物，在广西的全州与灌阳、兴安之间，建立第四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妄想在这一带消灭我们。

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人，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还是被动招架，只是命令部队硬打硬拼，以便突出重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十一月底，当我们接近湘江的时候，敌人的四十万人军逐渐向我们逼拢，企图在湘江东岸、湘江与潇水之间消灭我们。而我们的逃跑主义的领导，这时只顾夺路突围，命令一军团往前冲，三、八、九军团在两侧打甬道式的掩护战，拚命地把敌人顶住，掩护中央纵队通过，五军团作后卫，边打边走。由于部队的英勇作战，中央纵队安全地渡过了湘江。但是，经过一星期的激烈战斗，部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各军团都大量减员。三军团的两个团阻击敌人两个师，在“保

卫党中央”的铁一般的意志下，拼死战斗，连续三天三夜，把敌人挡住在湘江面前，不能前进，但自己损失也很大，两个团的领导干部都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剩得没几个了。特别是担任后卫的五军团，不分昼夜，抗击了尾追的敌人，到达湘江边时，左右两侧的敌人已经占领江边阵地，部队不得不另找渡河点，既无浮桥，又无渡船，就轻装涉水过去。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终于大部分壮烈牺牲。在这场恶战中，我军指战员奋勇作战，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无数英勇、顽强战斗的烈士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



过 湘 江

我们终于渡过了湘江，十二月一日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从中央根据地出发西征以来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敌人用层层封锁来消灭我们的全盘计划完全失败了。同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严重恶果也已经暴露无遗，它在广大红军战士心目中已经破产了。

突围开始以来一个多月的经历，对我们广大的干部与部队指战员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还在五次反“围剿”中，大家对比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已经对领导上的错误感到担心。这回问题的实质更加充分暴露，再没有怀疑的余地了。

通过四道封锁线的活的事实证明，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力是无坚不摧的，我们这样的人民武装是打不散、攻不垮的。就是在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只要有一人存在，敌人休想跨过去。这方面是没有谁能提出疑问的。但是，这回为什么失败得这样惨呢？我们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呢？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哪里来的打法？”

“这是什么军事指挥？”

“成万的英雄儿女就这样中途丧命！”

“这些战友们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要把中国革命断送掉？”

“毛主席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早就把毛主席排出军事领导岗位，而那伙人根本没打过仗”。

提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排挤毛泽东同志，大家气更大了。

“五中全会还不请他参加，他不也是政治局委员吗？这又

是哪里来的章程？”

总之，这次血的教训使大家充分认识了王明“左”倾错误对党与革命事业的极端危害性，更加想念毛泽东同志，要求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职务。

三、跨过五岭最高峰

在我们离开老家，走上长征道路的最初一段时间，约半个多月，我们总是夜间行军，以保守军事秘密。途中不许说话，不许点火，不让携带的东西发出响声，如果前后失去联络，规定了拍掌办法。各单位都在有岔道处放了自己的路标，或者用树枝等把岔道卡断（山后卫把路标收回）。如有人前后距离拉得太远，总是低声叫他“跟上”。遇很暗的夜间，每人还在脖子或臂上缠一白布条，以便容易看出。夜行军是使人非常疲倦的事情，有的人往往离队去大便（规定在道路三十步以外），久不回来，派人去找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蹲着睡着了。

进了湖南境内的时候，因天气阴雨，多在白天行军。但道路泥泞，容易滑倒，一下能滑走十几步，大家把这叫作“坐飞机”，这时候常有人唱兴国山歌：

“哎呀来，

同志哥的飞机好快哎！”

这样常常引起了人家哄笑一阵，倒减轻了行军的疲劳。

我们从开始长征起，跋涉过的河流与山岭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在长征初期印象最深的，要数西延山脉的高峰老山界。这个大山在地图上叫越城岭。我们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苗山，开始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沿着山沟往上爬，时辰已经是下午，走几步，停一会，这也是队伍爬山的正常现象。但停停走走，越

走越停得久，后面的队伍挤上前来。大家站久了，就在路边坐下来，一直等到有人喊“走、走、走”，又站起来走，满以为可以走一阵，谁知马上又停下来。天眼看着就晚了，很多人急得叫起来。肚子也叫起来了。但有什么办法呢？队伍越挤越密。

有的人估计非夜行军不可，这山路是不好走的，就盘算着找火把。山沟里有几户人家，有人就想买些篱笆的竹片来用，往常是这样做的。谁知政治部贴了条子，不准动用，因为这里是苗民或瑶民。打听到前面有竹林，有的单位就派了人去准备火把。

有人向居民问问前面的路程，才知道前面有一个高山，很陡，上山三十里，下山二十里，这里还是山脚下呢！

已经是满天星斗。这山中小道实在寸步难行，就点起火把来。从山脚往上眺望，只见火光形成许多“之”字，一直和天上的星光连接起来，好象我们前面的队伍已经登上天了。而往下看呢，火把的巨龙竟在你脚底下游动，真是陡啊！人家有点紧张起来，不时有人喊出：

“加油啊！”

“不要掉队啊！”

有的人向下面叫：“我们上天了！”大家听了高声笑起来。忽然前面又停下来了，传下话来，说前面太陡了，马爬不上去。大家坐下来又等了个把钟头，前面传下命令来，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拂晓上山。这二尺来宽的小道上怎么睡觉呢？一不小心，不就从这山脊跌到山下去了吗？没有办法，只好各人打开毯子裹在身上，顺着山坡躺下，或者背靠一棵树坐着，把眼闭起来，实际上身体很疲倦，也就很快睡着了。好在山上有的是干柴，大家就烧着大火，团团围着火堆，用鼾声互相呼应起来。有时

候忽然醒了，发现自己“以天地为衾枕”，天上的小星星放着闪耀的微光，好象伸手可以摸到，而周围的群山好象围着我们的黑幕，矗立不动。往山上山下观看，有或大或小的许多火堆还燃烧着，有人在添柴拨火，四周在深沉的寂静中，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黎明前，山下就有人挑饭上来。身上又凉又湿，急急忙忙吃了饭，就又往上爬。前面传下命令，今天无论如何要过到山那边去。走了不多远，果然遇到了一段陡岩，差不多垂直地突出面前，形成尺多宽的石梯。很多马匹汇集在岩下的两旁，让出路来给人通过。有几匹马昨夜从岩上跌了下去，断了腿。

大家很小心地爬过了这张石梯，上面的路不那么陡了，不久就到了一片平地，松了一口气，以为快到山顶了。谁知一个从山顶下来的瑶民告诉说，“还远哩！还有一段二十多里的很陡的山。”

昨天没吃晚饭，早晨实际上也没吃多少，肚子时时大声诉苦，但大家还是鼓起勇气，健步上山。

到达山顶，已经是红日开始西斜，后面的部队还在望不到尽头的山腰迂回移动。远远听到机关枪声，大概在山脚下，我五军团还在那里“安营扎寨”，阻击追来的敌人。我们这个英勇无敌的军团，最善于打后卫战，遇到敌人逼得太近，它索性驻扎下来，狠狠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不敢再前进，只有后退。

部队逐渐过了山顶，医院的伤病员被搀扶着，也上来了，他们的担架跟在后边。医院的医生、护士和其他的工作人员，很多是女同志，他们或她们真是英勇顽强，沿途照顾着伤病员，精神抖擞地行进着。运输队也上来了。掩护部队缓缓地跟上来，随时准备回击可能追来的敌人。

从山顶四望，真是“一览众山小”，令人心胸开阔。我党领袖毛泽东的著名的《长征》诗，有“五岭逶迤腾细浪”的名句，在这里是最真实地显现在眼前。下山据说二十里，也很陡，但是大家乘胜直趋，走得很快。沿路林深竹密，几处清溪流水潺潺，迂回流去。有的单位就地停下来，组织战士们用脸盆、口杯等煮饭，大家就在溪边洗脸、漱口，准备饱餐一顿，恢复体力，再赶前程。这时谈笑风生，有的人又唱起兴国山歌来。

跑下山来，后面部队进入宿营地，已是夕阳西下了。大家跨过了这座老山界，好象打了一个胜仗，疲劳也烟消云散了。这是我们长征初期通过的一个高山，但是比起以后的雪山那样的高峰来，就算不得什么了。这座高山可以说给了我们一次很好的演习。

我们从江西出发，沿途经过了我国南方的无数高山峻岭，正如毛泽东在《长征》一诗中高度概括的那样：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这些山岭的雄伟气势，毛泽东当时有《卜算子三首》，描绘得十分生动：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第一首着重写出了山的高耸连天；第二首写千山万岭象江海中波涛澎湃，又象万马奔腾在战场上；第三首写山的坚强无敌，立地顶天。这光辉的短诗外表好象是在写群山，实际也是在歌颂我们伟大的工农红军、中国革命的擎天柱石，歌颂工农红军实现的伟大业绩。

在越过老山界的前后，大约有十多天的时间，我们行进在广西境内。当时统治广西的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他们吹嘘自己是“乡村自治的模范”。事实证明，他们的所谓“模范”，就在于对人民，特别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与剥削。我们经过的地方，他们事先就逼迫当地群众把粮食烧了，甚至把房子也烧了。他们还派遣特务到处造谣，威胁群众逃避我们。有几次在我们宿营以后，特务放火烧房子，想把我们烧死在里面，并证实他们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谣言。这一带的房屋多是木板构成的，一经着火，立刻就火焰冲天，并蔓延到整个村镇。我们进到这一地区的时候，就已经警惕发生火灾，制订了一些具体的防火办法，如火把不准进房子，组织消防队，准备好水桶，加强警戒，经常巡逻等等。但我们经过龙胜县龙平镇时，有一处忽然起火，一下子就火光冲天，我们全力救火，把火包围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截断它的去路，然而结果还是有一片不小的地方几乎变成了焦土，我们赔了群众几千块银元。

那一夜，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经过一天的行军，又开了几小时的会，半夜刚回来休息，不久忽然有哨兵高喊“起火了！”同时噼噼啪啪的闹声响成一片。警卫员惊醒起来一看，周副主席睡的房子已经被火光包围，烟火往房内直喷。警卫员顺手提着一条军毯，冲进房内。周副主席正在向外摸。警卫员把军毯蒙在副主席头上，把他拉出门外来，才脱离了危险。

这火灾从何而来？为什么几处同时起火？几天都没有找到答案。有一次火势初升，就发现有人从火里跳出来，不象当地的老百姓，而是短装膘悍的、面容凶恶的汉子。我们抓了几个这样的坏人，经过查问，他们不得不承认是他们放的火。这些人原来是民团（地主武装）的团总挑选派遣，混进我们驻地来的，主要就是来放火。他们这样做有三个目的：第一、破坏红军与群众的关系；第二、制造所谓“共匪杀人放火”的“事实”；第三、扰乱红军部队不得休息，甚至烧死我们。他们的意图是十分恶毒的。我们捉到了这样的坏人，都是就地召开群众大会，大家来审问，最后让群众讨论怎样处理，群众莫不气愤，这些地主走狗平时也一贯欺压老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就一致通过把凶手枪毙了。

四、西 入 贵 州

从突围开始，王明错误的执行者采取了逃跑的搬家式的行动方针，机关庞大，行动迟缓，使作战部队忙于掩护，不但不能主动地歼灭敌人，而总是被动作战，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牺牲。在我军经过顽强战斗，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他们还是采用老方针，不想争取主动，特别在敌人发现了我们将要向红二、六军团活动地区前进的时候，还要冒险去钻进敌人企图围歼我们的圈套，还想同二、六军团汇合以后，放下行李，然后才实行反攻。如果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必将使红军遭受更大的损失，使中国革命遭受更严重的挫折。

我们于十二月十一日西进到通道县城的时候，是一个紧要关头，王明错误的执行者还是机械地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同二、六军团会合。幸亏毛泽东同志要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来研究行动方针，在会议上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西入贵州的新方针，扭转了形势，挽救了红军，开始争取到主动。在这以前，毛泽东同志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没有了发言权，这次因为他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得到了多数同志，特别是下层的拥护，王明错误的执行者，在严重挫折以后，已经不知所措，被迫改变了方针。

我们向西进入贵州省的行动，完全出于蒋介石的意外，把他的主力与湖南军阀的大部兵力，共约四十万人，抛在湖南西

部地区，让他们在那里空等着中央红军去“自投罗网”。

我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犹如猛虎冲进了猪群，打得那些贵州军阀的军队狼狈逃窜。贵州有三个军阀，头号是王家烈，其次为侯之担与犹国材。他们是贵州人民的吸血鬼，把人民剥削得面黄肌瘦，衣不蔽体，被称为“干人儿”（人民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我们到处遇到人们向我们讨钱：“红军先生，给个钱儿，我是干人儿。”常常见到年轻的妇女，穿着破洞很多的短裤。这是国民党长期统治人民的“德政”的明显成绩。几天之内，我军就消灭了贵州军阀的防守部队和一些地主武装，于十二月十五日占领了黎平县城。城内外群众夹道欢迎，我们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与锣鼓声中走进了城内。这一带苗族与侗族人民较多，他们长期受汉族地主官僚的压迫与剥削，特别对军阀统治有刻骨的仇恨。我们来打垮了这些反动势力，使这些少数民族非常兴奋。我们在各族人民之间进行了宣传工作，深得人民的拥护。红军总政治部命令全军加强群众纪律，并号召每个指战员给苗、侗族人民一件礼物。把没收豪绅的粮食衣服等分发给他们，缴获敌人的枪支子弹也送些给他们，帮助他们成立起武装自卫组织。

因为敌人的大部兵力没跟上来，情况稍缓和，我军在黎平一边休整，一边部署下一步的行动，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临时会议，肯定了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针，决定继续向贵州北部前进。在十二月中下旬十多天内，我们占领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府城与县城，歼灭与驱散了贵州的各派反动军队，直抵贵州的第一大河，乌江的南岸。

我们在乌江南岸一带迎接了一九三五年的元旦。为了庆祝新年，我军各单位也都照例组织了晚会。但这回在长征路上，

与过去有所不同，游艺较简单，主要是报告和讨论当前的战斗，宣传突破乌江，拿下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府的战斗任务。各单位也都举行了新年会餐，许多单位杀猪宰羊，鸡肉、牛肉，五、六、七盆菜，过得热气腾腾。豪绅财东这回倒霉了，他们准备过年的丰盛食品都留给了红军与“干人”们了。这一地区的“干人”们分享了地主老财们的年货，个个喜形于色。他们说：

“红军先生，沾了你们的光。如果不是你们来了，我们得出门躲债，连年饭也吃不成，谁敢梦想这样阔气呢？你们救了我们‘干人儿’的命啊！”

的确，人民的军队来了，一切反动派吓跑了，“干人”们分得了豪绅们的财物，免除了逼债的痛苦，过了一个快乐年，真不是简单的事。

新年的第一天，是抢渡乌江天险的战斗开始的一天。第一军团的第二师担任先头师，在师长指挥下，直趋江界河渡口。他们从南岸山上就可以看到对岸漆黑的悬崖下，奔腾着碧绿的乌江，但是要到达江边，还须直下石山十余里，对岸也是悬崖绝壁，从渡口往上走，也要爬十来里的石山。敌人把南岸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了，退守在北岸抢做工事。红四团团长沙耿飚同志、政委杨成武同志化装到江边进行侦察，发现敌人在北岸渡口有一连哨；渡口上游约一里处有一条很小的路通渡口，勉强可走人，有敌一排哨；离江边约二里处，有敌人的团预备队，敌总预备队约一个团设在离江边五里的半山上。江面宽约二百五十米，但水流很急。

尖兵连进到江边时，对岸的敌人开始发觉，向南岸乱打枪。经师、团干部研究，决定对北岸渡口进行佯攻，而主攻渡口上游的小路。部队迅速地搬运架桥材料到渡口周围，工兵赶制竹

筏，准备强渡并架桥。

二日上午，渡口方面我机关枪迫击炮向对岸猛烈射击，开始佯攻。而上游主攻方面，在火力掩护下，八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各带短枪，跃进冰冷的江水中，冒着弹雨，猛向对岸游去，约仅十多分钟，到达对岸，隐蔽在石崖下。这时候，敌人十分恐慌，但八个战士准备拉过去架桥的粗棕绳，因江宽水急，未能拉过江去。接着又改用竹筏强渡，但第一个竹筏撑到中流，也受敌人射击翻掉了。由于后续部队暂时过不去，只得把已登对岸的八个战士召回南岸，第一次强渡因而没有成功。

当天夜晚，又决定乘黑夜偷渡。第一筏五个战士沉着地往江中划去，敌人没有发觉，只断续地乱打冷枪。第二筏由连长毛正华同志带轻机枪一挺，马枪一支，战士四人，接着往对岸划去。但第一筏去后约半小时，不见用手电筒报告已到达彼岸。一个钟头后，他们五个人沿南岸回来，说水流太急，夜黑不知该指向哪里，到江心被冲至下游，才靠南岸，得一个农民指引归队。第二筏去后久无消息。又派了第三筏，但到了中流也不能前进，还是转回来了。其实毛连长等五人登上了北岸，曾用火柴向南岸发出信号，因光小未起作用，而后续部队又不见过来，于是他们五人便缩在江边一石崖下等待，熬到天亮。

三日上午，又开始强渡。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还是从上游用三个竹筏，共一七人，向北岸划去。敌人拚命向竹筏射击，但是突然在敌人脚下响起了机关枪声，接着一阵手榴弹声把敌人打得仓惶逃走。原来毛连长等五人见后续部队过来，便迅速配合作战，夺取了敌排哨阵地。这二十二个英雄从敌人右侧向敌猛攻，使敌人开始动摇，渡口方面我主力乘势强渡，很快把北岸敌人全部击溃。贵州军阀的官兵是有名的“双枪兵”，除了一

支步枪外，还有一支鸦片烟枪，这时沿路烟枪满地，烟味扑鼻而来。我先头一个连直往遵义方向的逃敌追去。后续部队用竹子架一浮桥，从容渡过。

敌人从乌江边败退之后，敌“江防司令”带着残部慌忙逃往遵义，连司令部的电报文件都丢散满地。我军于三日下午占领了他的司令部。

贵州军阀侯之担大叫大嚷，要“死守遵义”，派他的弟弟做“遵义城防司令”，强迫市民，赶修碉堡。“红军打过河来了”的消息一传开，侯家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满城敲锣，命令每户出一人，自带口袋装砂子，做砂包，筑工事，准备巷战。但是人们的表情与关系已经大变了。老百姓交头接耳，白眼看那些官老爷，忽然变得不听使唤了。过去昂首阔步，大摇大摆的官僚、豪绅们，好象突然矮了半截，躲躲闪闪地往乡下逃跑。

一月二日夜里，侯家军便开始了抢劫，城旦到处是敲门声、吵骂声、哭泣声，乱成一片。

我先头团于四日下午进到离遵义城约三十里的深溪水时，发现前面有敌人守卫部队，约一营多人。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来到前线，指示要全歼这股敌人，不许漏网一个，以免走漏消息。部队乘大雨中分两路将敌人围住，把敌人全部歼灭了。经过对俘虏的宣传教育，全体被俘人员表示愿为红军效劳。我军就以一部化装为敌败军，由俘虏带路，深夜到达遵义南门，俘虏上前把城门叫开，我军就冲进城去。敌人发现我军已进城后，乱放了一阵枪炮，弃城狼狈逃去。

城内居民听过了一阵枪炮声之后，好容易盼到天亮，听到街上已有人走路，稍稍胆大的人把门打开一点，往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沿街都是穿灰布军服的人，抱着枪挤在一起坐地

休息。在这样冷风刺骨的早晨，如果是“双枪兵”的话，早就破门而入，寻火烤，找东西吃了。

“大概就是红军吧！”人们从“双枪兵”这几天的惊慌失措，很快就猜想到了。果然，就有腰带短枪的人，走到开了门的人家，和蔼地喊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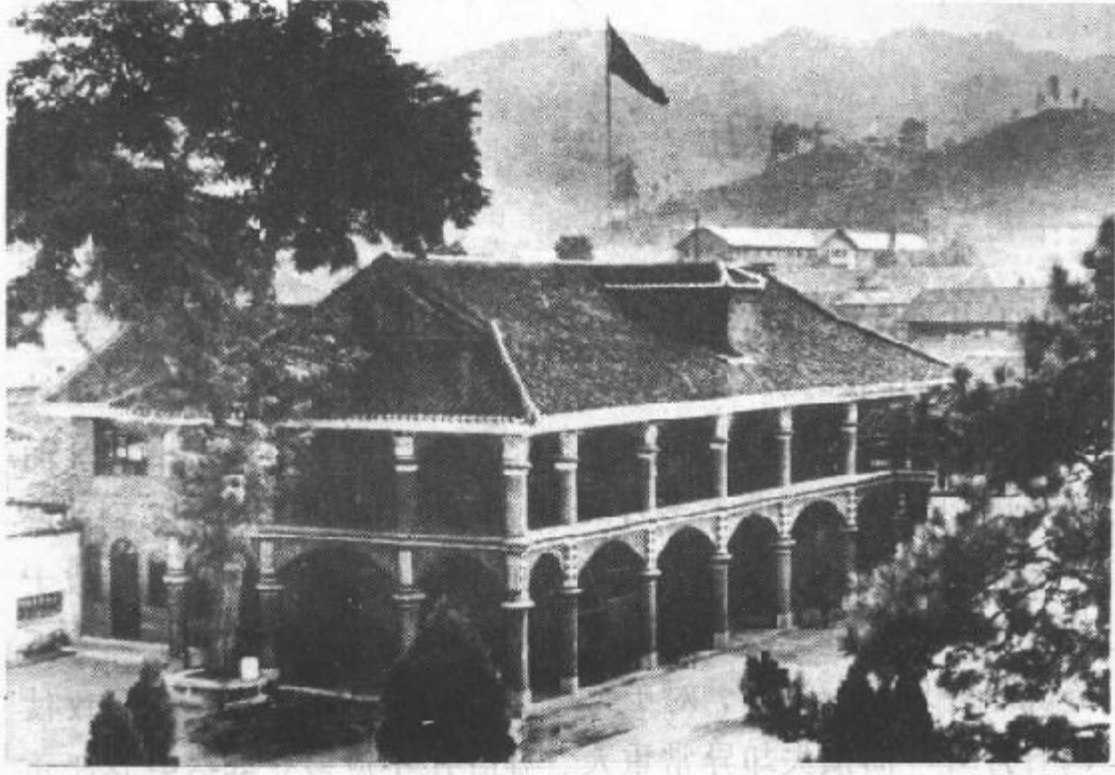
“老乡，我们是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侯家军已经被我们打走了。你们不要怕。你们出来做生意做事吧！红军是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的。”

群众见了红军态度和蔼，行动文明，逐渐涌到街上来看红军，围住红军谈话，有说有笑。做小买卖的很快把担子摆开了，店门都大开了，大街小巷迅速活跃起来，敌人污蔑共产党的欺骗宣传，在光芒四射的朝阳中，象烟雾一般消逝了，群众不断迸发出他们对反动派的仇恨与愤怒，骂声不绝。

五、遵 义

在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下，我中央红军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整整一年的血战，但没有能冲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终于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从突围以来，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军急剧减员，到达遵义时已只剩下三万多人。在这段行军中间，我广大干部与战士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对于行动目标与任务既严守所谓“秘密”，对于战斗部署又尽是被动应战，以致仗没有打好，而损失却异常重大。难道还不应该立即结束这严重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错误领导吗？难道还不应该回到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曾经引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正确路线上来吗？

危急的情况迫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进占遵义后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总结反五次“围剿”的斗争（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同志对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特别对于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和“左”倾错误，还是没有认识，在总结报告中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的原因仅仅归之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这是十分荒唐的。以前几次反“围剿”中，敌人也是强大的，但我们反攻胜利了。在一场革命的开始时期，敌人总是强大的，难道客观上革命就是注定不能胜利的吗？当时被剥夺了在中央的发言权的毛泽东



遵义会议会址

同志，在会议上着重分析和批判了这些“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质的错误。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判，在大多数同志拥护之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决议”指出，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战略是我们不能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我们本来应该采取攻势防御战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五次反“围剿”中，对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以单纯防御代替了攻势防御，经常分散兵力，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

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这一切帮助了敌人的堡垒主义达到它的罪恶目的。本来我们有一些有利条件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的，如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等。但是军事领导上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是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

“决议”指出，王明“左”倾错误在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在战略转移上错过了时机，并继续与敌人拼消耗，忽视了保持有生力量。其次，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突围行动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仓卒出动，没有在中部与指战员中作必要的政治工作。领导机关与后勤组织庞大，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也没有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程度。

“决议”最后指出，我们虽然受到了部分的损失，但是中国的工农革命还是在前进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就是想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许多有利条件依然存在，敌人在五次“围剿”中也削弱了，敌人方面的矛盾与困难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在全体同志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批判了“左”倾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并在组织上撤换了犯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调整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随后，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指挥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

议，是我党历史发展上的伟大转变，它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它标志着我们党已从幼年时期走上成熟时期。

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是贵州省通往四川省第二大城重庆的最重要城市，往南渡过乌江直达省会贵阳。全城分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区，旧城为官署和住宅区，两城隔一条小河，河上有石桥连结。

我们进占遵义城以后，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青年学生，从我们进城第一天起，就自动组织宣传队，手执红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宣传。商人都立即开门营业，并逢人便说红军公道。后续部队进城时全城群众都在街上欢迎，放鞭炮，高喊“欢迎红军”“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三路纵队行进的红军队伍只得停停走走，缓缓前进。红军的首长们都下马步行，满面笑容，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战士们都高高举起手来，向人群打招呼。

全城的大街小巷，凡是能写几个字的墙壁上，很快就写满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取消苛捐杂税！”“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北上抗日去！”

我军进城的当天下午，政治部就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推举代表到天主堂，开了个群众代表会。群众踊跃参加，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总政治部的同志说明了共产党与红军的主张及各种政策，希望各行业都组织起来，向压迫剥削自己的人作斗争。群众不断高呼“拥护共产党！”“打倒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等革命口号。会上还散发了《中共中央告民众书》、《出路在那里》等文件，很多人马上纷纷酝酿筹备建立各种革命组织。

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遵义各学校的学生们就纷纷组织起“学生自治研究会”和“读书会”来进行爱国运动，反对压迫。不久，从外省来了一些进步的青年教师，在这些组织内产生了秘密的“红军之友协会”，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红军进城时，他们立即组织了欢迎红军的工作。总政治部派了李坚真(女)等干部来领导他们，帮助他们加强宣传工作，改称“红军之友社”。社员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

遵义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就有人小军阀官僚修建了高楼大厦，招来了各地工人。这些封建余孽以及他们的狗腿子与把头地痞，对工人们的剥削与压迫是以敲骨吸髓出名的。较有觉悟的工人，早就对现状十分不满，当红军号召他们组织起来时，他们就积极响应，成立了“赤色工会”，从各方面开展了革命活动。

一月十二日召开了遵义市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早一天各革命群众团体就积极筹备，到城内大街小巷，郊区四乡广泛宣传，因而到会群众越来越多，人们叫它“万人大会”。会场设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赤色工会”的会员早一天就搭好了一座讲台，布置了桌椅板凳。场内站不下了，很多人坐到围墙上，甚至爬到房顶上来看。场内外红旗飘扬，情绪十分热烈。一个学校教员主持大会，他用喇叭大声报告了大会议程后，即请毛泽东同志讲话。毛泽东同志一走上前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讲解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说明了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接着朱总司令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讲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然后是“赤色工会”、“红军之友社”的代表讲话。最后全场高呼口号散会。会场始终是热气腾腾的。

遵义的革命人民，除了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协助红军开展各项工作外，还在总政治部帮助下，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选出了主席与各方面的负责人。这个新的革命政权，立即积极推行党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法等。首先发动贫苦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与小商贩。接着清查贪官土豪，没收其财产分给贫民。同时还组织了工人游击队与革命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群众热情很高，很快就近有两千人参加进来。

我们占领遵义后，全市商店顾客盈门。特别是洋货铺、书店、面馆、酒店等。我们经过长途行军，都要补充生活用品，很多人要买文具书籍，有的人想吃回锅肉、羊肉粉等当地美味。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纸币，因为每个伙食单位都按人数领取伙食费，由于自己动手生产，每月伙食费常有结余，这种结余分给每人自用，叫作“伙食尾子”，从几角到几元不等。突围以来，又由于没收豪绅的粮食、家畜等，“伙食尾子”更多。很多人过去没有机会花费这笔“私产”，有的人手头保存着多至数十元以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印发的纸币，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城镇，就设一兑换处，让商人拿我们的纸币来兑取白区通用的货币。这次占领遵义城，我们的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立即派人在商业中心设了兑换处。本来毛泽民同志从突围以来就有一个运输队，带了大量的货币。这次红军没收了军阀王家烈开办的盐行，除了发给贫民一部分盐外，其余低价出售，又收到大量现金。王家烈刚从上海买到的头等香烟，他准备慰劳蒋家军的，也被我们没收，低价卖给群众。所以，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而且纸币完全兑现，商人十分满意。

在我们占领遵义前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整编了队伍。

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充实基层单位，除一军团保持两个师外，其余各军团取消了师一级，军团直接指挥几个团（大团）。八军团因损失太大，分别编入其它军团，充实各单位的战斗力量。同时普遍精简了机关，加强了作战部队。我们扩大红军的工作有了很大成绩。遵义一带的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大约半个月左右各连队共扩大了新兵三、四千人。

我们在遵义一带共休息了十二天。这些天，贵州的军阀王家烈、侯之担等，各找地方养自己的创伤，而蒋家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则急于进驻省会贵阳城，争夺贵州地盘。我们的后勤部门利用这个机会，办了被服厂，为四千新兵制了军装，办了修械所，把缴获的各式武器加以修理。我们的伤病员都得到医治，大家长途行军的疲劳也基本上恢复了。原来参加干部休养连的同志们，本来沿途已经调走了一些可以工作的，这次几乎大部分到各单位去工作了，而另一些身体较差的同志调了进来，其中有董必武同志与徐特立同志，他俩与谢觉哉同志曾被称为休养连三老，此外还有几个半老的。女同志中，原来的蔡畅大姐参加休养连一个多月以后，早已调出工作，别的女同志也有调走的，而另外一些女同志又参加进来，有的专门做连的领导工作或卫生工作，个别的女同志必要时甚至参加担架工作。

六、四 渡 赤 水

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执行了一条新的、完全正确的军事路线。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积极活动，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用高度的机动，粉碎敌人的新的围攻，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

我们整个部队在遵义地区一般休息了十二天，恢复了疲劳，整编了队伍，扩充了数千名新战士，特别是有了正确的领导，全军精神焕发，气象一新。但是当时红军面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数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我军追击、堵截与包围，我们能不能打破这种极端严重的局面，这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生存与发展，就没有今后的发展前途。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军事指挥小组发挥英明无比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四渡赤水的作战行动中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摆脱了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到主动，开辟了新的胜利的前景。

我军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作战命令，十一月十九日陆续由遵义、桐梓地区向西前进，在土城击溃贵州军阀侯之担的三个团，修理好被敌人折断的浮桥，于二十九日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一渡赤水）。当时准备在四川重庆上游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正在四川东北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我

们的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四川军阀急忙纠合兵力到川贵边境布防，并封锁长江。蒋介石的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也从湖南赶来。

我军准备在土城一带消灭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但川敌先我占领了有利地形，我军迟了一步，后续部队也没能立即赶上，虽经几次冲锋，总杀不出一个葫芦形的隘口，地形对我非常不利，到处都象悬崖陡壁一般，不能展开作战，而敌人不断增援，向我来路迂回，使我不得不退出土城，激战了一天终没有消灭敌人。当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土城指挥作战，撤退时敌人火力突然袭击，朱总司令仅由一个排掩护撤出。从前的女游击队长康克清同志，在敌人弹雨中向敌人猛冲，也突围出来。

四川军阀的“双枪兵”源源渡过长江来堵击。我军在这一带同四川的敌军进行了多次激战后，进入了云南东北角的扎西地区，当时是一个空虚地区，在这里暂时集结。二月九日我军集中扎西（威信）县城，恰好是旧历新年，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

因敌人在长江两岸已有周密的防御布置，并且对我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在这一带渡江不利，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命令我军在云南的扎西、镇雄等地打垮一些云南军阀的部队之后，完全出敌人意料之外，突然又重返四川南部，并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在太平渡与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已先到二郎滩的敌人，企图在东岸筑垒堵击。而我仅有渡船三只，每船只能装三十人，渡过了一个营后，同敌人进行了背水战，打垮了敌人。附近的古蔺、古宋地区原有一支新成立的游击队，在这次战斗中起了作用。贵州军阀犹国材的一部赶来阻我前进，被我另一部痛击。我军分几路直趋桐梓，二月二



娄山关——离遵义三十七公里，号称遵义的东大门。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在这里歼灭了大量敌人。

十五日占领桐梓城，随即进攻娄山关。

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领他的兵防守桐梓、娄山关与遵义一线，他亲自到遵义“督剿”，妄想同红军作最后一次较量。二十五日我军猛攻娄山关高地点金山，经过肉搏，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然后连续冲锋，把敌人完全击溃，傍晚占领了娄山关关口。关上只有茅屋两间，有一石碑，写着“娄山关”三个大字。

毛泽东同志当时曾写了著名的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生动地描写了当年红军指战员从拂晓出发到傍晚结束战斗的动人情景。西风猛烈，长空雁叫，红军在月明的霜晨进军，马蹄声微响，喇叭声低沉，一片严肃的战斗前景象。经过战斗后，雄关也被我们占领，大家迈开大步通过，在黄昏中向波涛起伏般的群山奋勇前进。全词写出雄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艰苦奋斗，就能前进，尽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

第二天凌晨，大雾，敌人全力反扑过来，妄图夺回娄山关。我后续部队源源投入战斗，对准往山上爬的敌人勇猛冲击，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我军乘胜击破板桥、黑神庙一带之敌。二

十七日傍晚，我军进到遵义城下，我先头部队把敌人追过新城，向老城发起猛烈攻击，王家烈的“双枪兵”如惊弓之鸟，狼狈败逃，我军于二十八日重占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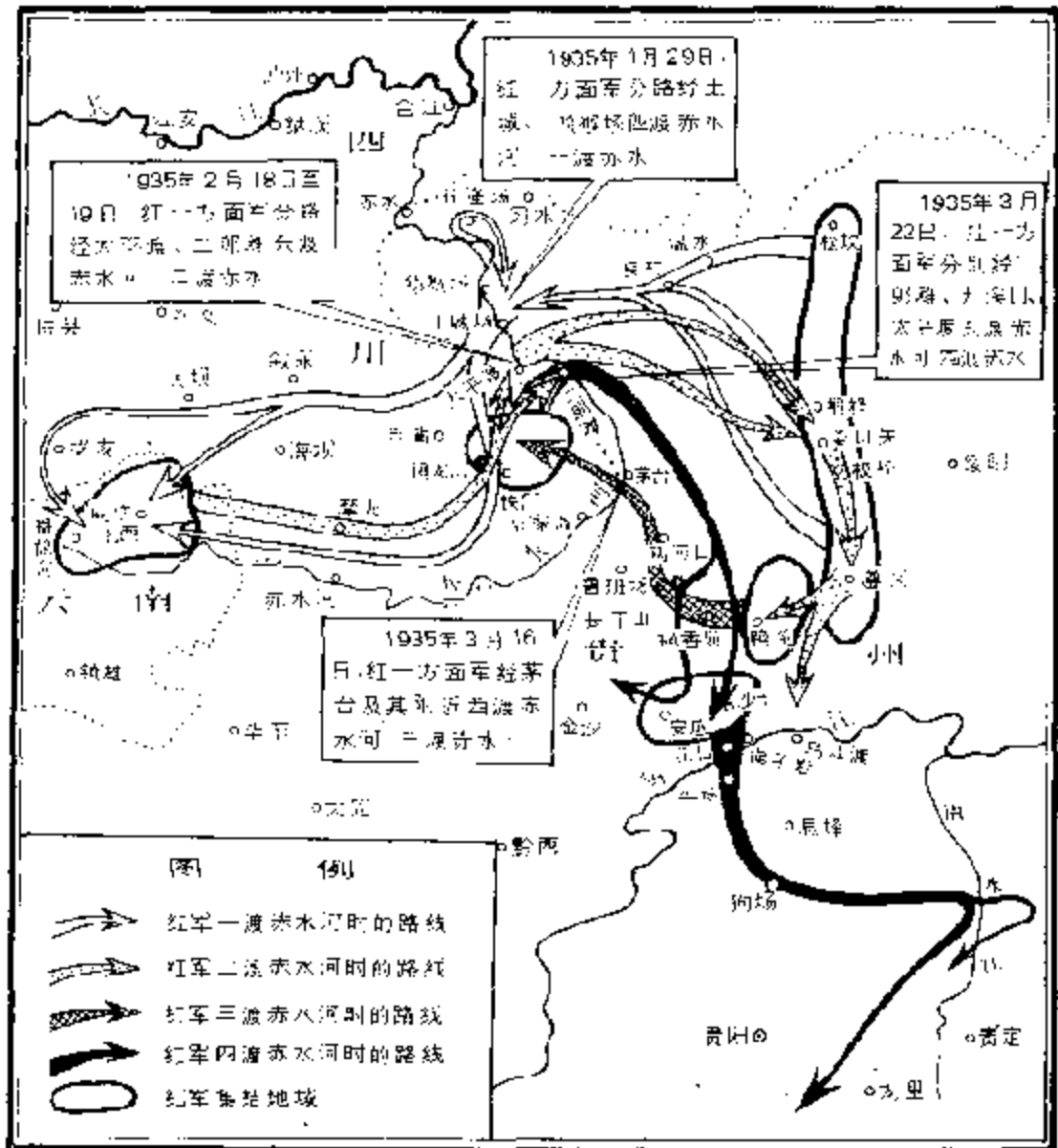
遵义全城又重新沸腾起来，人民在红军支援下打开牢狱，救出亲人，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红军，痛诉敌人的残暴。别离不过数日，人民受到的迫害是很多很多的。我军指战员目睹这一切惨状，莫不义愤填膺，更加奋勇杀敌。

当时刚刚占据省会贵阳的蒋军吴奇伟纵队，奉蒋介石的命令，急派两个师来抢救遵义。我军于攻占遵义的第二天，即南下迎击。我们的一支部队在正面采取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与疲劳敌人，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时，即依山固守，坚决抵抗。当天下午，我第一、第三两军团主力向敌人左右两侧展开反攻，黄昏前敌人就全线溃退，敌主力被我军在遵义城外歼灭，残部狼狈向乌江回窜。我军乘胜猛追，赶过敌溃兵，径直往乌江追歼残敌。当我军追到乌江时，吴奇伟只带少数败兵过江逃去，便斩断了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一千多败兵留给我们扩充了俘虏的队伍。

这一战役共歼灭敌人二十个团，俘敌三千人，取得了我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缴获了新枪、大炮与各种弹药等军用物资，解决了我们的困难，使我军指战员一个个兴高采烈，遵义市人民莫不喜气洋洋。

这一伟大胜利震撼了全国，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督剿”，调兵遣将向我军进逼，采取南守北攻的方针，妄图压迫我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消灭我们。毛泽东同志洞察敌人奸计，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引诱更多的敌人前来合围，遂以一部兵力利用桐梓、娄山关与遵义一线的有利地形，节节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四渡赤水河示意图



阻击北面进攻之敌，而以主力在鸭溪、鲁班场地区寻求将军周浑元纵队作战。当敌人逐渐逼近时，为了进一步迷惑与调动敌人，我军突然于三月十一日北进，并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河，重进川南的占蔺地区。

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与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往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与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敌人以为我军仍企图北渡长江，蒋介石急令四川、贵州与湖南军阀部队及周浑元、吴奇伟等各路大军向我进逼，又调云南军队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军形成包围圈，在长江南岸歼灭我们。

正当蒋介石忙着调兵遣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指挥红军向东回师，突然折回贵州，于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向南，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经枫香坝、沙土直指乌江南下。除留下九军团在乌江北岸迷惑与牵制敌人外，我军于三月三十一日南渡乌江。乌江南岸早已有敌人防守，各渡口的船只与道路均已被破坏。我先头部队在大风雨的黑夜乘竹筏渡江，消灭了一个渡口的守敌，然后横扫南岸，在几处渡口架浮桥，让主力迅速过江，把蒋介石集结的敌军全部丢在乌江以北。

我军南渡乌江后，在牛场集结，即佯攻息烽城，大军继续南下。蒋介石当时飞至贵阳指挥，因害怕我军直取贵州省会，急

忙抽调部队增援息烽，并调云南军队到贵阳附近来防守。但我军出敌意外，不沿公路直趋贵阳，而向东进入开阳县境，并且分兵一路向瓮安、黄平前进。敌人以为我们又要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急调薛岳和湖南的部队向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我们为了促使敌人迅速东移，继续往东佯攻，并在清水江上搭浮桥，作东返湖南的姿势。当时毛泽东同志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一丝不差，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行动了。云南军队被调来贵阳附近，其他敌军也纷纷向东移动了。

我军在贵阳东面的老坝香一度集结之后，迅速地转向贵阳，四月初在龙里县城北将滇军一部包围，予以痛击。又在贵阳与龙里间同另外的滇军作战，然后我大军八日在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向云南方向急进。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远远抛在后面了。

整个四渡赤水河的战役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运动战。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以各种佯攻调动敌人，争取自己主动，逼敌陷于被动，弄得敌人捉摸不住我军的动向，疲于奔命。当敌人以为我们决心北上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南下，当敌人以为我们准备东还的时候，我们却转头向西，扬长而去。敌人的尾追挡堵，尽是枉费心机。这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一个光辉范例，真是用兵如神，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让蒋介石吹嘘他困守贵阳的“妙算奇功”吧！红军远走高飞了，燕雀哪知鸿鹄志呢？

七、“金沙水拍云崖暖”

云南军阀的主要部队已经被我东调贵州，我军西进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好象长了翅膀，每天走一百多里路，两天占三城(惠水、长顺、紫云)。贵州西南部各地少数民族居住较多的是布依族与苗族。这些少数民族过去受汉族军阀的长期压迫与剥削，因此，他们初看到我们这些汉族人的武装队伍的时候，不了解我们，“呜…呜…”地叫着往山林中逃跑。经过我们的喊话，特别当他们看到我们和气的样子，逐渐有人转回来。有的热情地为我们带路。我们在这些地区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打土豪。在他们的民族武装管辖的地方，我们跟他们的头人交涉，向他们解释我们的主张，保证秋毫无犯，只是借路通过，使他们放心，不要怕我们收缴他们的枪支。经过我们的工作，他们总是热情地让房子给我们住，派负责人带领我们到他们管辖的边界。告别时，我们送些步枪和弹药给他们作礼物，彼此依依不舍。

我们在离开贵州之前，遇到过一些驻在各地的贵州军阀的“双枪兵”，他们都是不堪一击，一打就逃。我们在抢渡北盘江的时候，先遣队得到少数民族的指点，找到了可以徒涉的地方，渡江占领阵地，然后搭浮桥让后续部队通过。在北盘江对面的一个重要渡口白层镇，原驻有一营敌人，他们害怕被我军消灭，派人过江来谈判，表示愿意撤出渡口，让我军过江，要求我们

假打一下，使他们好向上级“交差”。这样，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这个主要渡口。

接着，我军迅速占领了贞丰、兴仁、安龙县城，于四月下旬陆续顺利地进入了云南省境。我一、三、五军团几天内攻占了占益(分县)、马龙、寻甸、嵩明等城，直指省会昆明市。当我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截获了从昆明来的一辆汽车，薛岳的副官坐在里面，满载着军用地图。据称，他是薛岳派去同云南省主席龙云接洽的，前日薛岳去电，请龙云送给云南军用地图，龙云除给军用地图一套外，并送薛岳大批白药(医治外伤的贵重药品)，宣威火腿及普洱茶等，共满满一车。他万没料到红军这样神速地深入云南境内，以致被红军俘获。这些地图给了我们很大帮助，龙云作了一件好事。

贵州以“地无三里平”著名，我们初入云南时，也是山里来，山里去，但是到了曲靖附近，从山上远望曲靖坝子，好象到了一个海湾，平坦广阔，人家都非常高兴，快步下山，不觉到了平地。可惜这个坝子，不到几个小时就被我们跨过去了。

我军迅速西进，吓得龙云把各地的少数驻军与民团都调来昆明，蒋介石也在贵阳惊魂定下来后，姗姗飞来昆明督战，电令他的中央军赶来守这个省城。但我们逼近昆明时，却转向西北直趋金沙江，先头部队一军团占领禄劝、武定，并占领云南通四川主要公路上的元谋县城，向主要渡口龙街渡急进。同时，三军团也直向洪门渡进军，而干部团则向中间的皎平渡高速度地前进。

干部团是中央纵队的主要战斗力，有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学员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另外还有一个上级干部队，即原红军大学。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

志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直接部署干部团这一夺取渡口的战斗行动。四月二十九日的下午，干部团在距离金沙江二百八十里的地方接受了抢夺渡口的任务。团长陈赓同志的命令是：以二营为先遣支队，五连为前卫连，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

这个先遣支队，在刘伯承同志直接指挥下，经过政治动员，在“夺取金沙江纪念‘五一’”的战斗口号声中，迅速出发了。“五一”将夜半，他们已经到达离江边不远处，五连连长肖应棠同志命令一排向江边急进。当一排的侦察组走到江边时，发现两只渡船在岸边，一个船夫懒洋洋地问话：“回来了吗？”我们的侦察员一面答应：“回来了！”一面抢上去，枪口对准了几个船夫。就这样把两只渡船俘获了。

本来自红军进入云南以后，四川的军阀怕我们渡江北上，急忙封锁了金沙江，把所有的大小渡口的船只都拉到北岸，甚至完全破坏。据船夫说，皎平渡现有一个厘金局征收过江货物的税，有一个三四十人的保安队。这天早晨又来了一连四川军队，住在村的右边。码头上经常有一名保安队员放哨，最近因为情况紧张，增加了一名。敌人虽然怕红军渡江，但认为这里不是主要渡口，红军还在二百多里以外，还不会来到这里，所以只派些使衣侦探过江打听消息。今天过江来的侦探们久不回去，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抽大烟，或者到什么地方敲诈老百姓去了。

五连连长摸清情况后，安慰了受惊的船夫，答应多给银元，鼓励他们把我们送过江去。一二排分乘两船，三排留在江边准备以火力支援对岸。两只船朝着灯光闪闪的村子划去，夜是静静的，但江涛激荡，浪头打着船身“砰砰”地响。几个学员帮助

船夫摇橹，其余的握紧枪支，准备战斗。

船靠岸了，两个学员迅速上岸，几步直奔稍高处的两个哨兵，他们刚才说出：“喂！怎么搞的，这才回来”，只听得一声“不准动！”他们便成了俘虏。连长过来问他们村内的情况，完全和船夫讲的一样。按预定计划，通讯员收集了一些茅草，在江边烧起来，报告五连已经渡江成功。连长随即命令一排往右打敌人那个连，二排往左打保安队。一排到达敌连部门口，敌人哨兵喊问：“谁？”我们押着的俘虏答道：“自己人”，“保安队的！”哨兵刚要再问，学员们已经捂住了他的嘴。问了他院内的情况，全排冲进了院子，踢开了几间房子的门，冲进去大喊：“缴枪不杀！”满屋子烟雾腾腾，“双枪兵”正吞云吐雾，吓得惊惶失措，互相呆呆地望着，在闪亮的刺刀前面，来到院子里集合。只有敌人的连长和几个军官，在另外一间屋里抽烟，听见响声出来，打了几枪逃走了。二排来到厘金局门口，敲门叫“纳税”，那些保安队员，有的正抽鸦片，有的正打麻将，见是红军进来，吓得魂不附体，一个个象小鸡似地被抓起来，连保安队长也没逃掉。通讯员再在岸上烧起一堆大火，报告渡口的敌人已经全部解决。

上千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向金沙江靠近，刚要下陡坡，陈赓同志在督促部队迅速前进，他指着从两侧高山蜿蜒而来的、闪着银灰色光辉的江水，说道：“这就是金沙江，下去还有四十里，三营已经赶往江边。这边没有敌人”。大家走着走着，逐渐听到江水的低沉但是有力的波涛声，个个精神奋发，直趋江边。很快前边就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我三营已经过江，消灭了敌人，完全控制了渡口。不由得歌声在队伍中响起来，压住了越来越高的金沙江的吼声。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至九日，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九天九夜的努力，胜利渡过金沙江。

一路下坡，虽然已是黑夜，上千队象跑步似地急走。江边几只马灯闪着明亮的红光，两只渡船上也有马灯，照耀着滚滚的江涛。渡船急忙地来回在大约三百米宽的江面上，载着革命的军队跨过波涛滚滚的金沙江，去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大家安静地等待着上船的时刻，一个紧跟一个踏上渡船，不约而同地瞪着汹涌的江水。浪花飞溅上衣襟，甚至脸上。有的人不由得弯下身去，用手掌弄一点江水上来。指挥渡船的同志不断叫唤：“站好！站好！”

干部团渡江后，就在沙滩上露营。许多人跑到江边，痛快了几茶缸水，洗了脸，然后吃了点干粮，倒下便睡。有些人找到山下的石洞挤了进去。但金沙江两岸都是高山，只有热

风随波涛翻腾着，热得气闷，沙滩上倒好些。睡不多时，被叫起来吃早饭，天还没亮，星星还在高山边闪烁着。前卫营昨夜已经又前进十六、七里，在上山的半路一个较平坦的地方露营，大家抱着枪呼呼地睡觉了，只有炊事员拾柴、烧水、做饭。

上干队在暗淡的晨光中走上山路仅几里，就听到前面已有枪声。前卫营已在离山顶不远处同下山来的敌人接火，敌人大约有一个营。昨夜从俘虏兵口供中，已经知道前面还有敌人要来加强渡口的守卫。一阵枪声之后，山上滚下来石头，“哗啦……哗啦！”大块石头越滚越碎，酷象一阵阵的榴霰弹。有些同志被石头打中，我们很快靠近岩边走，或利用死角，拉长距离，缓缓前进。重机枪被调到前面，开始射击。团长命令冲锋，九连向前猛冲，敌人很快就垮了、散了。我们一气追了一、二十里，占领了山顶，团长命令停止追击，就地休息。

那天中午，十部团往通安镇方向前进。前卫营的侦察员闯进街上，发现街上已有很多敌人，正在休息，好象刚米到的样子。我们侦察员把敌人惊醒了，吓得他们慌慌张张往镇子后的山上爬，想占领有利阵地。我前卫营也上了山，和敌人打起来。不久，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同志奉命从渡口率部队赶来，展开了激战。上下队刚到达距通安三里路的地方，队长萧劲光同志手持望远镜，正在观望，另有许多干部也在“观战”。这一仗打得并不激烈，敌人枪声少，但叫喊声多。不一会敌人就垮了，向后逃跑了。我军追了十多里路，俘虏六百多，其中有一名团长。据说共来了两个团，都被打散了。我们顺利占领了通安镇。这胜利巩固了渡河点，保证了全军源源渡过金沙江，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我们在皎平渡，除当夜俘获的两只渡船外，又搜到另外四

只。这六条渡船，有的已经相当破旧，来回装运我们的人员。一个渡江指挥部成立了，把渡江组织得很有秩序，一切按“渡江纪律”进行，没有发生事故。

毛泽东同志于五月三日傍晚过了江。他立即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与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全部渡江工作，并研究渡江后的各项任务。江边没有房屋，只有几个破石洞。警卫员把一个洞内的脏东西大体上清扫了一下，并在别处找到了一块小木板。毛泽东同志亲自动手，和警卫员在这热得闷人、又很潮湿的洞子里，把小木板架起来当桌子使用，摆上了办公用品与各种文件。夜晚，毛泽东同志在潮湿的地面铺上一块油布，盖一床毯子睡觉。他这样在江边住了好几天，直到全军快过江完毕，他才迅速赶到前面去。因三军团紧接干部团过了江，毛泽东同志命令三军团任前卫，赶往会理一带阻击可能来犯的敌人。

三军团原定在洪门渡过江，但先头部队赶到时，没找到渡船，而江流太急，不易架桥，因此，军委命令他们改往皎平渡过江。一军团在龙街渡也没找到渡船，而那里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干扰，因此，军委也命令改往皎平渡。这样全军都集中在皎平渡渡江了。

五军团这次也是殿后部队。我军开始渡江三天后，敌人的一个师约五、六个团，向皎平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仓惶败退。敌人这个师因脱离主力太远，又不知我军情况，被我一追，就退到团街固守起来。我五军团一个团阻击这股敌人，直到我军快要全部过完的时候，才撤下来赶至皎平渡过江。这样我军经过九天九夜的努力，胜利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到第十一天敌人主力赶到江边时，红军已把船只烧毁，远离江岸了。我们这次渡江，船夫约三十六人起了很大作用，我

们每天每人发工资五元，并每天杀猪宰羊优待，毁船时我们作了解释，并每人发给现金三十元。这些船夫，经过几天的共同奋斗，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有的跟我们进入四川，当了红军。

九军团由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同志率领，留在乌江北岸掩护我主力南下，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在贵州北部起了游击支队的作用。他们沿路没收了财东地主们的盐巴、粮食等分配给当地的各族穷人，深得群众的拥护。他们边打边向西挺进，占领云南的宣威县城时，把地主们数以屋计的著名的宣威火腿散发给周围的群众。五月初，他们在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找到一支旧木船，渡过对岸一连多人，袭击不远的一个税局，把缴获的十万斤盐巴分给群众，由群众把被隐藏的与从江底打捞上来的大小盐船共四十多只交出来，接运红军过江。九军团就这样仅用一天多时间，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渡江后同样发给船夫现金，把所有船只沉没了。九军团在单独活动了两个多月，转战数千里之后，在西昌坝子同主力会合了。

我们在通安至会理一线接连举行了会餐和晚会，庆祝抢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并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不断欢唱《渡江胜利歌》：“金沙江的流水哗哗响，常胜的红军胜利地渡过江，蒋介石吓得大惊慌，帝国主义弄得没主张……”

巧渡金沙江成功，是我军在这次空前的战略转移中取得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由于这一胜利，我们把数十万敌人甩在很远的后面了。我们在会理休息了五天，把敌人围困在县城里不敢出来。

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并批评了林彪的错误。

林彪在“八一”南昌起义时曾担任见习排长。汕头失败后，朱德、陈毅等同志领导一部分部队向江西撤退的途中，林彪开小差逃跑，只因为害怕被土匪捕杀，又归队继续工作。在井冈山时期，他又一再动摇，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并有流寇思想，曾经毛泽东同志耐心教育，但他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未根除。在反五次“围剿”中，他赞扬“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支持王明错误军事领导。他在遵义会议上态度暧昧。遵义会议后，他又不断对抗和干扰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和战略部署。

一渡赤水后，军委根据情况的变化，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改变计划，并具体指示担任先遣队的一军团向扎西集中，而作为军团长的林彪竟公然对抗，不执行军委命令，反而要军委靠近他集中。他把部队往西带，离主力越走越远。军委为了调一军团到扎西地区集结，前后六天给林彪下了八次命令。林彪拖延了四天，才不得不带部队向指定地区集中，几乎误了军机。

遵义战役前，毛泽东同志了解到遵义一线敌人力量薄弱，命令部队迅速攻击娄山关，乘胜占领遵义城。而林彪提出要停一、二天，等第五、九军团和干部团到齐，实际上是他不敢打。当红军击败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板桥地区后，军委指示一、三军团乘胜紧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增援遵义的吴奇伟两个师，林彪又消极抗令，徘徊不前，受到了军委的严厉批评，才带领部队向遵义前进。红军于凌晨先敌占领了遵义，吴奇伟部上午才赶到遵义城南，双方在老鸦山一带展开了激战。由于我红军抢先一步，先占有利地位，指战员英勇战斗，歼灭了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分。如果按林彪那样迟疑一步，红军必然会陷于不利条件下作战，甚至可能失掉胜利。

在以后进军云南的途中，林彪对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指挥不满，发展到反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事。渡过金沙江之后，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攻击四渡赤水，并说“毛、周、朱的领导会失败的，你下台吧。”他把这封信念给许多人听，企图煽动别的同志附和他。他要政委聂荣臻同志在信上签名，聂政委严词驳他，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仍把信送走了。

聂荣臻同志把这情况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毛泽东同志乘当时休整的机会，召开了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和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他，指出这在政治路线上与组织路线上都是严重的机会主义，并责令他向每个有关的人传达会议对他的批评，消除恶劣影响。当然他只是照例匆匆忙忙，嬉皮笑脸地讲几句，敷衍了事，更不表示对批评的意见。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是遵义会议基础上的新的胜利。

八、“大渡桥横铁索寒”

我们继续北上，经德昌向西昌从容前进。

为了迷惑敌人，军委命令一军团派出一支部队在大渡河下游佯动，吸引大渡河北岸之敌，以便我军经冕宁北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

这支佯动部队五月二十日从泸沽出发，直指小相岭，在高耸的群山中钻来钻去，昼夜不停，白天太阳晒得人汗流浹背，夜间象黑漆一般什么也看不见。上山又下山，一天走了一百五十里，来到小相岭。据调查，山顶有敌人一个排，挖断了上山的路，在隘口放有哨兵。带路的老乡熟悉上山采茶的小道，我们的一个排跟着他隐蔽地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攀缘而上，把正在打麻将的敌人全部俘虏了。我们给了向导重赏，越过了小相岭，继续向越西县城前进。

国民党越西县长，早已被红军渡江的消息吓得坐立不安，发觉通小相岭的电话打不通了，估计情况不妙，就带着老婆、官吏和守城的两个连，仓惶向富林逃去。我们进入越西城时，汉族与彝族人民都来欢迎我们。彝族人民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十分仇恨国民党，但国民党逃走时还造了许多“共产”、“公妻”之类的谎言，彝民开始还不了解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等到亲眼看见我们和蔼可亲，就敢于同我们亲近了。

越西县城的监狱里关着几百名彝族人民，其中有沽鸡、罗

洪等部族的一些头人。我们知道后，就去打开监狱，这里面的人，哪里还象人！一个个躺在烂泥、屎尿、污水坑里，蓬头黑面，赤身露体，脚镣手铐把他们压得无法动弹。红军战士替他们一个个打烂铁锁，把他们背出牢门。这些人有的关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还算是没有被折磨死的。他们的“罪名”，有的是不肯执行国民党反动派“以夷制夷”的反动政策，不忍残杀其他族人；有的是没有按“章程”给国民党反动派供应劳役，送青年妇女；有的是交不起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等等。反动政府还搞了个“换班坐牢制”，强迫那些违反规定的头人和他的子孙们轮换着坐牢，作为人质，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毒辣手段。

彝族人民仔细地寻找自己的亲人，发现有的骨瘦如柴，有的已经死了，大家嚎啕大哭不止。红军战士看了这种情况，也禁不住淌下热泪。战士们高喊着：“打倒万恶的国民党！”“为受难同胞复仇！”彝族人民也同声喊着，并高喊：“红军卡沙沙（感谢红军）！”“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

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了彝族人民。当夜就有彝民的头人派代表，带着通司，来找红军的负责人。一见面就跪下磕头，把他扶起来，才勉强坐下。他代表头人感谢红军对彝族同胞救命之恩，表示要给红军带路，一齐去消灭国民党反动部队，活捉越西县长。我们向他道谢，他高兴地回去了。这样我们完全解除了通过彝族地区的顾虑，并且得到了彝族人民的帮助。

第二天早晨，无数彝族人手持长矛大刀，喊着“红军瓦瓦苦”从山坡跳下来欢迎我们。彝族头人十分热情地用手势表示欢迎，有的彝人帮助我们背行军锅、背包，他们赤着脚走得飞快，一路跟我们欢笑。在彝族兄弟的协助下，我们终于赶上了

敌人，同敌人展开了激战。彝民们也紧紧跟上，用长矛大刀砍杀敌人。敌人全部被消灭了，伪县长也被活捉了，彝族弟兄出了多年的怨气，他们把俘虏二、三百人全剥光了衣服，准备杀掉报仇。经过我们再三解释，才留下俘虏兵的生命。

第三天，我们又继续前进，我们侦察排机巧地消灭了大树堡以东的敌人一个排哨后，大树堡的敌人一个营慌忙逃往对岸的富林。我们一直追到大渡河边，夺取了一只渡船，活捉了敌官兵数十名。我们沿河搜集了渡船与架桥材料，动员了几千群众，积极作渡河的准备。我们散布消息，红军要在这里强渡大渡河，攻打富林，进军雅安，解放成都。这个消息震惊了敌人，使他们日夜提防着红军在这里渡河。

实际上，我们派出了佯攻部队的同时，我主力部队就直指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准备在那里渡河。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保卫部长罗瑞卿同志等直接率领一支先遣部队，迅速北上，夜行军九十里到冕宁城，伪县长带了二、三百个民团早跑了，监狱被打开，各少数民族的所谓“犯人”以及少数民族头人的人质都跑光了，只见满街上挂着红旗，写着“欢迎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到处响起爆竹声。群众拱手慰问我们“辛苦了”。蓬头赤脚、披着麻布毡子的彝族人，见了我们就下跪表示欢迎，我们连忙扶起，握手欢笑。街上店铺大开着门做生意，商人说：“听说你们在泸沽对老百姓很好，公买公卖，打富济贫，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怕，没有跑。”

快要进入大凉山彝族区了，我们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深入解释党的民族政策，使每个指战员深刻了解，认真执行。特别是这里彝汉民族对立的情绪很严重，彝族内部又因

为各部族间不和，有时械斗，所以需要十分慎重，才能争取顺利通过。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如果不能迅速抢过大渡河，势必被迫更向西转入川康交界地带，因为后面的国民党军队已到达金沙江一线，而四川军阀的军队，正向大渡河急进。

五月二十一日，我们从冕宁向彝民区前进，他们见红军来到，便四散逃走。我们抓到十余人，以酒肉款待他们，向他们宣传，他们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进入大凉山。一股彝民向我工兵连袭击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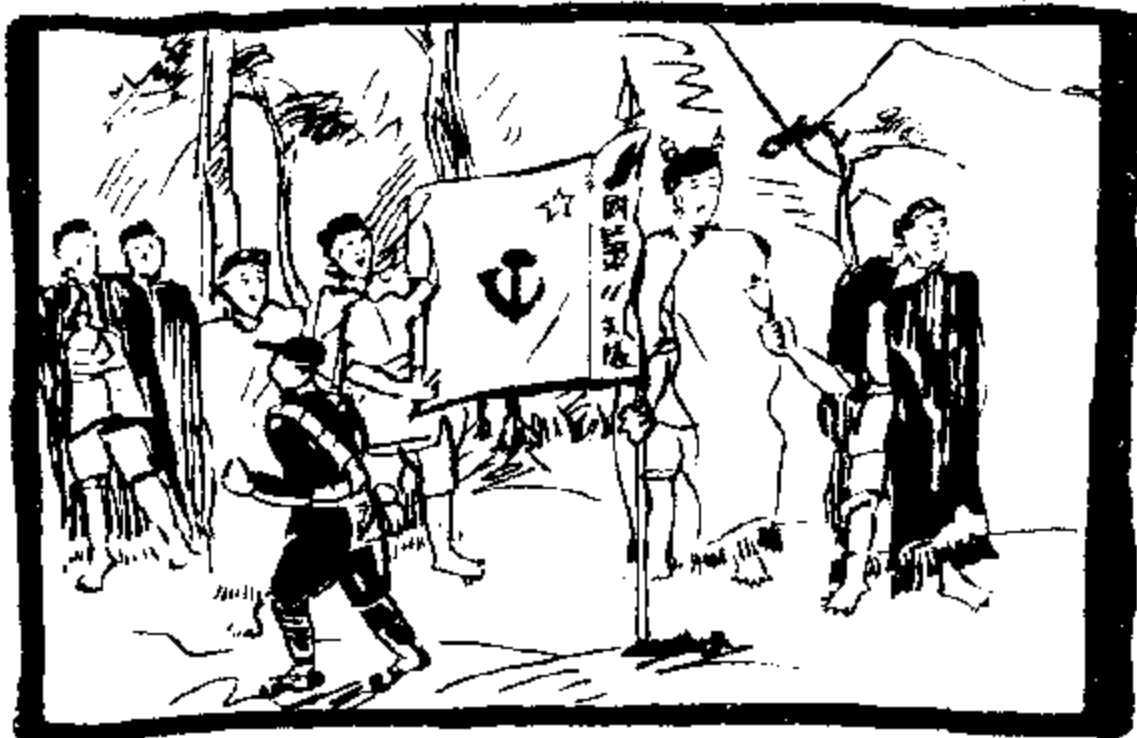
我们继续作宣传工作，要求他们同红军联合起来，分财主家的衣物粮食。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工作，来了一个很高大的彝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年轻人，到了我们面前就坐在地上。他听了我们的话后，就说：“我是沽鸡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我们一面派人回去报告，一面邀他到司令部去谈。他带着一班人跟在我们先头部队的领导人后面走着，但是当他见到我们的队伍上着刺刀，警戒森严的时候，就不敢再走了。经过解释，他还是在山上走，不肯走平路。

经过一片森林，来到一个平地，有一个清水池塘。刘伯承同志骑马来了。经介绍后，小叶丹立刻行鞠躬礼，一齐在塘边坐下。小叶丹问：“你是司令员？”刘答：“我是司令员。”又问：“你姓什么？”回答：“我姓刘。”小叶丹说：“我要同刘司令员结拜为兄弟。”刘司令员马上答应了。小叶丹派人回去拿了一只鸡来、一个彝民用刘司令员的茶缸子从塘里取了一缸子清水，一只手拿着鸡，一只手拿着一把刀，口里念着：“某月某日，司令员，小叶丹在海子塘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改变，同鸡一样地死！”他

用刀从鸡嘴巴顺着脖子向下破，鸡血淋淋地滴在缸子中。这血水被分成两缸子，小叶丹要求司令员先喝，刘伯承同志拿起缸子来，重复一遍誓词，一饮而尽。小叶丹一面大笑说：“好！”一面照样重复誓词，把血水喝下。

这样宣誓结盟之后，小叶丹才完全没有顾虑，带了他一班人，同我们一起下山，回到大石桥来。我们做了一些菜，请小叶丹他们喝酒，他们很高兴。饭后小叶丹向司令员说，明天他要沾鸡家的人到山边接红军过去。

第三天，我们重上山区，果然沾鸡族的彝民拿着红旗，口里喊着“呜……呜”欢迎我们。小叶丹领着我们上山，在一个村子边，一群人站好了队，举着“中国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子，笑嘻嘻地看红军队伍走过去。这里四周都是高山，地上碎石很多，



红军彝族游击队

在土与碎石混合着的地里种着玉米，看样子已经快熟，但只一尺多高。人们打着赤膊，赤着脚，身上围着粗毛毯子。他们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

这里气候很坏，风大，经常忽然下一阵雨。我们在这高山·上露营一夜，因为房屋很少，又都是树枝编成的茅屋，又低又小，无法挤住多少人。再走不远，就不是沽鸡族的地方了，小叶丹告诉我们，他送到这里为止，他派四个人送我们到前面的村庄。我们送了他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他也把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司令员。

在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又经过了几个家族住居的地区，那些彝民在山上叫喊，经过带路的彝民回答后，就不叫了。许多人站到路边用好奇的眼盯着队伍，有的还指手划脚议论着。

离开彝民区，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还有一百四十里。中间在岔罗镇没收了敌人的一个兵站，把粮食分配给群众，并弄清了安顺场的敌情。那里驻有川军一个营，仅有一只小船往返河上，白天在对岸，夜间留在这边。我们急行军，要抢到这只船。指战员知道了面前的战斗任务，心急如火，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直指安顺场奋勇急进。

安顺场处在一个河谷地带，两边都是几十里路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里，部队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据传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一八五七年从首都南京出走，单独行动，一八六三年被清军逼到这一带，在安顺场被清军联合彝民消灭，石本人被捕杀。红军当时的处境是十分严重的：前面有敌人扼守天险大渡河，后面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西面是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困难重重。蒋介石知道了我军向大渡河推进，十分高兴，以为我们即将成为石达开第二，曾派飞机来散发传

单，叫嚷他的这个主观愿望。但这些反动派无法理解一支真正革命的伟大的军队，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之下，是不会这样被消灭的，它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制服一切敌人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次渡河的战斗，他派了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与一军团聂荣臻政委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红一军团团长杨得志同志与团政委黎林同志担负了这一光荣任务，这就是消灭安顺场的守敌，找到渡船，抢渡天险大渡河。

五月二十四日夜，先头营翻过了一座大山，从山坡上看见山脚下星星般的灯光，听见大渡河隆隆的吼声。安顺场就在眼前了。晚十点，我军静悄悄地冲到街上，房子透出灯光，敌人还在拉胡琴唱戏、打麻将。我们从三个方向冲锋，仅二十多分钟就把敌人解决了。只剩下敌人一个副团长带着二十多人逃进一家土豪的楼里，顽抗不缴枪。在离安顺场二百米的地方，是敌人的渡河点，少数敌人正乘着一只小船向对岸逃跑，离岸已有三、四十公尺。我军找船的战士跳到水中，拿机关枪扫射，命令他们回来，这几个敌人只得把船划来岸边，当了俘虏。那个副团长的一伙人很快也被解决了。

因为水流太急，决定明天一早抢渡。拂晓，指挥员们都到河边进行战前的实地观察和调查，发现河面不算宽，不过三百来公尺，但河水实在很急，波浪涌起一个接一个的漩涡，而中流又有几处石礁，急流撞上去，激起很高的白浪花。对岸是几公尺高的峭壁，渡口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很陡的台阶共有四一多级，这是上山的唯一道路。在这上面，敌人一个营筑有四个碉堡，周围布满了散兵壕。

天刚亮的时候，强渡的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炮兵连的三门迫击炮，组织好了火力。找



安顺场，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这里地势险要，敌人重兵把守。红军为了夺取这座天险，进行了艰苦的战斗。最后，红军终于攻克了安顺场，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安 顺 场

安顺场。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管你什么险山恶水，我们一定可以克服，石达开兵败安顺场，但是今天的安顺场对过，大渡河北岸已经过会了许多无上英勇的红色英雄，并且打垮了守河的敌人！

到了几名船工，经过做政治工作，船工积极同我们合作，把船修好，愿意亲自掌舵，把部队送过大渡河。大家都争着要坐第一船打过去，最后批准了二连连长、一排长、两个班长、十三名会游水的战士，共十七人乘小船强渡过去。

九点钟，杨得志团长一声号令：“战斗开始！”冲锋号响了，轻重机枪，一齐开始向敌人的工事射击。二连连长一招手，小船解开绳子，向中流划过去。敌人的枪弹在船的周围扬起了一团团的浪花。小船在浪花中时隐时现，岸上指战员的心随着小船的起伏而跳动。大家一齐站到岸边来注视着前面小船破浪前进，过了中流，进入了悬崖下的死角。很快，小船靠了对岸，红色战士们迅速地从船上跳下来。杨团长紧张地数着人数，一个、两个……，“好！全活着！”勇士们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手榴弹往下扔，一瞬间，勇士们的影子被浓烟遮住了，但是很快从烟雾中出现了一群人影，直向敌人的碉堡冲击。这时杨团长命令炮兵向敌人碉堡猛轰，炮弹正好落在敌人工事里，敌人大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把主要工事控制起来，抗击着敌人。很快营长孙继先坐的第二船增援上来了，自动火器一齐发挥着威力，敌人垮下去了。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第三船也过河来了。杨得志团长坐在船头上，鼓励着岸上的部队追击敌人。十七勇士带头向敌人猛冲过去。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征服了天险，打垮了敌人，使红军大部队得以顺利渡过大渡河。他们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这就是后人不断称颂的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部队紧接着一批批过了河，把附近几里之内的敌人都肃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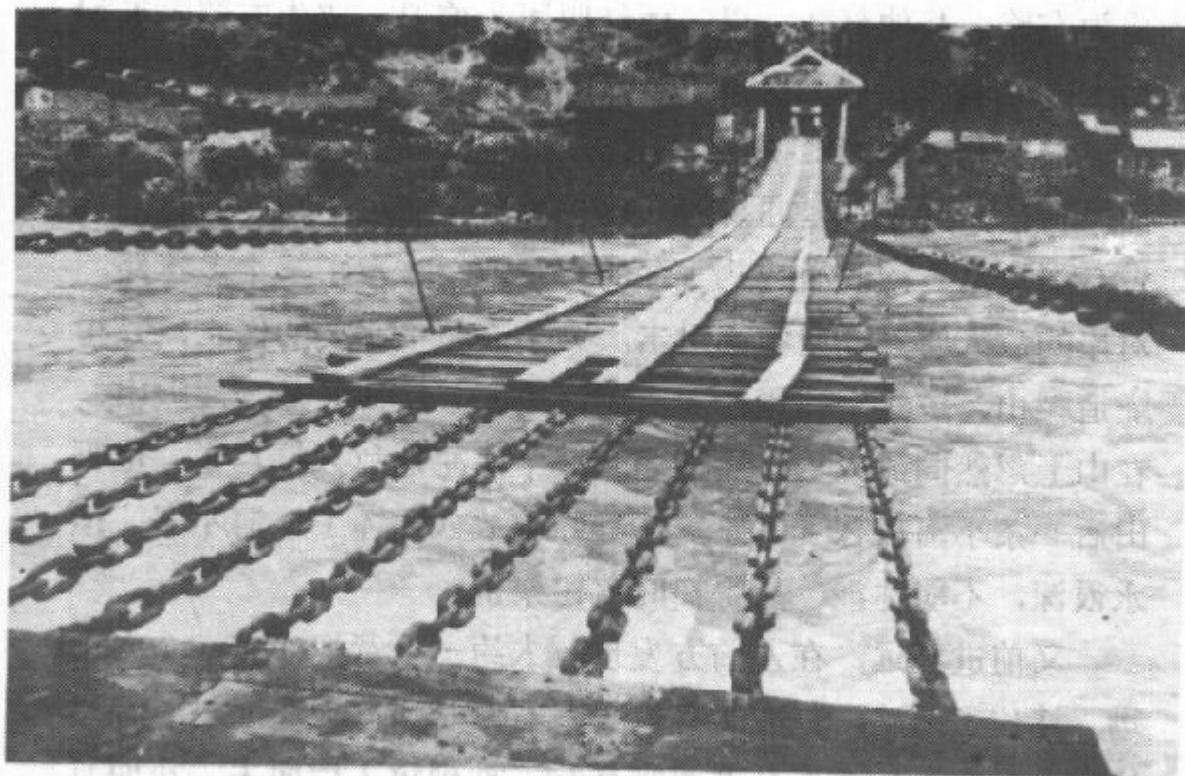
这一带群众，很多人跑来帮助我们，又找来了一条渡船，还修好了一只坏船。但是这几只船不能解决部队渡河的问题，

又不能架浮桥，于是决定一军团第一师与干部团在这里渡河，成为右路，其他部队，以二师红四团为前卫，成为左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由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约三百二十里。左路大军沿河的西岸行进，路是蜿蜒曲折的，崎岖难行。左边是高入云霄的峭壁，右边是波涛汹涌的几丈深的大渡河。才走了三十多里路，对岸的敌人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只得绕道爬山，多走十几里，才回到河边来。前面又是一座大山，在山上忽然同敌人一个连遭遇。一个猛冲把敌人打垮了，但下山后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桥已经被敌人毁坏了。河不宽，但水很深，不能徒涉，只得临时砍树架桥。

又前进不远，在左前方发现敌人约一个营把守着一个大山坳，堵住了道路，正面筑有碉堡，右侧是河，无法通过。经过侦察，决定派一个连从左面爬悬崖，抄到敌人后面去，正面佯攻，吸引住敌人。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前后夹击，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第二天，红四团天刚亮就出发了。团长王开湘、团政委杨成武同志接到命令，限明天夺取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这时，东岸的敌人一面以部分兵力阻击我右路，大部分沿河东岸往泸定桥增援，同我左路隔河并进。我们加快步伐，同敌人赛跑。又在一座大山上遇到一营敌人，经过肉搏，才将敌人击溃，但下山后被一条小河阻住，桥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得又临时架桥。这样一耽误，再绕到大河边的一个小镇上时，天已经黑了，但距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天是黑得可怕，大雨又突然倾盆下来，决定不吃饭，继续前进。行李担子，伤病员以及骡马留在后面。左路第二师的先头团（红四团）以三个步兵营轻装急进。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红一方面军未渡河的先头部队经过急行军赶到了泸定桥，向桥东的敌人发动了猛攻，占领了泸定县城，确保了红军北上的道路。这是泸定桥。

天是这样黑，伸手不见掌，雨又不断地下，路滑泥泞，大家不断跌交。走不多远，对河的敌人点起火把了，他们想赶在我们前面到达泸定桥。情况紧迫，我们也立即点火，并告诉各连队，如果敌人隔河相问，就答复是刚被我们消灭的某师某团某营的。这样走了二三十里路，雨更大了，对岸的那条火龙忽然灭了，大概是“双枪兵”不走了。我们利用这机会，更加速前进。指战员都全身湿透，三五步一跌，但是由于疲劳已极，还有人站着打瞌睡的，险些跌下河去。于是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地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这样，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天亮后刚六点多终于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桥头及西岸一带的房屋。这真是一座铁索桥，共十三根用饭碗般粗的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长的铁索：九根构成桥面，每根距离约一尺，两边各两根形成扶手栏杆。河有数十丈宽，流水象瀑布一样从山峡中倾泻而来，冲击着参差耸立的许多怪石，激起一丈多高的白浪，响声震耳。桥的东头就是泸定县城的西门，城一半在山上，一半紧贴着大渡河。

桥面上的木板已经被敌人弄走了，只剩下一些光光的铁索。敌人约两个团，不停地向我们射击。敌人以为我们无论如何过不去，很骄傲地叫嚷：“你们飞过来啊！缴枪给你们！”我们的战士大声回答：“只要你的桥，不要你的烂枪！”我们一面搜集木板，一面组织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可能增援的道路。

中午，开了干部会议，各连都要求担任突击队，最后团首长决定第二连挑选一些身强力壮的人组织突击队，第三连跟进，铺桥板，让后续部队冲进城去。下午四点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冲锋号响了，机关枪、迫击炮声，口号声震动山谷。二连的二十二个英雄冒着稠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索，飞一般地冲了过去。刚到对岸的桥头，敌人慌忙地放起火来，把桥头的亭子烧着了，火焰直往外冒，拦住去路。这时英雄们在激昂的口号声中，不顾一切冲进火焰中去。衣服、帽子、眉毛、头发都烧着了，还是猛冲，一直冲进城内大街上，同敌人进行巷战。敌人集合兵力，企图反攻，但我第三连及后续部队赶过来了，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把两团敌人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逃散了，黄昏时分，我全部控制了泸定城。

下半夜，刘伯承总参谋长与一军团聂荣臻政委从右路来到泸定桥，点着马灯，从桥东头走到桥西头，他们注视着每根铁

索，扶住栏杆，俯视桥下怒吼的急流，仰观四围壁立的高山，久久不愿离去。刘伯承同志感慨地说：

“泸定桥！泸定桥！你真是多么险要的地方呀！现在我们过来了！我们胜利了！”

右路军第一师与干部团分批在安顺场渡过了大渡河。干部团在安顺场对面的安靖坝住了两天，掩护部队按计划前进，然后接着第一师沿河上行。前进的道路，左面临河，有时路就在水里，右面靠山，有时路就在峭壁中。水声是那么大，听不清说话的声音，队伍显得异常肃静。这几天老是下雨，每个人几乎全身都是湿的。沿河村庄很少，山沟里一个很小的平地，就叫作什么坝，几家小店就算一个小镇，几间茅屋就是一个村庄。宿营的时候总是特别挤，基本上没有门板，也无法用禾草，“八项注意”中的这几项就用不着注意了。过去，到了宿营地，总要弄点热水洗脚，以便恢复疲劳，这也免了。连洗脸也废除了。

第二天，先是晴天，翻了两座大山后，又下起雨来。山上主要是彝民，农业技术似乎比大凉山进步些，有些人多少能说几句汉语。路上满是烂叶污泥，大雨后更不好走，下坡溜到宿营地时，天已黑了。以后又沿大渡河左岸上行，河逐渐稍窄，流速加快。波涛冲到乱石礁上。“啪”一声溅到一丈多高，还没落下来，第二个浪花又飞起来了。

走在干部团前面的第一师，离开安靖坝不到半天，就和敌人接触。敌人在隘口上修了碉堡固守着，我军完全是背水仰攻。但是我军勇猛冲锋，敌人不得不退走。这一带直到泸定桥，敌人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双枪兵”两个旅，这里一营，那里一团，比较分散。他们遇到我军猛冲，总是很快被击溃。最后当我左路大军已占领泸定桥，敌人在泸定桥南六十里处被我第一师痛

击后，他们害怕被我夹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逃去。我军跟踪追击，把他们在化林坪的预备队一个旅全部击溃了。这样，我们两路大军就在泸定桥南面会合了。

尽管敌人用追击、堵截的方法，用超过我们数倍的力量，依靠天然的险要障碍，企图堵住我们的去路，但是英勇的无坚不摧的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着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我们抢渡大渡河的战斗历程，是又一次很好的验证。

九、“欢迎!”“欢迎!”

——夹金山下一、四方面军会师

正当我红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上克服了王明错误军事路线，在贵州狠狠地打击敌人的时候，我红四方面军正西渡嘉陵江，退出川陕根据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红四方面军当时的领导人张国焘，继续坚持王明“左”倾错误和军阀主义不顾四方面军英勇指战员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伟大胜利，又一次抛弃苏区根据地，欺骗广大指战员，发展他的退却逃跑错误，一直向西逃跑。

我们于五月底飞渡天险大渡河以后，一时摆脱了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大部匪军，四川军阀的“双枪兵”主要扼守重要城市，防堵我军进击四川的中心地带。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师的局面已经形成。我们中间的最大障碍只是邛崃山脉的夹金山，这是我们要征服的第一座大雪山。

我们绕过雅安，在天全附近击溃守敌杨森部六个团，占领了天全、芦山两县，向宝兴前进。从宝兴再往北，直指夹金山。这时路越来越坏，往往渺茫无路，有时走进森林，就只得砍倒树木，开辟途径，时而攀缘上行，时而跳崖直下。遇到泥沟两腿就在泥水中爬行，甚至站立很久，弄得污泥满身。还要通过一条栈道，这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架木，铺上木板而成的“道路”，非常危险难行。



红军长征途中，连续翻过五座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这是夹金山。

夹金山高踞宝兴的西北，海拔四千多公尺，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我们当时还没有跨过雪山的经验，虽然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工农红军，但是也不知道应该作些什么准备，争取安全通过。我先头部队到达雪山的起点碛碛村的时候，为了取得过雪山的知识，组织了几个工作组，深入当地居民中进行访问。据老年居民谈，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要想过山，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老年人还警告大家在山上不准讲话，不准笑，不准坐，若故意讲话、笑、坐，山神就会把你打死。大家对老年人的迷信肚里暗笑，但也想到因为山上空气稀薄寒冷，这几个“不准”可能有道理还是表

示了谢意。

这时正是六月，我们的冬衣已经早在云南就丢下，送给了那里的干人儿，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看来，我们物质上的准备只此而已。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却是非常充足的。领导干部向全体指战员说明了眼前将要遇到的困难，要求争取作到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这时，我们的指战员异口同声地响亮回答的是：

“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量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大家保证：

“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行的抬着走，一定要让每个战友安全地越过夹金山！”

第二天，六月十二日清晨，在宏亮的集合号声中，部队从附近的小村落迅速来到绕碛村前集合，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不时举起来上下挥动。九时许，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溪边的小路，向山麓挺进。白茫茫的大雪山就在面前，半在浮动的白云里。来到山麓，气温突然下降。脚下的路已经冻得很硬。爬上山腰，环顾四周都是白雪，人在积雪中行，上边是雪的陡壁，下边是雪的深渊，银光炫眼，不能久望。先头班在冰雪上凿些窟窿，小心地前进。一个跟着一个，有时手拉着手。

越往上爬，冷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人在云雾中行进。单衣抵不住风雪的侵袭，脸上身上象被千百把尖刀刺着。大家浑身哆嗦，牙齿战栗。空气逐渐稀薄起来。许多人感到呼吸困难，开始头晕腿软，一步一喘，一步一停。但是大家有一个信念，坚定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克服困难，发扬互助

友爱的革命精神，互相搀扶着，不停地前进，并且也认识到这时候停下来是很危险的。

将近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大大小小的雹子迎面打来，打中处立即肿痛，防不胜防。于是大家鼓足干劲往上冲，很快就到了山顶。抬头远望，真是一个洁白无边的世界。大家愉快地吸了一口气，便开始往下走，逐渐冰雪停飞，变成小雨，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不多时回头往上看，一片白茫茫的雪山，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了。

突然，在山下不远处的大村了，发现有人来回走动，身上背着枪，显然是军队。这是什么军队？如果是敌人，为什么不向我们射击？派出侦察员去查明情况，并吹号同他们联络，他们吹号回答了，但不能判断是什么部队。彼此逐渐接近了，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呼声，仿佛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是红军？这时侦察员飞跑回来，边跑边喊：

“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到了！”

山下传来了“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清楚的喊声。顿时，整个先头部队爆发出一片欢呼，一阵又一阵，响彻了山谷，直向雪山汹涌而去。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大雪山——夹金山下，会见了我们日夜盼望的亲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

大家欢呼着蜂拥而下，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紧紧握手，热泪飞进，长时间沉醉在欢乐中。二百多天，行程一万多里，战胜了几十万敌人的堵截追击，克服了无数的高山大河，现在我们中国革命的两大主力红军，终于在这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汇合了，怎能不激动万分，怎能不欢欣若狂！

我们这支先头部队欢呼着涌进了达维村，四方面军的同志

们忙着让房子给大家住，并送给粮食。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亲自来查看我们，指战员互相畅谈，互相慰问。当天晚上，就在达维村的广场上开了会师联欢晚会，大家忘了疲劳，拿出各自的精彩节目，来表达这一伟大会合的无边喜悦。

干部团行进在中央纵队的前头。当上千队前进到距离夹金山麓还有几十里路程的地点时，天下大雨，整个上千队挤在一个大破庙里宿营。这个大庙倒是两层楼房，只是破得厉害，到处漏雨。几百人戴着斗笠，并肩坐在背包上，一个个淋得象落汤鸡，别人斗笠上流下的水，流到脖子上，格外不是滋味。但大家十分疲倦，不顾一切，背靠背进了睡乡。不怕疲倦的炊事班同志们，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还作好了一顿饭，黎明时分让大家吃了个半饱。

天大亮时，雨已经停了，但还是阴天。大家穿着全湿的衣服，向山麓前进。很快望见大雪山上斜划着一条粗黑线，这是前面的队伍在爬山。上千队在山麓休息下来。几条浅水沟缓缓地往下流去，大家用这清洁的流水洗了脸，身上的衣服也逐渐晾干。休息了一会，前面的队伍还在慢慢地往上移动，上千队各单位就抓紧时间，上了一堂政治课，干部们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会议。

上千队决定在山麓露营，大家砍水沟边的一些灌木铺在湿地上，两人合睡一“床”，把一人的军毯当褥子，共盖另一人的军毯，许多人夸奖这比钢丝床还柔软。吃了一顿饱饭后，就在这最新式的钢丝床上睡了美好的一觉。

半夜听号音起来，吃了早饭，就开始爬山。刚到山腰，蓦地下来一阵冰雹，大家忙戴好斗笠，动作迟一点的早在头上挨了几颗“雹弹”。呼吸逐渐困难起来，大家拿出全部力量往上爬。忽然冰雹停了，抬头一望，已经快到山顶，大家往上冲去。山

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在边缘上，有三个牺牲的同志躺在雪中，他们是前面的队伍在爬山时倒下来的，停放在那里等后面的救护队来安葬。大家向牺牲的同志默哀，然后默默地走过去，就开始下山。呼吸虽然还很困难，但是脚不再那样费力了，步子越来越大了，只听见脚下冰雪“嚓…嚓…嚓”的响声，大家好象打了一个胜仗，往下直追，一直跑到一条小溪边，才停下来休息。这时天已大亮，雪山在后面焕发着初现的阳光，大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清澈的溪水洗了脸，才又开始前进。

过到夹金山北面，是藏民居住的地区，风俗习惯同汉族地区不大相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房屋都是平顶的两层楼，四壁用石筑成，房顶都是石板。高达数层的喇嘛庙，悬挂着很长的布幡，随风飘荡。沿路藏族居民，已经被反动派用欺骗与威胁手段，逼得逃窜一空。我们遇到少数藏族居民，他们多不懂汉语，一般穿着破袍子，脚穿短筒靴，象旧剧中武生的打扮。男人身上都佩带一把短剑或短刀。一看就知道是一些穷人。

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在达维召开了盛大的联欢晚会，驻在达维附近的四方面军部队与刚过雪山的一方面军部队都到了会。这是一次两大主力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到会讲了话。“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与鼓掌声，震动了周围的山谷。讲话后，各部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真是载歌载舞、尽情欢乐，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一般都在达维休息一天，然后陆续向懋功（小金）县城集合。这里原驻有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总政治部在天主堂召开了一、四方面军驻懋功城的干部联欢会，并举行了大会餐。晚会上红五军团表演了“烂草鞋”一剧，形容蒋介石数十万大军跟在红军后面，只拾得了无数只烂草鞋，挖

苦反动派军队的无能，表扬红军战士的英勇。这一喜剧，几乎把大家的肚皮笑痛了。

我们在懋功地区集中整顿，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并休息了四天。这里的粮食主要是玉米，我们从南方来的人不习惯，并且因为象大米一样煮着吃，很多人泻肚子。但是我们离开懋功，继续北进，深入藏族地区以后，困难就更多了。藏民受了川军及本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与强迫命令，都躲避起来，根本买不到粮食。因此，青稞麦、玉米、荞麦等，每天不能保证两顿饭，食盐也逐渐断绝了。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停止打土豪，偶尔遇有汉人作生意的，也只经营皮货和布匹的交易，不解决我们的困难。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红军必须战胜一切困难继续北上。当干部团路过两河口时，张闻天与张国焘站在会场的门口，向大家招手，张国焘装出一副微笑的样子，但并不能掩盖他那本来极端阴险的丑恶嘴脸。朱总司令当时一个人向左边的空地走去，和往日相反，表现极不愉快。我们很多人立刻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不很顺利，张国焘可能又在搞什么鬼。

从两河口到卓克基，又翻过了一座大雪山——梦笔山。山高与夹金山差不多，因为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过来并不感到特别困难。但是越深入藏民地区，困难就越大了。沿路遇到反动派的阻挠，他们胁迫藏民坚壁清野，对我们放冷枪，杀害我们掉队的人员。我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反动派威胁群众凭险抵抗。最后他们退入镇外的有七层楼的上司家，仍准备负隅顽抗，红军夜放照明弹，这土司才仓惶逃走

了。

卓克基是一个较大的居民集中地，房屋多用石头筑成，街道也是大石板地，窄而潮湿。镇外散布着一些楼房。土司家是一座大建筑，可住上千人，有七层，最下一层是关牲畜的，上二层楼有一根粗大的木头作“梯子”，可以叫独木梯，每隔大约一尺，便在左右削去一片来踏脚，人能一左一右踏着上二层，但牧畜不能上去。二层三层住一般仆从或士兵，四五层住家属或官吏，六层为仓库，保存各种贵重物品，七层设有经堂，内有佛像、佛经、拜佛用的陈设，非常清洁。据传闻，这个土司曾经在成都上过大学，母亲是个汉人，因此，他家的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汉族的东西，如家中用品很多和我们一样，有汉文字画，藏有很多海味。其他小一些的楼房，大概也是比较富裕的人家，最上层都是经堂，也都比较干净。

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些日子以后，藏民陆续有回来的，有个别的还懂几句汉语。我们经过通司向他们反复解释我们的民族政策，他们逐渐对我们解除了恐怖与疑虑。本来，他们对汉人的仇恨，是有长期的历史与经济的根源的。长期以来，汉族军阀官僚总是压迫与剥削藏族人民，藏族稍有反抗，就遭到武装进攻、大批屠杀。这一带出产金子，以及麝香、大黄等名药。四川军阀常常掠夺藏民的财富，如金矿、药材等。藏民经过红军的政治工作，并亲眼看到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完全两样，知道我们是反对那些压迫剥削他们的人的，他们逐渐和我们亲近，并帮助我们带路，向其他藏民解释等等。这样，我们在卓克基住了较长时期，部队来来往往，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问题。

十、在千里雪山中

干部团在卓克基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开始前进。路过马尔康，有一个大喇嘛寺，大家进去参观了一下，外面的结构规模宏大，大灯笼、大鼓等，陈设堂皇。进到礼堂，大概能容纳数百人，周围悬挂几丈长的黄绸，显得很庄严，但有点阴森的气氛。前台长桌上摆着很多供品，都是黄油制成。喇嘛还没回来，我们的部队好象也没驻扎过。

这一带地形非常险要，周围许多山上都有积雪，又时常下雨，河流错综复杂，遇到森林，古柏苍松遮蔽了天日，部队总是在河流边过采过去，森林密得不知多深，常有敌人从密林中放来冷枪，我时有伤亡，但亦无法搜索。这次干部团整队前进，敌人一枪击中我前队一人，抢救无效，敌人渺无踪迹。

走八十里路到梭磨，走得很疲劳，有的单位深夜才到。梭磨有一座能容纳几千人的大喇嘛庙，总司令部的直属单位驻在里面。周围有一些村子，都不大，许多单位挤在一起。又走了七十里路到马塘，只有几家小商店，平时专门收买附近的药材、羊毛等货物。所以部队的绝大部分都露营，夜间又雨雪纷飞，弄得大家的衣服被毯全部湿透，根本无法睡觉。在马塘休息了一天，把衣服烤干，第二天拂晓出发，翻过高约五十里路的马塘梁子，在山顶饱受风雪，夜间才到马河坝。沿路未见藏民，

房屋也都是空的。在马河坝休息两天之后，进到则格、黑水、芦花等地。总是沿着河流左右迂回前进，遇到雨后的河水暴涨，波涛汹涌，就不能徒涉，只好等到大水退去。汉族军阀与当地反动派曾经给藏民订了严格的“惩治条例”，如帮助红军带路、当通司，或卖给粮食者，均处死刑；不执行坚壁清野，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不同红军作战，亦按“叛逆”治罪。这种反动规定逼得藏民不得不逃避，但是更深入藏族地区，汉族军阀的反动势力就逐渐减弱，藏民也有陆续回家的。

这时已经是七月初，这一带的青稞已经带淡黄色，勉强可以收割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们只好割麦子煮熟吃，同已经回来的藏民研究，按当地的粮价，付给现款，或请他们转给那些尚未回来的藏民。于是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除伤病员外，大家都参加割麦，除各单位自己食用外，还得供应担任勤务的部队。总部考虑到前面粮食更加困难，并命令各单位储粮十天，所以割麦成了当时的紧急任务。

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整队向能够收割的麦地出发，红军指战员一群一群地奔向指定地区，投入割麦的劳动。大家虽然腹内是一个半饱的状态，但都是兴致勃勃，歌声不断地响遍田野。

朱总司令也走过来同战士们一起割麦。他素来爱好劳动，在井冈山时期，他用那条“朱德的扁担”同战士们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食。现在虽然又添了几岁，但是仍不甘示弱，他把麦子割下以后，还从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的模范行动对大家影响极大，有些干部只挑回四、五十斤，对比之下都感到不好意思。当时年纪最老的徐特立同志也来帮

助弄麦子。因为等着下锅，所以有时麦子挑回来之后，大家用双手把麦穗简单地搓几下，就煮着吃。青稞麦不好消化，往往吃进去是麦子，拉出来还是麦子。

周副主席是搓米的能手。还在贵州地区，他就带头用两块瓦片搓谷子，保证了部队有饭吃。他虽然工作很忙，这次也抢着弄麦子，对大家鼓舞很大。

黑水、芦花还算比较有粮食的地区，我们在这一带，除了自给之外，还供应前线部队。如有的团远远伸出，靠近敌区，在雪山上粮尽，挨饿受冻，已至山穷水尽，急电求援，就必须组织力量，冒着风雨赶运粮食去。军委在芦花城设了一个筹粮委员会，担任筹集六十万斤粮食的任务。为此，组织了人力，在几个出产粮食的地区，分头筹粮。

由芦花城沿黑水东下，经过三天路程，到达瓦布梁子。这是一条很高的山岭，周围有十多个村庄，共有藏民数百户，是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的地区，出产大麦、小麦、荞麦、洋芋、萝卜、猪、牛、羊等，并产盐。这里离汉人居住的地区较近，懂汉语的人颇多。四方面军一部曾经过这里进入芦花，当时藏民都逃避一空，后来找到了曾到过成都的通司，由于他们努力宣传，藏民回来了一部分。这次筹粮委员会的工作队，更使用大力作了争取藏民群众的工作。出了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地插了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侵犯，对回家的藏民每户发了保护证。工作队还派人到各村去召开藏民群众会，经过通司翻译给藏民听，详细宣传红军的主张。藏民回来的更多了，对我们的态度更好了，不但不怕我们，而且喜欢和工作队接近，常找工作队谈话，问这问那，毫无拘束。他们已经晓得共产党、红军对他们很好，愿意帮助我们作事。我们一两个工作人员，

在这地区来来往往，也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我们在藏民中的影响已经扩大，我们和藏民的关系已经改善，我们就广泛地宣传，号召藏民起来反对汉官、军阀的压迫，组织藏民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这一次宣传得到广大藏民的拥护，我们就开始召开各地藏民大会，成立藏族人民政府，在这一地区前后组织了六个乡的藏族人民政府，都是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了代表及主席。这些代表和主席当选后，都感到很荣耀，努力作好各种工作，很积极帮助红军。最后工作队召集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于是瓦布梁子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

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在瓦布梁子筹集了不少的粮食。一方面，我们发动藏民割那些群众痛恨的恶霸的麦子，由群众与红军各分一半，另方面，向那些豪富大户借粮。约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计划。除了筹粮外，我们还在这里分三个地区熬盐，每天能出点盐，也解决了部队的一些困难。

这许多粮食，我们组织了藏民运粮队，运到芦花，或其他需要的地方。参加运粮队的藏民都很积极，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吃。我们离开瓦布梁子时，把旧区乡衙门的粮食发给了藏民群众，许多藏民从远道来背粮食，群众都不愿意我们离开，依依不舍。我们从黑水、芦花一带陆续向仓德、打鼓地区移动，行程约一百数十里，要爬过仓德梁子这座大雪山。这个雪山在这一带大概是最高的山，由山下至山顶约六十多里。我们选了比较好的天气，没有下雪，也没有大风，但空气还是很稀薄，个别同志牺牲了。由于近来给养困难，大家总感到腿软无力，前进十分艰难，但大家都是互相搀扶，互相鼓励，这座大雪山终于被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克服了。

打鼓分上、中、下打鼓三个村子，约有百数十家，藏民都被反动派胁迫逃走了。由于地势较高，麦子还未成熟，田野还是一片青绿色。从此我们主要靠吃豌豆尖、野菜等过日子。各单位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这里豌豆种得多，就把叶子当粮食吃。炊事班在一大锅豌豆尖里面，按每人每天三两青稞麦的比例，抓几把青稞麦子放进去。有时我们打一桶“饭”回来，尽是青菜，若想弄到几粒麦子，要象河里捞鱼那样，费力大而收效少。大家肚子里经常叽哩咕噜，一人开始，大家就共鸣起来。

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过去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离开打鼓，向沙窝移动，路程约一百里。出了村子，就看见路边有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上午九时后，不准前进！”大家就知道前面还有大雪山，中间没有人烟，出发太迟，当天不能到达。但是大家经过了许多高山，对雪山也司空见惯了。虽然感到身体瘦弱了一些，意气仍不减当初，一个个奋勇前进。走到距山顶还有二十里的地方，人家的呼吸开始短促起来了，脚步也不知不觉地缓慢下来了。但是越发鼓起劲来，逐渐爬上了山顶。大家已经藐视了“山神”，在山顶上环顾四周，洋洋自得。干部团的陈赓、萧劲光等同志大赏雪景。有人提议吃雪，从雪层中扒出一碗，问谁有糖精，就有人拿出一小纸包好糖精来共享，许多人就大吃起来。也有人反对，说：“你们不要看它外表洁白，上它的当，若把它煮开，本来是又黑又脏的污水

呀!”大家还是你一缸，我一碗地吃着，有人甚至夸奖它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冰淇淋还美，别的人批评他替冠生园作义务宣传，争论起来。最后有人说，等我们解放了上海再作结论吧。

几天后从沙窝又移驻到毛儿盖。

十一、毛 儿 盖

我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七月十号到了毛儿盖，这是四川省松潘县西面的藏民地区，白军胡宗南派有一个营在这里防守，因为它不接受红军一致抗日的要求，并向红军进攻，被我军全部缴械。毛儿盖有三四百户人家，比较富庶，是这一带的粮仓。据传说，一年收获，足够三年给养。这时青稞麦已经黄熟，为了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只好开始割麦子。当地藏民原来已被反动派威胁逃跑，不久，附近地区回来了一些藏民，并有了通司，我们把所割的麦子的代价给了他们。我们的许多单位都在这里驻扎过一段时间，最长的将近一个月，是我们从江西出发以来休整最长的一次。

日本强盗自从“九一八”侵占我东北三省，制造伪“满洲国”以来，不断向我华北入侵，妄图再在华北弄一个傀儡国，实现它吞并华北五省的野心。它甚至发表狂妄声明，公开叫嚷它是中国的“保护者”，提出日本将以武力保持对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独占，反对其他国家插手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疯狂到这个地步，公开声明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

而蒋介石反动政府却总是退让再退让，并和伪“满洲国”订立各种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对日本强盗在华北的挑衅，蒋介石反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国民党反动政府甚至无耻地声明它并无抗拒日本任何举动的意图。一九三五年二

月，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要“制裁一时冲动的反日行为”。过了几天，他又发表谈话，说什么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这一切表明了蒋介石对日继续妥协。

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的利益，对日本强盗的每一侵略行动作出了有力的反击。早在“九一八”后不久，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就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并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一九三三年发布宣言，号召在三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接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组织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给了日寇严重的打击，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开展了民族武装自卫运动。

伟大的中国人民对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无比广大的怒潮。东北爱国人民组织了东北义勇军，直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全国的工人、青年学生与商人，用各种方式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斗争。上海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持驻上海的十九路军的抗日作战，在一个多月期间，使日寇死伤万余，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凶焰。随着日本强盗侵略的加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正在向前发展着。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打算改弦易辙。从我军渡过大渡河之后，蒋军数十万人紧紧尾追，四川军阀的军队从东策应，蒋军胡宗南扼守着松潘一带，防堵我军深入四川内地。藏族反动分子也常常骚扰我们，我军的一支分队在行进中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因过去没有打骑兵的经验，受到了一些损失。总政治部根据这一事件，编了一首《打骑兵歌》，在部队中普遍进行教

育。主要是：

敌人的骑兵不须怕，
坚决沉着来打它，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快放瞄准它，
我们打垮它！
我们消灭它！

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一直向中央闹独立性。他在会师前，就已经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他阳奉阴违，抵制会议的决定。于是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反对南下逃跑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关于目前形势，“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中国革命在许多地区继续发展，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胜利会合，证明中国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国民党反动派更进一步地出卖中国，向着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农革命进攻。他们疯狂地围攻各个革命根据地与红军，追击，截击与堵击红军，企图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他们的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是：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战胜我们，消灭我们。

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已经削弱，敌军远离它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在向我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

且在质量上也增加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而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这更造成中国革命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与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根据地。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加了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中央政治局六月十八日曾经正确地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决议”指出，川陕甘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对日作战的后方，而且它的存在，足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红军的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彻底的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坚持执行其他各项党的基本政策。

“决议”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的威信。个别同志因为看到中央

根据地已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就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这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区粉碎，致使红军退出中央区，受到部分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从纠正这一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地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了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围歼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遭受到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这十个月中，不但在数量上极大的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也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的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左”或过右的估计。

“决议”要求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互相学习，指出，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

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自馁。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决议”专门谈到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指出这就是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并应实际上帮助他们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其本民族内部反动派的斗争。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民族的政权可以采取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决议”认为目前建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为时过早的。

“决议”规定目前的中心工作十二条，主要是加强政治工作，整顿部队，提高自觉的纪律，加紧基本的阶级教育，迅速转变番民中的工作，有计划地开始广大白区的工作，开始白军中士兵的工作，吸收四方面军中党的最好的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他军事政治机关的负责工作等。

“决议”最后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这种动摇具体地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示怀疑，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表现在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甚至根本怀疑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

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谁想到中国革命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地在部队中存在着”，“是最大的危险”。必须向每一个红色指战员细心解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胜利的前途。在反右倾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对“左”倾空谈的警惕，这具体的表现在对于目前的形势作过“左”的估计，来代替敌我力量的正确分析。

这次政治局会议，对中国革命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正确地分析了客观形势；严肃地进行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危害性；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今后任务与行动方针，大大提高了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的决心与信心，指引我们向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坚决前进。

十二、分裂主义者罪恶重重

从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脚下会师以来，张国焘发展了他的军阀主义，把四方面军看作他个人的实力，夸耀他手里人数较多，衣服齐整，完全不看一方面军长途跋涉，战胜敌人的追击包围，克服各种自然障碍的伟大成就，不看一方面军的许多优点，只看一方面军的大量减员，只看一方面军的衣服破烂，就想利用全党和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乘机威胁中央，阴谋篡党、篡军、夺取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的领导权力。因此，他放肆地攻击遵义会议以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放肆地责备中央，目无中央，要中央按照他的意图办事，由他篡党夺权，实行退却逃跑主义。在两河口会议上，他玩弄政客手腕，对中央的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在毛儿盖会议上，在大多数同志的解释与批评下，在中央的耐心教育下，他也同意了会议的“决议”，但不是真心诚意的。

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极多，造成了许多罪恶。

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坚决反对党与当时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加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

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他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

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的前夕，他身为起义的前委委员，

突然反对起义,认为是盲动,说什么要看国民党左派是否赞成。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和他斗争了一天,因而起义不得不推迟一天举行,而就在这一天中有人告了密,又临时提前两小时举行,这个有重大意义的起义才得以胜利实现。

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党给他学习机会,要他改正错误。但他并未改正错误,他几次写检讨书,承认自己错误,安全是假的。

一九三一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作领导工作,他竭力贯彻王明“左”倾错误,以个人野心为出发点,耍各种官僚政客手段,打击干部,排除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中,他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强迫四方面军与敌人硬拼,在受到损失后就仓惶逃跑。他在红安县的河口镇召开干部会,讨论行动方针时,坐在高处,眯着眼睛,身子摇摇晃晃,发誓不离开鄂豫皖苏区,要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苏区。但是他很快就带着主力跨过京汉路,向西扬长而去,掉队的伤病员由平汉路西面东回时,才知道也已远离解放区;当掉队的伤病员从陕西回来时,才知道他已经进入陕西;最后中央才通知鄂豫皖省委,他已经拉着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四川,叫省委不要指望他回鄂豫皖了。

他从来不尊重中央。他欺骗中央,经常报喜不报忧,并谎报成绩。肃反采取逼供信方式,成批的干部与群众被关进保卫局。他强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员,为他侦察干部的言行。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以后杳无消息。无数好同志被他不声不响地暗害了。

对伤病员尤为残忍,他有时为了自己逃跑,置伤病员于不

顾，甚至把他们锁在院子里，任凭野兽般的敌人去屠杀。

当我一方面军已进到贵州北部，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时候，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曾电令当时在四川东北“通南巴”（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西南方向发展，争取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牵制四川敌军，以便一方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进入川西。但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反而向北转入陕西省南部，使四川敌人无后顾之忧，全力阻挠我一方面军渡江的作战计划，致使我们不得不作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转到金沙江渡江北上。

张国焘遇到敌人的大举进攻，仓惶西渡嘉陵江，在夹金山下与我一方面军会合，当时两大主力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中央曾于六月间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利用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未集中、碉堡线未完成的时机，准备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但张国焘害怕同胡宗南作战，拒不执行计划，致使整个红军不得不走草地北上。

他在真理面前，开始是造谣污蔑，到了理屈词穷，才表面接受，暗中搞阴谋诡计。在上次的两河口会议，这次的毛儿盖会议上，他都使用了他的惯伎，敷衍了一个时期。这两次会议都明确决定了北进的方针，张国焘采取拖延的办法，使这个唯一正确的方针不能按计划实行。

毛泽东同志当时曾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出乎敌人意料，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进的决定。中央为此对他进行了十分耐心的教育与尖锐的批评，但他仍坚持错误，死不悔改。在他看来，他人多枪多，力量大，是中央应该听他的话，而不

是他应该听中央的话，就是说，党应该服从枪杆子，而不是枪杆子服从党。

根据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定，全部一、四方面军，从分散在纵横一千五百里的驻地（从丹巴、绥靖到松潘附近），向毛儿盖与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左路军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以卓克基为中心集中。两路都准备经过草地北进。

当时敌人的活动日趋紧张。尾追我军的川军刘文辉部已占据懋功（小金），并向抚边前进；蒋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胡宗南集结了四个师的兵力，位置于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等地，川军刘湘部已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敌人的企图是阻上我军东出四川，北上甘陕，把我军逼往西面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使我军得不到发展，逐渐消灭我们。

敌情已经逐渐严重，而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决定，故意拖延行动，使我们整天挨饿受冻，药品又非常缺乏，一病即无法医治，队伍一天天减员。张国焘简直是要把我们困死在雪山草地中。指战员的体力进一步衰弱，有时徒涉一处水深不过两尺的小河沟，就有人被激流冲倒，被流水淹没。

中央限令各部队准备迅速北上，要求每人准备十斤到十五斤干粮，以便通过草地。各单位立即掀起了一个炒干粮的运动。到处不分昼夜的炒麦子。到处利用直径约一尺多大小的石磨，把青稞磨成面粉，石磨不停地转动。这一带小河很多，有一些水磨，各单位昼夜不停地守着水磨转。

尽管困难重重，但战胜过无数高山大河的红色英雄们，是任何困难所压不倒的。他们到处找野菜充饥，凡是可以饱肚子的都拿来当“饭”吃。有的同志在毛儿盖河边钓鱼，也增加了营养。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活动着，充分表现出革命战士的乐观主义精神。

中央等待张国焘觉悟，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最后八月下旬中央命令左右两路军同时过草地北上，右路军从毛儿盖经草地到达班佑，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阿坝，向东到班佑会合。于是我们开始了向草地进军。

十三、过 草 地

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是草地。右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出发，他们带有藏民向导，但这些向导也不是很熟悉草地的。这里阴雨天多，太阳不常见面，不能靠它来辨别方向，我们主要地还是靠了指北针走路。刚走进草地时，右边还有山坡，斜坡上有几条平行的浅沟，可以想见平时牛羊成几路纵队并行前进的景象。更远望可以看见岷山山脉蜿蜒层叠，直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进入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行程600余里。

接苍空。

第一天走路不多，可以说是在草地的边缘，宿营地还能找到一些树木，被雨淋湿的上衣与在水草中行进时被溅湿的裤腿，还可以用柴火烤干。每人带有一根短棍，结合这些树木，搭起帐篷来也很牢靠。更为宝贵的是，总可以找到一些干柴或小的树枝，来烧开水，甚至煮饭，这样可以不要硬吞炒麦或面粉。草地的地面总是湿的，但是有树木的地方，一般地势较高，还可以找到比较干的地方睡觉。

第二天天刚亮，大多数单位都还煮了麦子饭吃。我们已经完全深入了草地，环顾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青草，草多是浸在水中，浸水的地方成长满青草的小陆地或小斜坡。几乎看不见树林，人烟更不用提了。我们总是一个紧跟一个地小心地踏着有青草的地方走去，有些地方没长青草，多是泥潭，往往是无底洞。“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骡马，有时只顾吃草，脱离队伍，竟掉进泥潭，忙乱地想爬起来，结果越陷越深，人也无法搭救，很快就完全没顶。可恶的泥潭却又若无其事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草地天常阴暗，不定什么时候忽然来一阵雨，风吹雨打，世界就剩下了眼前一片。雨过天也不晴，太阳不知道躲在哪里。大家总是埋头走路，但这样的路走不多远，天也就黑了。先头部队选了适宜的地方搭了一些棚子，有些还能利用，或稍加修理还能蔽风雨，有些里面还躺着病号，等待恢复体力再前进。许多单位已经只能够烧点开水吃干粮，然后就躺在油布上睡觉，用热水洗脚早已没人指望了。

经过了两天的草地生活，好象一切都已经习惯了。无非是走路“嚓…嚓…”的响声，无非是一阵雨来，叫你湿上加湿，无

非是湿地上露营，无非是冻醒过来冷战一阵等等，如此而已。草地上有很多条不知何去何来的小河，大家互相搀扶着渡过去，有的被流水冲倒了，立刻被拉起来。饿了就抓一把炒麦或面粉往嘴里送，几乎每一个人嘴边满是白胡子。第三天早晨淋了一阵大雨后，走了十多里路，草地上先头部队树立了一个木牌，写着“分水岭”三个大字。这里地势较高，站在这里，真可以说是“眼中无物”。傍晚到了一条河沟边，有些矮树，大家尽量把棚子搭好一些，煮了麦面疙瘩吃，肚子美美地享受了一顿饱餐。夜里没下雨，还见到了几颗疏星，算是过草地的良宵美景。

第四天黎明起来，发现了一个病重的同志已经停止了呼吸。大家非常悲痛，有的同志发出声音来：“同志，你已经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尽了最后的力量！”旁边的马上接着：“不要紧，你的任务我们来完成！”“我们一定为中国的独立、解放流最后一滴血！”大家默默地从牺牲了的同志的身边走过，又走上了极目青青的草原。天空不见飞鸟，地下不闻虫声。蒋介石靠了美国换来的飞机也不来探望我们了。据说昨夜有一股藏族反动派的骑兵来袭击我们，经我们开枪射击，就抱头鼠窜了。下午到色箕坝，这是三岔路口，右边通松潘，左边到班佑。这里有很多树棚，是走在前面的部队搭的，有些经过数次加工，用树叶盖得又结实，又稠密，后续部队省了很多力气。大家在蒙蒙细雨中烧开水，冲炒麦粉吃。夜间倒是晴朗，但是风很大，非常冷。

草地已经过了一半多，大家当初的疑惧不安的心情完全没有了。第五天天气又很坏，一阵雨，一阵风，但是大家想起快要到班佑，就可以结束这样的生活，一个个精神振奋，双脚好

象增添了新的力量。早晨因为炊事班感到柴火不够，不能煮麦米饭，还是各班自己烧点开水吃炒面粉，或者啃炒麦子。糟糕的是，每人背的炒熟了的青稞麦粉或麦粒，几天来被雨淋湿，炒面粉成了疙瘩，只好用开水或凉水冲成糊糊来吃，炒麦米更不好办，有点象橡皮胶，吃起来很费劲如果走路时跌了一交，把干粮袋掉到脏水里，就没法再吃，只好由大家另行分给一些。很多人找各种可以吃的野菜煮着吃，有的把自己的皮带也煮熟吃了。这一天老是下雨，越下越大。傍晚，找到有树棚的地方，就把油布和早已破旧的斗笠加在上面，作为一夜的“安身之地”。

自从我们进入草地以来，每天总有一些同志不能赶到宿营地，他们都是由于饥寒疾病，在某个地方倒下了。所有的牲口主要用来运了病号，担架队每天劳累不堪，都不解决病号的问题。第六天一天，许多同志在出发时就已经很艰难地跨步，纵有人随行帮助，天黑时有些人终于没有跟上来。大家对他们非常悼念，革命的壮志未酬，竟被疾病折磨而死。这一天的行军显得更加吃力，天气老是那样阴沉，不时下雨。远处发现藏族反动派的骑兵在行进，但他们怕我火力，不敢靠近我们，见已经被我们发现，就仓惶逃窜了。大家想到草地的行军快结束了，对周围的景象倒愿意详细地观察一番，以便留作将来的纪念。想着想着，也就到了宿营地。

草地行军的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天气倒不坏，不仅没下雨，天空好象明亮一些。一早出发，走不多久，右边远处显出了隐约的山峰，渐渐又望见了雄伟的岷山山脉，终于又走上了漫长的山坡。前面传来了捷报，胡宗南在班佑堵截我们的部队已被我先头部队解决，并说巴西和阿西有很多的房子可以

宿营，同时麦子已经成熟可以补充粮食。听了这些好消息，大家欢呼起来。本来疲惫不堪的身体，顿时精神抖擞，脚步忽然加快了。但是山坡上的狭长的浅沟，使你高一脚，低一脚，很不好走。往前看总望不见村落，又走了约三十里路，还是一望无边。忽然在右前方山坡下冒起几缕青烟，但是仍然看不到房屋。逐渐接近那冒烟的地方，先看到几堆什么东西，有点象内地的稻草堆，但又不是稻草。正疑惑间，前面的人说，这就是班佑。仔细观望，确实有几十座象蒙古包式的矮房子。决定在这里宿营，大家很高兴，纷纷往矮房子里面参观，却又不象住人的地方，没有任何家具，除几堆牛屎外，一无所有。大家叫它“牛屎房”，墙是牛屎筑成的，但并不臭。晚上外面下着大雨，大家在“牛屎房”里面，烧着牛屎，围拢来烤干衣服，有的背靠背地睡着了，一片热气腾腾，鼾声呼应，似乎高楼大厦未必更好些。

我军已经进驻巴西、阿西一带。胡宗南在巴西附近的高山上筑有碉堡群，但守敌均已逃跑。胡部防守着松潘、漳腊、包座一线，企图阻止我军东出四川与继续北进。巴西离包座一百二十里，房屋全是木造，有一所宏大的喇嘛庙，内部用红漆粉饰，雕刻贴上金箔，正中坐着一个数丈高的大佛像，其他小佛像无数。这里的藏民也已经受到了反动宣传，全部逃跑。但麦子已经成熟，还有萝卜、胡豆，我们的生活算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还在右路军进入草地之前，在毛儿盖，毛泽东同志即已经命令三十军占领包座，打破胡宗南军的堵截计划。三十军的领导同志，由徐向前同志引进，向毛泽东同志作了请示。毛泽东同志同这些同志一一握手之后，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各种情况，

如各团、连有多少人，掉队的多少，战士们的情绪高不高，部队生活怎样，休息了几天，是否恢复了疲劳，粮食困难是否克服了，打仗准备了给养没有，等等。然后毛泽东同志把手里拿着的北上路线略图铺在地上，就他们将要执行的战斗任务作了重要指示，并谈到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指出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

三十军的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给予的任务与指示后，就立即着手组织攻打包座的战役。全军怀着必胜的信心跨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五天之后，就迎击着从包座出来的敌人，把它打得抱头鼠窜，乘势包围了包座。这里的敌人是胡宗南的一个旅，旅部住在大喇嘛寺内，紧靠着一座五六百公尺高的大山，控制了制高点。前面有一条小河，只有两丈宽，但正值雨季，河水深而湍急，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在外面，敌人建立了六个碉堡，向我军射击。

军领导根据侦察组的报告与俘虏的口供，绘制了包座守敌情况与增援部队路线图，并亲自去查看地形，乘月夜摸到包座前面，又勘察了敌增援部队的来路。敌人的增援部队是四十九师，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兵力约一万二千多人。而我们三十军不是全部，当时兵力比敌人少，装备也差，要歼灭这股装备比较优良的敌人，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我三十军除用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外，主力则布置在敌援军必经之路的东西两侧山上。据俘虏口供，敌增援部队预定下午到达，但拖到次日中午，才从松潘通包座的道路大摇大摆地走来。敌人十分狡猾，先用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我军领导命令山上的主力部队隐蔽好，只以正面一个团，在一些次要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人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

诱敌大胆深入。

敌主力进入我埋伏圈后，我军居高临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把敌人拦腰截成了三段，战士们用手榴弹、刺刀，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七、八个小时，我军终于把斩成三段的敌人一段段地啃掉了。敌师长伍诚仁重伤后跳河自杀了，大量敌军官兵作了俘虏。围攻包座的我军，也向喇嘛寺的敌人发动了猛攻。夜间，除少数乘大雾逃跑外，全部就歼。我军完成了占领包座的任务，为继续北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政治部派了一批干部作俘虏工作，征求他们的意见，宣布：“愿当红军的站到左边，愿回家的站到右边，依各人家乡的远近发给路费。”结果，愿当红军的占十分之七，愿回家的占十分之二。俘虏中有的原来在十九路军同日本人打过仗，有的对红军有些认识，许多人从武汉出发时，受欺骗说是开去打日本。俘虏兵一致痛骂反动官长压迫士兵、污蔑红军，并大量揭发了军阀军队的腐败与黑暗的情况。

十四、坚决北上

右路军在巴西、阿西一带休息整理，补充粮秣，进一步作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这几天吃得饱一些，脏衣服洗干净了，头发也剃光了，面目焕然一新，精神十分饱满。每人炒好了几斤麦子作干粮，打了草鞋，作好了充分的出发准备。

左路军同时到达了上、中、下阿坝一带。但张国焘迟迟不到巴西一带来会合。等了他将近十天，他仍呆在阿坝。这地区处在四川及甘肃的边界，停留太久，会引起甘肃敌人的警惕，增加我北上的困难。因此，中央几次电令张国焘实行预定计划。但是张国焘这时凶相毕露，不仅不服从中央命令，反而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并电令陈昌浩“停止北上，即日南下”，这是强迫命令在右路军的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这份电报为叶剑英同志所得，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叶剑英同志这一果敢的行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同志，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发现张国焘的阴谋后，立即于夜半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地带，并命令右路军即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先行北上，令左路军随先遣支队向甘肃前进。

部队陆续从阿西出发。红军大学当天上午就离开房屋，在路边休息，准备出发。但直到下午还在等候命令。已经不早了，忽然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走来，怒容满面，一边走着，一边

高喊：“走！”大家立刻背上背包，往周副主席走的方向行进。当天连夜走了约八十里路，翻了两个二、三十里路的大山，才在一个小村子宿营。据说，先头部队过卡冈寺时，敌人从碉堡内向我射击，并有敌机来轰炸，但我迅速果敢地前进，通过了这一段地带。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当红军大学正在一个小山坡上行进时，忽然从后面赶来三个骑兵通讯员，一面跑着，一面高喊：

“前面停止前进！没有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

一时大家停了下来，弄得莫明其妙。原干部团的学员怒不可遏，有的高声大叫：

“你陈昌浩算什么东西？中央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红军大学的秘书长，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黄超举臂高叫：

“停止前进！”

但大多数学员高呼：

“我们前进！”

同志们高呼：

“跟着毛主席没有错！”

红军大学又继续前进了。但当天夜里宿营后，四方面军的学员被黄超叫出，按来路往南走了。很快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四军与三十军也被张国焘调去，重经草地南下了。同时张国焘把左路军全部从阿坝调向后转，又过草地，向大雪山地区撤退了。大家义愤填膺，一致痛骂张国焘。

“张国焘！你等着瞧，看你往哪里去？”

“张国焘！你分裂红军，决没有好下场！”

这时右路军虽然只剩下约八千多人，可是大家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部队沿包座河上游行进，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急湍奔腾的包座河，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就只好攀着悬崖，淌着急流前进，有些同志因失手坠入河中而牺牲了。队伍直到半夜才陆续到达俄界。

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北上先遣支队的任务与到达甘南后的方针，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深入的动员，坚固地团结部队，爱惜干部，在战略战术上加倍小心，行动要迅速敏捷，来迎接左路军继续北上。扩大会议一致地同意了中央的决定。会议后向全军宣布和解释了中央的决定，并改变了战斗部署。

部队在俄界休息了几天，以便恢复疲劳，烤干衣服。接着沿白龙河右岸向麻牙寺前进。俄界到麻牙寺行程一百二十多里，但是要过几处栈道。这是古时秦国与蜀国边境的交通要道，费了许多人力才打通的，危险异常。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曾写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猴欲度愁攀援。”反动分子已经胁迫藏民在某些段落把上面铺的许多木板去掉，甚至把一些钉进石孔的木桩拔去。这使得我们很难走过，必须停下来修理。但是木料从何得来？于是部队就地停下，把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向后传达，要后面在有木料的地方砍伐树木，然后一根一根地把木料向前传送。这时队伍是一路纵队，拖至几十里长，传达一项口头命令往往要费数小时，有时还要传两三遍才发生效果；至于传递木材，因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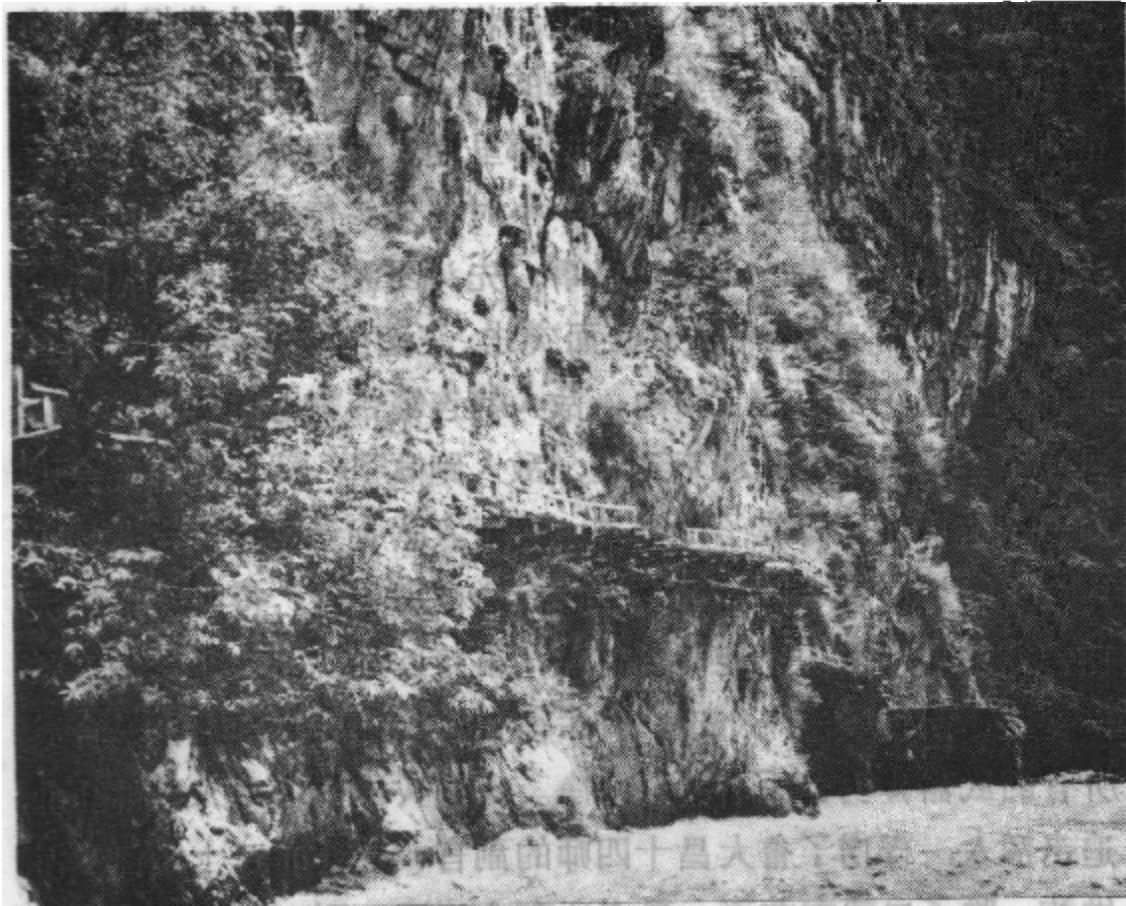
很窄，困难更多。除这些困难外，反动分子还从河对面的山林里放冷枪，从栈道上的山头上滚下石块，使我们随时有伤亡的危险。

白龙河的上游水流湍急，涛声如雷，两岸多是悬崖峭壁，河宽一般虽仅数丈，栈道往往离开水面一二丈高，若俯视河面，不由得大吃一惊。栈道遭到破坏的地方，通过时摇动，更使人不能不加倍小心。

从俄界出发的这一天，总共走了不到五十里路，一整天只是吃了点炒麦子，喝了点冷水，就在途中露宿过夜。第二天清晨继续向麻牙寺前进。还是狭窄的小路，危险的栈道，不同的是多了四座横跨白龙河上的约二、三丈长的独木桥，还没有全部被敌人破坏。反动分子没有破坏掉全部栈道与桥梁，可能是害怕红军长期停留在他们管辖的地区，不得不让红军通过，但是又破坏一部分，使红军不能鱼贯行进，便于他们杀害我掉队人员，收缴一点枪支。离麻牙寺约十五里路的地方，反动分子在白龙河对岸的山上向我行进中的队伍射击，造成了一些伤亡，使我们直到夜十一点才陆续到达麻牙寺。

麻牙寺是一座很大的喇嘛寺，据说有喇嘛匹五百人，若驻军队，可容纳六、七千人以上。寺内陈设比较清洁，每座喇嘛宿舍门前都有一个小花园，种植各种红白菊花、牵牛、葡萄等。这时正值菊花盛开的时候，芬芳扑鼻。为了恢复疲劳和收容掉队人员，除一军团的一部前往攻占腊子口外，其余全部在麻牙寺休息一天。

一军团的前卫师，带着以两天行程夺取天险腊子口的任务，于九月十四日半夜开始行动。没走几里，就靠河右岸的崖下摸索前进，栈道较短，但通往左岸的独木桥残破不堪，桥身摆动，



红军为突破天险腊子口，通过险峻的栈道。

只能一个一个地通过。大家互相照顾着，渡过难关，再沿着白龙河左岸上行约十里，就离开白龙河向东北走，进入了深山老林，走了约三十里路，又爬过了一个四十里的高山。当到达山顶时，忽然从西面飘来了一片黑云，把太阳掩盖了，不到三分钟，就降下了一阵冰雹和大雪，好象无数的珍珠急落和白花飞舞。大家正欣赏这白茫茫的世界，不料袭来了一阵狂风暴雨，推着大家跑步下山。等到下完了山，又走了一段路，天已经黑了，已经走了一百二十里了。

到宿营地休息了半夜，十六日晨两点，前卫师继续向腊子

口进发。天继续下着小雨，每人戴着斗笠，拿着拐杖，在稠密的老林中，沿着泥泞的小道前进。将近八点，先头营报告：“前面没有路了，周围是密林，带来的一个六十多岁的向导，十年前到过这里一次，现在不知道往哪里走。”于是靠着指北针，对着北面的大隘口走去。前进约一小时，先头传来情报：左前方发现敌人约一个营，正在筑工事。先头团派一个营从侧翼迂回到敌人的后路，以两个连从正面突击。正面的部队接近了敌人，手榴弹打进了敌人的工事内，敌人就连嚷带跑地惨败下去了。可惜迂回敌后的部队还未到达，敌人跑散了一部分。

前卫师继续向腊子口挺进。我便衣队捉到敌探三名，审问结果，据说有敌一个营在黑朵前面右侧埋伏着。得到这一情报后，先头团即以一个连伪装前进，很接近了，敌人还不明白究竟是什么部队。我一个连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满地乱跑，把所有的武器弹药都丢得干干净净。我先头团打垮敌人后，紧紧追击敌人，俘虏了鲁大昌十四师的副官、医生等二十多名。据供称，腊子口就在前面，最多还有十五里。到下午四点钟，我先头营已经在腊子口附近打响了，枪声越打越密，先头团的指战员们，越走越有劲。

腊子口确是天险，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一条小河，是白龙江的主源，水深流急。河上横架一座小木桥，要进入腊子口，势必通过这桥，再无别路。敌人在木桥和山口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并筑有碉堡，桥的西头通山口，是纵深阵地，桥东头也在山坡上筑有一些碉堡。腊子口右边山半腰还有一连敌兵。此外，敌人在山上还有纵深配备。

黄昏时分，团营连干部实地侦察地形，决定一个连从正面过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两个连沿右岸的石山上迂回到

敌人侧后猛袭敌人。从正面进攻的第六连，入夜就向敌人发起猛攻，但接连几次都不能接近桥头，夜半奉上级命令暂时撤下来休息，重新组织进攻。经过党团员大会讨论，决定组织突击队，分两路夺取木桥。深夜，一路顺河岸的崖壁前进，准备摸到桥下，攀着桥柱运动到彼岸，从那边向桥上的敌人进攻。另一路先运动到桥边，等第一路打响，两边夹击，消灭桥上的敌人，夺取木桥。但是摸到桥下的一路，不幸有一个同志掉下河里，因而被敌人发觉，朝桥下乱打起来。幸亏连长趁敌人只顾朝桥下射击的机会，带领部分战士冲到桥边，一批批手榴弹打得敌人乱作一团。桥下的同志也翻上桥面，拔出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我们一个个如生龙活虎，不一会工夫，敌人就支持不住了。

这时在敌人的后面，升起了我一、二连向敌人发动袭击的信号弹。原来，一、二连接受了迂回敌右侧的任务，因水深不能徒涉，为保证迂回部队不打湿衣服，集中了十多头牲口，由饲养员牵着，把部队驮过河。然后，一个会爬崖的先爬上去，再把其余的人用绑带吊上，这样一层又一层地往上攀登。然后，部队迂回到敌军右侧山上的据点，进行急袭，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得狼狈败逃。桥头的敌人听到自己的后面打响了，纷纷溃退，我第六连乘势猛攻，杀进了天险腊子口。我先头团猛追溃败的敌人，杀得敌人争先恐后地向岷县县城逃跑。我军追了九十里路，敌人刚想在大草滩休息，我追击部队已经赶到，打得敌人东奔西逃，死伤满地。我军又占领了大草滩。

我后续部队从麻牙寺出发，到达对岸的瓦藏寺仅五十里，但是通过那独木桥费了大半天，夜半才全部过完。第二天由瓦藏寺出发，走了约一百里，到了一个小村庄“格法”。第三天中

途遇雨，在一个大山的深林里，天如黑夜，又没有道路，只是一个跟着一个前进。挑电台与伙食担子的同志们接连跌交，连队与连队之间常常失掉联络。到处有迷失方向的人，这里喊“上兵营在哪里？”那里叫“炮兵团在哪里？”“无线电队在哪里？”号音也吹个不停。司令部眼看无法行进了，命令各单位就地停止行进。大家就地找根树木靠着坐下，等待天亮。拂晓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单位的人原来近在咫尺，不觉彼此大笑起来。

大家又背起背包，向腊子口前进，走了约三十里，才到达一个小村庄，司令部命令休息半小时烧开水。正休息间，前方传来了捷报，腊子口已经占领，我军正追击逃敌。部队立即开始继续前进，战士们连开水也顾不得喝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重整了自己的行装，按着原来的行军顺序，连走带跑地行进。大约走了五十多里，腊子口已经在望。一场激战的残迹，从距离腊子口五六里路的地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带路边的树木，每株不是枪伤，就是被炸弹炸得断枝落叶，原来满地的绿草全被踩烂无余，在桥头五十公尺以内的崖路上，炸裂的弹片和未炸开的手榴弹铺了一层，有的地方竟积累成堆。

走出了约三十公尺的腊子口的隘口，又前进了十里，就在一个河坝的树林里宿营。因那里有鲁大昌部驻扎时留下的一些柴火，各部都烧了开水喝，并把昨晚淋湿的衣服、被毯都烤干了。大家正很高兴，但半夜又下起雨来，刚烤干的东西又被淋湿。大家因为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兴奋异常，热烈希望早些看到甘南地区。天尚未破晓，每人都把自己的背包捆好了，等待出发，吃了已经剩下不多的炒青稞粉，就各自集合起来了。

队伍正背着腊子口，浩浩荡荡地行进的时候，先遣部队又传来了捷报，已经占领了岷县南边的哈达铺，鲁大昌残部退守

岷县城，沿路回汉人民欢迎我军。大家听了这一捷报之后，更加精神振奋，走得更快了，不知不觉间就走了三十里。正准备休息，忽然空中传来了防空的警报，大概蒋介石知道了鲁大昌惨败，腊子口失守，惊慌失措地要寻找红军的去向，飞机提早出动。大家听到警报，早已隐蔽在密林中。政治工作干部利用这一时机，向大家讲解了“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大意有下面几条：

1. 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得到回民同意后，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

2. 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

3. 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

4. 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

敌机因未发现红军目标，在空中盘旋半小时后就飞走了。我们向大刺山（亦称岷山）前进，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大山，上下约五十里左右。这一天天气特别晴朗，敌机来骚扰数次。正当我们的一部分已登上山顶的时候，又有三架飞机飞临上空。因山顶树木很少，暴露了目标，敌机丢下了炸弹。但由于我组织了对空射击，敌机不敢低飞，在我们头上盘旋了半个多小时，结果打伤了两个炊事员，打死了两匹马和一头牦牛。

我们很快登上了岷山的山顶，从山顶远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大家很愉快地，象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滩宿营地。在回汉族人民的热诚欢迎中，我们

很快进入了村子。

第二天清晨，我们辞别了大草滩的回汉人民，向哈达铺前进。这时，我们完全走出了岷山山脉。由于我们已经走过了千里雪山，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胜利的喜悦，正如毛泽东同志表达的那样：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当我们要同这千里雪山最后分别的时候，大家不断地回头看望这个岷山脚下的村子和村边欢送红军的回汉族人民，更远望那层层高耸的岷山山脉。我们在山的那边，直到邛崃山脉，曾经在祖国可爱的这部分土地上，战斗过三个多月的宝贵时间。我们怎能忘记那里的雪山草地，栈道急流，和那里其它的一切，一切？特别在那里，我们无数的多年的战友们，抱着为中国人民求最后解放的革命雄心，不幸中途倒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这些英雄的英勇顽强的战斗豪情，就活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怎能忘记他们的一切，一切？不！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亿万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我们将把他们的一份任务担负起来，奋斗到最后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得到最后解放！

十五、进 入 甘 南

我们胜利地突破了天险腊子口，从而脱离了藏民地区，进入了甘肃南部汉族较多的汉回地区。大草滩、哈达铺一带的群众，亲眼看见我们把平日压迫他们的军阀队伍，象赶鸡鸭一般赶着，把那些“丘八”象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都笑嘻嘻地欢迎我们。当我们在村外等着，问可否进入村内宿营，他们都异常亲热地欢迎我们进去，并且很快让出房子来给我们休息。他们中间有人听说过东边的陕西有红军，专门给穷人办好事，却没有人曾料到从腊子口的隘口里会涌出一支强大的红军来。他们开始是十分惊奇，经过我们讲解，看了我们的行动，很快就变得非常亲热了。

群众从各方面把我们包围起来，问长问短，问个没完，好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另一方面，我们的指战员很久不见群众了，也有很多的话要问，还有我们的各项主张也须要群众知道。这样，就在场地上，或者房间里，围在一起谈开了。作小买卖的商人很快在我们周围摆开了摊子，我们为避免拥挤，派出专人去采买，只用现钱。小商贩见我们态度和气，凡事讲道理，要价也就比较公平。

我们的女战士成了回、汉族妇女追踪的目标。她们见了穿着军装、精神抖擞的女同志，十分惊奇，开始时带着怀疑的眼光，注视军帽下边的头发，看见胸前突起。经过这样严格的“审



到达岷县哈达铺
出了腊子口向大草滩前进，打前站的同志向回汉
人民进行宣传。

查”，才放心地把我们的女同志请到家里去作客，一个个显出
又惊异、又羡慕的心情。

每个伙食单位都买了羊肉和白面，几个月不吃油盐的指战
员，都痛快地吃了几顿饱饭。总政治部还通令各个伙食单位，
请驻地周围的老百姓会餐，因此各伙食单位都有一两桌客饭，
请米一、二十个客人，男女老少都有，你劝我让，热闹非常。
老年人都说：

“活了几十岁，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鲁大昌的军队在这
里住了几年，总是向我们穷人要这要那。”

“支不出粮来还要吊打呢！”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由于我们行动迅速，都没有

赶上来，但是在甘肃方面已有蒋军十多个师，加上东北军与西北军，总共仍有二十多万人。大概因为我军突然从腊子口进入甘南，敌人摸不清情况，没敢来进攻，所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

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经胜利地克服过来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正处在狂风暴雨中，我们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统一，使我们得以进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但是，国民党至今没有接受我们的提议的表示，仍在集中大军来压迫和阻止我们。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超过了我们数倍。假如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小心，不慎重的话，我们就有受到严重打击的危险。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如果国民党各军不拦阻堵截我们，不向我们攻击，我们决不进攻他们，但是我们遭受攻击和拦阻时，我们是必须自卫，打开北上道路的。毛泽东同志最后指示我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的，久经战斗的，不畏一切艰难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你们的英勇、谨慎、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困难，而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大家感到有了无穷的力量，信心百倍地准备继续北上。为了迅速恢复体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各伙食单位莫不杀猪宰羊，烹鸡煮鸭，有的单位甚至一顿三荤两素。战士喜气洋洋，见面便说：“同志！过新年啊！”刚好这一带物价便宜，一百斤的大猪不过五元钱，一元钱可买五只鸡，一角钱买十多个鸡蛋，五角钱买一担蔬菜。鲁大昌部又丢下了很多的大米、

白面以及食盐等食品。当地农民与小商贩都喜形于色。

我军在哈达铺休息时，扬言要向东出天水，敌人非常害怕我军进攻天水这个重要城市，威胁西安，故集中主力于天水，并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与漳县两城，防我东进。我军于休息两天后，立即出动，向武山与漳县前进，约行九十里到达间井，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庄，筑成一个土围子，周围有一两丈高的土墙，墙外并挖了一丈多深的沟，只有通过一座桥，才能进村子。据说这土围子是为了防御土匪的。我们接近村子时，先派人接洽好，他们欢迎我们进驻。经过我军宣传后，他们很热情地帮助我们。

第二天清晨向新寺前进，行程一百三十里。因敌机骚扰，防空耽误了时间，到黄昏还只走了一半路。司令部命令各部队星夜赶到新寺。由于天黑，一直走到拂晓，才到达新寺附近。这时命令又到，要再赶四十里，到靠近渭河的鸳鸯嘴宿营。这一昼一夜又一个半天，共走了一百七十里路，中间只吃了一顿饭。到鸳鸯嘴后，除派出少数警戒外，部队都休息了。

第四天拂晓，司令部命令全军，限上午九时前全部渡过渭河。战士们经过半天与一夜的休息，疲劳已经恢复。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想要看看姜太公钓鱼的渭水。走了二十里路后，就到达渭河边，队伍分成两路纵队，连走带跑，浩浩荡荡向渭水拥去。这时已是凉秋九月，渭河水面虽宽，但河水不深，只到大腿上，所以队伍分成几路纵队同时徒涉，很快就上了对岸。这时候，大家一方面因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而高兴，另一方面因为既没有悬崖绝壁，又没有奔流急水，而只是平坦的河岸与缓缓的流水，感到出乎意料，有点不过瘾。

当我们已经全部渡过渭河，有的人还在边走边议论：“既无

敌人，前两天何必赶路？”这时候，忽然左右两侧机关枪“哒哒哒”响了，迫击炮也乱叫起来了。战士们一闻枪炮响，连骂带笑地说：“他妈的，老子过了河你才来，迟了啦！”枪炮声越来越密了。司令部吹号，命令队伍集合上山。有的单位已在山上暂时休息。先头部队向毛泽东同志请示，毛泽东同志叫派两连人出去放几响冷枪吓吓敌人，并且说敌人不敢来的。果然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两侧的敌人被我们吓住了。于是我们又从容地继续向山上前进了。

我军这样大摇大摆，从容不迫地渡过了渭河，通过了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武山与漳县的敌人既不敢出来夹攻，自然也就不敢乘夜袭击，因此，我们到达距渭河三十多里的山上，就在一些小村庄里零散宿营，很安静地休息了一夜。

第五天清晨，大家吃得饱饱的，向榜罗镇出发。我们行进在秃山岗上，周围无草更无树，没法伪装，各单位都嘱咐对空观察哨要特别小心，司号员军号不离手。从山岗上看得很远，敌机还在远处，军号一响，部队已经散开，所以两次敌机来临，都没有发现目标。第三次敌机又来，正当部队进入榜罗镇，人马拥挤，不易散开，敌机投了五颗炸弹，但是没造成损失。

由于情况允许，司令部命令全军在榜罗镇附近休息一天。这天早晨六点，中央召开了全支队连以上的干部大会。会场设在一个打麦场上。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形势，回顾了我们三个多月的成就之后，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

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作亡国奴，奋勇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萃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庄严肃穆的气氛，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正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静听着党中央的指示，热血沸腾着，寒冷被遗忘了。

会议还指出了要整顿纪律，特别是军纪风纪。要对干部和战士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要不怕麻烦，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各部队紧接着召开了党支部会，军人大会等，并提出了整顿军风纪，做群众工作等的比赛。傍晚，各部队又组织了会餐和联欢会。

在榜罗镇休息一天，进行了政治运动之后，次日拂晓前又先后向通渭城前进。行程约一百里。县城本驻有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和一个民团，但他们和我前卫一接触，就仓惶弃城逃窜。通渭城象两支军队换防一样，一来一去。工农商学都照常工作，只有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绅，都紧跟溃军逃跑了。

通渭是一座古老的土城，城内外除了几十家小商店之外，其余都是农民，全城居民总共不到二千。房屋都是黄土造的，城的西北是一座黄土山，山上挖了许多窑洞。指战员中的南方人，住进土洞很觉新奇，但也感觉舒服，因为几个月来大家没有补充衣服，穿的很单薄，并且破烂了，北方的秋末已经够凉

了。去年这个时候，曾有红军到过这一带，群众都知道徐海东，所以对红军并不害怕。他们开始时以为我们还是徐海东的红军，经过宣传队的解释后，知道我们是毛泽东、朱德的红军，是从南方远来，北上抗日的，更感到惊奇与敬佩。群众都自动来帮助我们，从买柴买面，到杀猪宰羊，做得十分周到。

因为已经接近西安、兰州间的大道，必须侦察清楚西兰大道沿线的敌军设防情况，所以部队在通渭休息一天。总政治部通令各单位检查行军纪律，并作通过公路的政治动员，晚间组织会餐和文艺晚会。会场设在城外的河滩上，工兵营搭了一座临时戏台，会场中央竖起了一根几丈高的旗杆，上面挂了一面大红旗，并由旗杆向四面八方拉出一些五颜六色的小旗子，飘扬在会场上空。各部队于傍晚前带着饭菜来到河滩，在戏台前集合。全体唱《国际歌》后，叶剑英、邓发同志等讲话，主要讲北上抗日的意义，西北的形势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等问题。讲话之后，就宣布会餐。大家回到各伙食单位的所在地，六人一堆，各种肉类都有，只是作法不一样。这样热闹的会餐，还是在会理过“五一”节举行过，大家愉快异常，各级指挥员都被邀到战士中间尝他们的好菜，忙得不可开交。干部团团长陈赓同志是湖南人，大家都请他吃辣子鸡，弄得他拿着筷子到处“游行”，嘴里连声叫“好”。会餐后，开始娱乐晚会，表演了各种歌舞与魔术，掌声不绝。各单位直到晚十时才回到各自的宿营地休息。

十六、在西北高原上与敌周旋

在通渭城休息一天之后，为了迅速通过西兰公路，我军三个纵队分成三路，平行向界石铺前进，行程百余里，分两天走。拂晓开始行动，一出城门就上山，是西北高原的光秃秃的黄土山。离开通渭三、四十里之后，沿途都有回民村庄，回族人民很多能讲汉语、识汉文，对我们的宣传品争先抢阅，对我们非常亲热。他们在我军经过的路边摆好茶水，并有人不断地说：

“红军先生！咱们没有啥东西招待，请喝茶吧！”

我们对回族人民的盛情，招手表示感谢。这一天因国民党军未发现我军的去向，所以只敌机来骚扰了几回，我们未遇到敌军的阻击。我们到回族村庄宿营时，首先去拜访阿訇，请他招呼回民让出一些房屋给我军宿营，并按市价把粮食卖给我们。我们完全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杀羊宰鸡都按回民的教规办事，并不借用回民的家具。我们与回族人民都感到十分融洽。

第二天因为就要到达静宁和会宁的中间地带，所以早晨三点就出发，仍以备战行军的姿势，分三路平行并进。右路一纵队准备迎击静宁方面的来敌，左路三纵队防备会宁方面的敌人出击。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行进不到三个小时，右边就发现了断续的步枪声，接着枪声越来越密，不一会机枪声大作，然而热闹了两个小时就平静了。原来是我右路和国民党从静宁城来游击侦察的一个团遭遇了。红军是打遭遇战的能手，我行动迅

速，打得敌人仓惶逃跑。左路也听到了枪声，但是劲头不大，原来是民团从碉堡里乱放冷枪。中路纵队除下午敌机来扰乱了两次之外，顺利地到达了西兰公路上的界石铺。左路纵队也按时到达了界石铺以西二十里的公益铺。右路纵队进到了界石铺以东的西兰公路沿线。西兰公路东西数十里均被我军控制。

我军到达西兰公路一线，本应立即继续北进，但为了补充粮秣，分发缴获的胜利品，以及收容落伍人员，故又决定休息一天。在我军占领西兰公路沿线期间，总共截获由西安运送军服、鞋袜等给蒋军毛炳文部的辎重汽车十多辆，解决了我军各单位的一些迫切需要。我们从西兰公路上的普通行人口里，了解到东西两面敌人的一些动态。我们各单位把这些行人招待起来，他们的态度，一般是友好的。我们给他们进行一些宣传后，在我们离开公路时，很客气地把他们送走了。

为了预防国民党军再从东西两侧夹击，我军星夜开始离开界石铺。但是因为一离开界石铺就上山，所以直到拂晓才逐渐脱离了西兰公路。这一天，一纵队仍为右路，二、三两纵队为左路，两路平行向北行进。我们离开界石铺后，敌人于正午即到达了界石铺，但并未尾追我们，可是右路军却被从静宁出击之国民党军赶上了，从此以后几天内，右路军没有能够摆脱这股追敌，右路军只好边打边走。我们当时的目的是争取迅速北上，不准备反击后面的敌人，而敌人因一时无法集结部队，也无法同我决战。因此，我们当天还是走了八、九十里路，到达了平凉和固原两县交界的地区。

蒋介石当时的战略方针是：紧紧跟着我们，不让我军有休息的机会，使我军增加减员数字，以图达到不战而削弱红军的目的。由于敌人脚跟脚地追击，我们就不得不日夜急行军，因

而减员数字确实有一些增加。然而，反动的敌人官兵矛盾，士气低落，想要同政治上团结，组织严密的，经过两万多里长征锻炼的红军赛跑，他更是疲于奔命的，减员更要高出数倍。

右路军沿路边战边走，当天与敌人相距十里对峙宿营。一、三两纵队组成的左路军当晚又在回民地区宿营。这里的回民对红军更热烈欢迎。阿訇领着教徒，在路边摆了许多桌子，桌子都铺上各色桌布，桌上摆着许多水果、糕饼等，桌子两旁放着两把椅子。阿訇站在桌子旁边向我们拱手欢迎。有的村子在红军经过时放了不少爆竹。红军的领导同志很热诚地与阿訇站在街上接谈。当夜十时，忽有群众来报告，离我们驻地十五里处到了敌人，司令部派便衣队去侦察，发现确有敌人；但具体情况不明。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作饭，晨一时继续行进，以便脱离敌人的追击。出发时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叫喊。在黄土山上蜿蜒夜行，到天亮整整五个小时，才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天亮下了山，又要渡河，因时已深秋，徒涉太冷，为了避免受凉，部队按行军序列过桥。

左路的二、三纵队过了河，进入了平凉、固原公路地区，摆脱了跟踪追击的敌人。右路军也把尾追的敌人抛在后面，走过了平凉、固原间的公路。左路军很快就接上了右路军的尾巴。两路又会合在一起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尾追右路军的敌人又赶上来，跟在左路军的后面。这时，我们分为几路纵队，迅速转向东走，以便火速离开平固公路沿线。这一天，我们从半夜吃了一顿饭，一直走到下午四点到达了平固公路及洪法城以东地区。国民党军大概停止在洪法城附近，与我军相距二十里宿营。双方都严阵以待，但并未发生战斗。

当天半夜十二时，我军继续出发，向东急行军。我们刚离

开了驻地十里，敌人也吹预备号了。司令部当然预料敌人是要赶来的，同时判断追来的敌人并无寻求决战的决心，所以，仍然不慌不忙地向前行进，并准备敌人有一两师人追来。我们的目的是北上抗日，也不准备同国民党追敌决战，只用后卫抗击阻敌，前面的部队仍然迅速前进。

我们寻求走小路上山，决定脱离平固公路地区。一纵队已全部上山，二、三纵队还未全部登山，而追敌已经赶到了。红军擅长山地作战，爬山敏捷，待追敌接近山坡时，我们已占领阵地，展开了部队。敌人不得不停止于山下，只能用火力追击，实际上只好在山下用望远镜观望我们前进。

但是，在我们行进中，忽然在我们右侧不很远处尘土飞扬，显然是敌骑兵在向我前进的道路行进。为了避免敌骑发觉，我们暂时将部队集结隐蔽起来，以便弄清情况，决定行动。不一会，观察哨报告，敌人约五百匹马，二十多部马车，已进入青石嘴休息。一纵队的指挥员在望远镜中发现，青石嘴的所有房子都冒起很大的黑烟来，判断敌人一定在作午饭，连警戒都未派出，马匹都散在公路两边吃草和打滚。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威胁，就派一个团从北面用跑步迂回到青石嘴后山，截断敌北去道路，一个团从南面控制公路，防敌回窜，并准备打敌援兵，另一个团从正面突击。我突击部队机关枪一响，正在屋内吃午饭的敌人想冲出抵抗，已来不及，只好匆忙上马向青石嘴后山逃窜。这时，我迂回部队早已占领阵地，机枪手榴弹已在等待着敌人，敌人空有六个脚，已走投无路，只得下马缴枪。这次战斗仅化了三小时。

这次意外的胜利缴获了十多部马车的子弹和军衣，指战员高兴万分。我军自从巴西北上以来，消耗了不少子弹，没有补

充。打鲁大昌我们消耗了三万多发子弹，而缴获的都是些坏枪和不能用的子弹，后来沿途又有消耗，这次才补充了几万发合用的子弹，战士们看到了马车上的子弹箱，简直高兴得跳起来。军衣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从雪山草地以来，我们穿的不仅十分单薄，而且实在破烂不堪了。进入甘肃以来，虽然沿路购买布匹，利用休息时间，采取各种办法缝了一些，在西兰公路上缴获了一些军服，发给了那些最困难的单位，可是远远没有解决问题。这次又缴获了大批现成的军衣，战士们都高兴地说：“问题都解决了。”

这次军马方面的缴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我们从江西带来的“老资格”马，早已“鞠躬尽瘁”。就是在云、贵、川补充的小马，也已经是久经考验，寥寥无几，它们主要驮着伤病员，大部分指挥员都是自己背着包袱与粮食走路。这次缴获的几百匹好马，不仅使得伤病员都有马骑，不需要同志们搀扶着走，而且有些长期没有骑马的指挥员，又有马可骑了。

这支敌骑兵是东北军的。这些兵是亡了家乡、流落在外的东北人。经过我们宣传北上抗日、打回老家之后，多数人都愿加入红军，共同抗日。我们热烈地欢迎了这些多灾多难的东北弟兄参加我们的队伍，同我们一起继续东进。

十七、“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们在青石嘴战斗胜利后，当天（十月七日）下午就走出六盘山。六盘山是甘肃有名的高山，但不同于一般的黄土秃山，而是长满了绿草，是陇山山脉的主峰，海拔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红色指战员们一鼓作气上了山。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当时写了光辉的《六盘山》词一首：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气魄雄伟，音调铿锵的词，首先概述了从西北高原回顾来途，红军的远征行程已经二万多里，北上抗日的目标还在前面，这目标是一定要达到的；然后指出六盘山这西北高峰上，红旗已经在迎风飘扬。我们手中已经有了长缨，只是什么时候绑住反动头子的问题了，我们是一定要把他绑住的。这有力地表达了我国工农红军指战员北上抗日的坚强决心，与消灭

敌人的雄心壮志。

自从我们进入甘南以来，我们已经通过了渭河的天然障碍（虽然当时意外地水浅），又突破了西兰公路的封锁线，现在又脱离了平凉、固原公路。大概敌人已经明显地看出了我们是要到达陕北红区，判明了我们的去向，并且估计我们只有大约一万人左右。所以，敌人调动了东北军的骑兵与甘肃军阀的骑兵，来追击堵截我们，以求补救他的步兵行动呆笨的缺陷，企图在我军进入陕北红区前消灭我们。这当然是敌人又一个纯粹主观的好梦，他面前还是困难重重，难于克服的。

我们当天跨过六盘山，在山的东面宿营，队伍大部露营。为了脱离后面的追敌，次晨又星夜出发。离开六盘山之后，为了行军迅速，又分两路并进。途中曾遇到甘肃军阀马鸿宾部一个团的拦阻，它与我先头部队的两个连一遭遇，就被打垮了。敌兵往四面八方逃散了，我们只抓到了八十多名俘虏，缴获了八十多支坏枪，好在还缴到了军衣二百多套，棉大衣四十多件，缴获的子弹一发也不合用。为了预防这些坏枪与子弹落到土匪手中，危害乡里，司令部命令把它们全部毁坏。战士们一面用石头打烂这些废物，一面咒骂这些只知道鱼肉人民的土匪军队，给我们这种额外的麻烦。

在接近白杨城的时候，左右两路又会合了，因此发生人挤路窄的情况。偏偏这时两架敌机袭来，大批队伍正在干涸的河滩，没有地方隐蔽，加上前天在青石嘴缴获的大白马，目标很大，敌机立即投下了炸弹，结果有几人负伤，并打坏了几匹马。赶到白杨城之后，因时间尚早，未在这里宿营，继续北进。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又有三架敌机来袭，附近有一些破窑洞可用来隐蔽，但仍伤亡了十多人。敌

机骚扰半小时飞走后，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

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到达杨家园子太晚，居民已经睡觉，窑洞在沟里，又分散，黑夜中找可以宿营的地方，只找到了几个窑洞，大部分还是露营。这里因为在深沟上边，水很缺，当夜大家连冷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居民十几户凑合卖给了我们几十担马铃薯，因为没有水，就连皮带泥蒸煮着吃。毛泽东一面拿着马铃薯吃，一面微笑着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吃不饱不要紧，总供给部已到前面办粮食了，今天到孟家园再吃中饭。”

战士们吃完马铃薯，一个个笑嘻嘻地集合出发了。到孟家园行程三十五里，只过了两道沟，其余都是山路，但很平坦，山上并种有麦子。孟家园周围有二、四十户人家，我们在这里没收了一家地主的一百多只羊和一些粮食，司令部下令休息一个半小时，煮中饭吃。午饭后，又继续走了三、四十里路，到环县曲子镇以西地区宿营。先头的一纵队宿营于一个小镇上，有二十多家铺子，还有一所教堂。小镇旁边有一条小河，一纵队的战士们都在河边洗澡，洗衣服。二、三纵队离小镇五里，在山沟分散找窑洞宿营。

第二天各部队准备留原地休息一天，让大家洗澡，洗衣服，但不久环县和曲子镇方面发现枪声，很快机关枪、迫击炮都打得很热闹了。据一纵队传来电话，敌人约一个师，有一部分骑兵，正猛烈向我前哨阵地攻击，并进行迂回。部队紧急集合，

除留少数兵力，依靠深沟的天然障碍，顽强地抗击，阻止追敌外，一、二、三纵队分两路，向河莲湾继续前进。我主力很快就脱离了追敌，负责抗击敌人的少数部队也乘黑夜和敌人脱离了接触，从容不迫地赶上了主力。

因为绕道和过沟的缘故，虽然从早到夜急行军，当天晚上并没到达河莲湾，直到次日中午才在一个距河莲湾三十里处的村子休息。根据先头团电告情况，河莲湾山上筑有碉堡，村内并有炮楼，均有少数驻军和民团防守，后续部队应乘夜通过，避免敌人的火力威胁。司令部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半夜出发。当时已是凉秋十月，我们还有许多人穿着一套单衣，半夜出发本来已经有点冷了，偏偏还要走二、三十里路的水沟，在水里过来过去，水虽不深，但脚总是湿的。走到天亮，一纵队已经通过河莲湾，但二、三纵队仍不得不冒着敌人的冷枪，跑步通过。为了迅速前进，一纵队沿环县通洪德城的大路直趋洪德城，再向东转，二、三纵队过河莲湾以后上山由小路东进。

这时敌人已经更加肯定，我军是直趋陕北红区，所以敌人抓紧用骑兵和飞机来追击我们。但敌人力量究竟有限，只能追击我们一路，而且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我们离开河莲湾那天，敌骑兵总是沿洪德城大路向我正在大路上行进的一纵队追击，飞机也总是轰炸我一纵队。我二、三两纵队因为过河后就上了一个约十里的高山，敌骑兵和飞机都顾不上这方面。二、三纵队同一纵队仍平行向东迈进，二、三纵队走到山上的时候，可望见一纵队的整个行军的阵容和尾随在后面的敌骑兵。三个团的敌骑兵整天跟着一纵队，一纵队尽量利用山沟与破坏道路的方法来阻碍敌骑兵的行动。

二、三纵队因为没有敌人的麻烦，行进很迅速，当天全部

赶到铁角城附近宿营。这一带的群众受陕北红军的影响很深，所以非常积极地帮助我们。青壮年帮助我们买粮食，买菜买羊，妇女帮助烧火煮饭，小孩子带路挑水，我们也照例请群众代表吃饭。第二天清早走十多里路，就到铁角城。这里，总共才有十多户人家。离开铁角城又开始上山。我们从山上望见，追击我左边一纵队的敌骑兵也正在运动，一纵队休息，敌人也休息。敌人看到前面是红军，右边又是红军，大概也会感到不很舒服吧。我们在途中休息的时候，遇到了陕北红军派来给毛泽东送信的人。泽东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泽东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拥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激动得热泪飞奔。

走到下午，忽然发现追击我们一纵队的敌骑兵向后转，并陆续集合到一个山坡上。大家一致地这样估计：大概要转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司令部的叶剑英等同志也在一个小山头上，用望远镜密切注视着敌人。忽然敌人骑兵尘土飞扬，远离我们往西走了。有的同志说：“时间不早了，该他们回去捏造‘战绩’，论功请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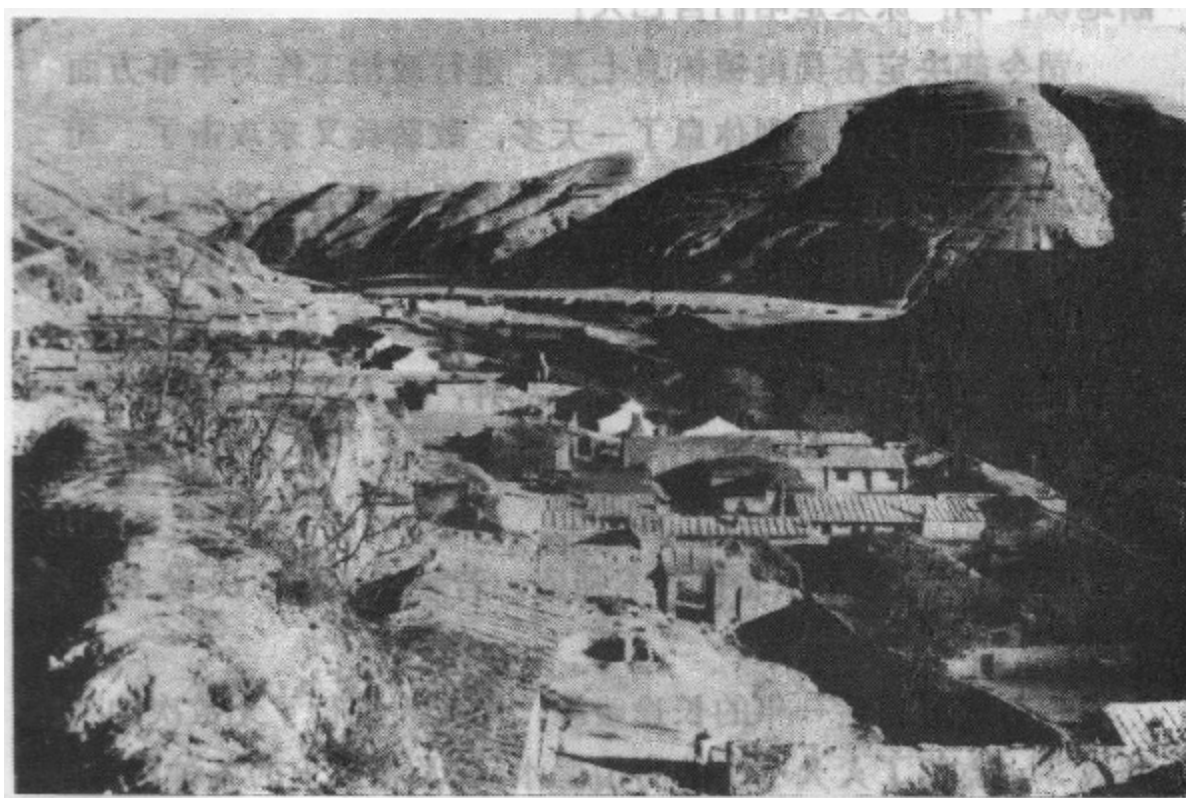
这一天我们走了约百里左右，翻了两个约十里路的大山，傍晚到达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宿营。老爷山上有三座破旧的古庙，平常有三个和尚供奉菩萨。据说三省的“善男信女”来朝拜的，经常络绎不绝。山上只有一口储水的井，水量有限，因此，司令部派人把井看守起来，按照伙食单位的人数多少分配井水。结果每个伙食单位平均只分得两担，每个战士只分得一茶缸，一分到手就一饮而尽了。煮饭成了大问题，只好每个连

队派人挑粮挑锅，下到沟底去煮饭，煮好了再挑上来。这样一来，吃完晚饭已经是半夜了。除司令部及电台之外，绝大部分露营。每个庙都挤进了几百人，除了菩萨照旧稳坐他们的宝座之外，其余空间，全由一些北上抗日的英雄们临时变成“菩萨”模样，东倒西歪地填塞着。据和尚谈，老爷山的鸡鸣，陕甘宁三省都可以听到，所以老爷山俗称“鸡鸣三省”的山。我们许多的同志曾经在云贵川交界处听过鸡鸣三省。次晨，我们又听了鸡鸣三省之后，跨过了陕甘两省的分界线，向东进入了陕北。

从老爷山出发，走约二十里，二、三纵队找到了平行道路，就分成两路同时并进。这一带山地多，敌骑兵这天没来骚扰，我们很顺利地到达梁家要险以东地区宿营。群众对红军早有较好的认识，帮助红军解决粮食等困难，非常积极。第二天开始下山，二、三纵队又会合为一路，下午并与左边的一纵队会合在一起，在沟里行进。由于队伍庞大，道路狭窄，形成一条长龙，行军的速度大大降低。不久跟随一纵队的敌骑兵突然袭来，将三纵队后卫团的两个连及收容队截断了。敌人企图消灭这两个连及收容队。但是这两个连是干部团的部分学生，都是营连排级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他们沉着应战，保卫着收容队，一起登上了山，逼得敌骑兵下马作战。这两个连顽强抗击数倍于我的敌人，互相掩护退却，给了敌人严重杀伤，于黑夜退出战斗，赶上了纵队。

次晨(十月十九日)，我们顺沟往吴起镇方向进发。敌骑兵没赶上来。下午在距离吴起镇约二十里的一些村庄宿营。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象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

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惶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红区的地方了。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四出去找群众，半天找着了几个老头、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的同志误以为群众“害怕”，因为音很相近。战士们首先把街道打扫干净，贴上各种标语，如“北上



红一方面军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整整一年的长征中，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不久那些老人又找来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了，他们和战士们热烈握手，战士们把乡干部们围起来，差一点把他们举上天空，口里说着南腔北调，但一张张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热泪久久挂在脸上。乡干部们很热情地和部队的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各种需要。第二天早晨，全镇的男女老少都回来了，见了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不断地说：“啊！原来是咱们自己人！”

司令部决定在吴起镇休息七天，进行政治工作与军事方面的一些整顿。但是刚刚休息了一天多，敌骑兵又来攻击了。司令部早已估计到敌人可能不死心，作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工作。果然，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师闯进吴起镇地区，我们从吴起镇西南山上给以回击，先打垮了敌先头的一个团，打得它回头乱窜，把后面的三团骑兵全部冲散，敌马乱奔，敌人惨叫，一时人马死伤遍野。我军停在阵地上，没有乘胜追击，只是战士们高喊：

“你们不回老家东北打日本强盗，若顽固不化，决没有好下场！”

我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同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战斗，克服了大大小小的穷山恶水，以及物质上的各种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战略大转移，进入了一个有利的抗日前进阵地。我们将从这里推动与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几万个民族英雄在长征路上倒下了，他们的热血没有白流，中国人民将千秋万代怀着敬爱的心情纪念他们。他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到达陕北两个月之后，作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总结。他说：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5—136页。

十八、“欢迎!”“欢迎!”“欢迎!”

——红军三大主力军大会师

我陕甘宁支队（即北上先遣支队）进入了陕北根据地之后，在吴起镇休息了七天，进行政治工作，深入解释到达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的伟大意义；在军事上进行整顿，训练新兵，调整武器弹药；在物质上补充服装，清理内务。完成了休整计划之后，除所有非战斗单位往陕北红区中心瓦窑堡外，毛泽东亲自率领作战部队到直罗镇同西北红军（原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与新从鄂豫皖来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当时敌人正向陕北根据地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西北红军已经在崂山、榆林桥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蒋介石正驱使东北军加紧向解放区进攻。毛泽东率领部队与西北红军会合后，决定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他命令各路红军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察看地形，布置一次歼灭战。

红军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十一月二十日，东北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毛泽东亲自指挥各路红军，按预定的部署，于次日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一再嘱咐：“要的是歼灭战！”红军分两路进攻，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攻占了敌人的师部。牛元峰带着残部约一个营，逃进一个小寨子，接连打电报求援，他万没料到援军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并被歼灭了一个团。晚上牛元峰

乘黑夜向西逃跑，走不多远，就被红军活捉了。

这一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红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红军对东北军的俘虏，进行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教育，并全部释放了被俘官兵，交还了他们的武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深为感动，开始觉得中国有了希望。从这以后，约一年间，红军对东北军进行了争取抗日的工作，每当反动官长压迫士兵来进攻红军的时候，就在火线上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联欢，争取更多的士兵与下级军官。每当我们陈述抗日救亡的道理，或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他们都是低声配合，直至泣不成声。

政治局于十二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还详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特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渡黄河东征。我军一夜就突破了汉奸阎锡山的天险河防，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阎军打得望风而逃。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

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为便于我军广泛发动群众，毛泽东决定，红十五军团（即西北红军）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趋晋西北，然后回师南下；红一军团（原陕甘宁支队）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横扫山西省南部各地。

山西人民长期在反动军阀阎锡山压迫下，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迫切要求抗日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我们一方面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民众，一方面普遍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作宣传员，张贴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奋起抗日，反对汉奸卖国贼。

阎锡山惊慌失措，一面调回他进攻陕北的部队回山西，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救。蒋介石利用阎锡山的困境，派了十个师进占山西，阻止我军东进抗日，并以陕西境内的国民党军，积极向我后方进攻。我军在东征作战中，在全国扩大了抗日声势，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扩大红军七千余，补充了军需物资，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党中央于五月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东征回师的通电，红军于五月初西渡黄河，重返陕北。

我军回到陕北之后，略事休整，为了巩固与扩大陕甘根据地，于五月中旬开始西征。我们首先给回族封建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几次迎头痛击，打得他们望风披靡，被迫困守宁夏。我们解放了甘肃与宁夏的一些县城，以及东西一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大大扩大了根据地，并推动了回族人民的抗日运动。

我们在西进中遇到了东北军的骑兵军。他们本来是被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
前来迎接的部队在会宁会师。这是甘肃会宁西关。
石压迫来对付红军的，但他们的上层军官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总是向我挑衅。六月初，我们给了他们一次反击，一举消灭了他们的四个骑兵连。我们对俘虏官兵，进行了抗日救亡的教育，交还了全部人马枪支，并欢送他们回去。从此以后，在我们与东北军对峙的数百里西北战场上，白天是彼此对立的敌对双方，晚上却是互相友好往来、要求抗日救亡的好朋友。从东北军的碉堡中，经常可以听到“打回老家去！”“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的歌声，以及断续的呜咽声与激昂的咒骂

声。

红二、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国民党军的追剿堵截后，于八月底进到甘肃南部的渭源陇西地区。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派彭德怀同志率领原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地区。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全国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这时，全国工农红军已经从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减员到约二万人，在数量上暂时减少了，但是我军广大干部与战士，经过长征的艰苦卓绝的考验与锻炼，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在质量上是更坚强了。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全国抗日高潮而奋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震惊于我三大主力会合，不顾民族危机，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竟继续坚持其反共打内战的反动政策。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力量已大为削弱，于是匆忙调集了二百六十六个团的优势兵力，企图将我一举消灭。

在当时敌众我寡的悬殊情况下，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毛泽东同志又电示：“坚决打击蒋胡军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的目的，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军继续向东转移，先后集结隐蔽于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十一月二十一日，敌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由山城堡向东攻击时，埋伏在山城堡周围的我一军团及十五军团一部，突然

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反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经过这一战，敌人仓惶向西撤退，整个进攻被我粉碎。

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长期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斥与压迫，都不愿打内战，他们已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是想消灭他们。因此，他们曾先后与我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更加促使张、杨两部进一步认识到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有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从此，他们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

但是蒋介石不甘心于进攻失败，他于十二月初来到西安，强迫张、杨进攻红军。张、杨于劝说蒋介石抗日无效后，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并在西安拘禁了蒋军主要将领，解除了西安蒋军武装。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抗日救亡主张，并电告红军，请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一时全国人民欢呼抗日有了希望，但国民党的亲日派却利用这时机，企图掀起全国的大规模内战。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与前途，英明地决定了党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央派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前往西安，并通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开和平会议。同时，中央集中主力红军开到西安附近，准备与张、杨部队共同打击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带了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来到西安，当时西安各界正陷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亲日派张牙舞爪，要进攻西安。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使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如拨重雾而

见青天，看清了方向，找到了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途径。结果，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了全国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

十九、分裂主义者对革命的危害

张国焘自从破坏中央制订的“松潘战役计划”后，虽然在毛儿盖会议上不得不同意北上抗日的方针，但是他当时装满脑袋的，不是什么北上抗日，而是吞并红一方面军，危害中央，自己称王称霸的、军阀政客的一套阴谋诡计。所以当他带领左路军，过草地进到阿坝时，尽管中央在巴西、阿西一带等了十天，盼望他按计划前来会合，但他在阿坝忽然命令左右两路军南下，公然分裂红军。

张国焘主张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地区。政治局在八月二十日就明确指出过，“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去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红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毛泽东同志打电报给张国焘，反复指出南下不利，命令他迅速北上。但他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命令全军南下，结果，全部四方面军以及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军委一部分又被迫重过草地，回到雪山地区。他把红军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弄得无衣无食，疲惫不堪，还和四川军阀以及蒋介石的追击部队硬拚，仅在雅安、成都间公路上的百丈关，同敌人十多个旅苦战七昼夜，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是也牺牲了上

万的红色战士。

张国焘的野心越来越暴露，十月五日竟在绰木碛成立伪“中央”，自称“主席”，演出“黄袍加身”的丑剧，并且狂妄地电告毛泽东同志，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他还利用中央和二军团与六军团暂时失去联系的机会，向这两支红军散布了许多假材料，污蔑中央。为了蒙蔽部队的干部与战士，他在部队刊物“干部必读”上著文，专门指责中央北上抗日“错误”，吹捧南下逃跑“正确”。

部队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迅速减员，敌人越来越多，张国焘被迫撤到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仍企图退向青海、西宁方向。不久，二、六军团（后称二方面军）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四川西北，张国焘为了欺骗这支身经百战的英勇红军，实行吞并诡计，一方面在干部中开所谓“锁口会议”，禁止透露他分裂红军的真相，一方面派先遣部队去远道欢迎二、六军团，盛筵招待二、六军团的领导干部。当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六军团终于来到甘孜的时候，张国焘又暂时挂出西北局的牌子，装出一副笑脸，用欺骗与强制的方法要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等领导同志同意他向西逃跑的错误方针，共同反对中央，并阴谋调换二方面军的领导干部，以便瓦解与吞并二方面军。

张国焘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右倾退却方针及其恶果已逐渐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严重不满，我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在西北广大战场上的巨大胜利与对全国的伟大影响，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坚持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的正确立场，使干部开始认识了张国焘的罪恶。敌人日益逼近，部队已由当初的八万人缩小到仅仅四万人左右，而他指望欺骗二方面军与他合作共同反对中央的阴谋，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为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很早

就熟悉张国焘这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嘴脸，他的伪装是掩盖不住的。

张国焘眼看水尽山穷，走投无路，这时毛泽东同志又来电指示向东北方向行动，绝不能向西退缩在少数民族地区，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但他只声称到甘肃南部休整，并没有和我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会合的诚意。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于八月初与二方面军到达包座地区，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又电示北上地点与敌军情况，八月下旬，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

这时，中央已派彭德怀同志带领一支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夹击消灭西兰公路一带的蒋介石几股白军。二方面军经西和、武山之间向东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并围攻凤县，拖住胡宗南部。彭德怀部队已将蒋军毛炳文、许克祥部包围起来。但张国焘违抗命令，不前来协同消灭敌军，又一次破坏了中央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他仍旧坚持向西走，去青海、西宁。但这一逃跑主义错误，因部队不满，没有实现，他不得不又退回来。

十月二十五日，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与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在甘肃靖远附近渡过黄河，其余部队由于胡宗南部控制渡口，被截断西去道路而未过河。因国民党军迅速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中央不得不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已经过河西去的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支铁的队伍日夜被数倍以至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所包围或分割，孤军血战，深入河西走廊与祁连山的冰山雪地，受尽戈壁滩的严寒困苦，各级领导与战士奋战在火线上相继阵亡，为中国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一带惨痛失败。

军级领导同志，如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等同志都在阵地上牺牲，战斗到了最后一口气。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身负重伤被俘，始终不屈，残暴的敌人以炮口对准他炸得血肉横飞，但他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雄伟声波，响彻祖国西北的长空与大地。中央得悉西路军失败的情况，设法同余部取得联络，命令当时已经为数不多的红色英雄们向新疆前进。这对于已经弹尽粮绝的指战员们，真象是在浩荡的夜海里看见了灯塔，个个鼓掌欢呼，不觉又跳又笑，大家唱起歌来，歌唱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山鸣谷应。中央利用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同我党的统战关系，派了陈云与滕代远同志到新疆的星星峡迎接这支队伍。这时他们仅由李先念同志率领着，于一九三七年的“五一”节到达星星峡，原来两万一千多人的队伍，已经仅剩八百余人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二方面军全部及四方面军未过黄河的一部分，同原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在会宁会师，并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师，从而全部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三个主力军的伟大长征，开始进一步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崭新局面。

张国焘在犯下了一系列的分裂红军，破坏中国革命的罪恶之后，不得不在广大干部与群众指责之下，进行公开检讨，承认错误。但他的检讨是假的。最后，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以祭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一个人跑到蒋管区，叛变投敌。他对蒋介石无耻地承认，“在外糊涂了二十年”，这一句话完全道破了他二十年之久，在革命队伍中鬼混的真相。中共中央于四月二十八日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使他再不能在党内破坏党，破坏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全面解剖了张国焘这个叛徒，并指出了应该由此得出的教训。

“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后来形成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

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因而产生了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实质。

张国焘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工作中轻视党，忽视党的工作。相反，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中央的一切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方针，共同反对中央。这些就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实质。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在一切工作中表现出来。党内发展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打骂来代替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是根本错误的，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

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右倾错误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地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地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列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二十、历史的结论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胜利地结束了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南下退却错误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爆发，并引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遵义会议当时和以后约两年多时间，由于战争紧张，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没有来得及全面地特别是从思想根源上纠正“左”倾错误。从一九三七年起毛泽东同志写出了《实践论》与《矛盾论》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针对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着重批判那些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轻视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去吓唬人们。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哲学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论文和报告，都对于扫除教条主义思想起了非常伟大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动与领导了全党的整风

运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报告中着重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三股歪风。在反对主观主义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①。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批判某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②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③

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我们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了党的作风，对党的建设与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从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夏，中央集中了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党史学习，着重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中央编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几本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5页。

献，供大家学习与讨论。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错误，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对于过去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为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同年的党的“七大”作了重要的准备。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着重对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的结论。

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

接着，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从此，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战胜了日本强盗，并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从而开辟了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永远胜利前进的历史航道。

后 记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长征，现在已经成为整整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历史功勋。当年红军三大主力军，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大会师，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伟大转变的开始，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都发生了极其巨大的与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祖国在这四十年中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红军长征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信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了妄想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但共产党人与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终于克服了国民党的投降危险，经过八年的英勇奋斗，最后击败了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以后的数年中，共产党又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象秋风扫落叶一般，把国民党反动派，连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大陆，解放了全中国。

“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我们祖国，终于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了。我国人民正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伟大的长征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当我们四十年前在西北高原大会师的时候，我们中间曾减少了很多同志，他们为创建新

中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许多人的英雄形象还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们一心为国，忠于人民，在战斗中勇猛如虎，无所畏惧；而在群众面前则十分和蔼，就象一群最老实的孩子。我们一起爬过山，一起渡过水，一起冲过敌人的弹雨，一起遭过敌机的扫射。为了可爱的祖国，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不幸倒在长征路上。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初步强大与繁荣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在逐步实现中。后死的我们这些老战友，以及亿万的上农兵群众，一定要把他们没有完成的遗志全部彻底地实现。

长征英雄们的革命精神永存！

因人民出版社准备再印此书，我作了若干修订，特此说明。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夏、于青岛